

第 六 卷

六、明朝的土地制度

1. 明朝土地的占有形式

农民以不同的形式依附着封建主，虽在法律上享有人身自由，但这自由十分有限。土地的扩展才是决定着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土地兼并问题随着农业的发展而日益突出。明朝皇室、藩王贵戚以及地方豪民，不断地进行土地兼并，除削减了明朝的赋税收入外，还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而不得不流离失所。

早在 16 世纪，明朝就已出现了最早的皇庄。后来，皇庄不断增多，到 16 世纪初，仅京畿一地就有 36 个皇庄。皇族的地位要比官僚贵族的上层人物及因功而被赐予爵位的皇后的亲戚都高。据载，16 世纪时，宦官谷大用侵夺的“民田”达 1 万余顷之多。

但大部分贵族都极力想保持“投献”制度，他们千方百计利用封建特权把一些人为逃避赋税而“投献”给他们的土地接收过来。因此，“投献”于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更为盛行了。

一些官吏虽然没有贵族爵号，但因为他们在国家机关供职也就被授与国有土地，这一类特殊的地产就叫做“职田”，官吏在任职期间可随意支配，离职后就得归还国家。

“投献”除了上述的那种情况外，还存在这种情况：一些人把属于小户农民的土地强行“投献”给封建主，自己则当起了管家。封建主就是利用这种手段圈占、侵吞、扩展土地的。成化时，王源的庄园原本只有赐田 27 顷，经过一步步地扩充竟变成了 1220 多顷，其中可耕田地 3 进 66 顷，多数是贫民已经开垦成熟的了。各地区人口数目和可供分配土地面积不一样，农民所分得的田数也不一样。这些都是私有土地，故亦称“民田”。

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拥有土地，很大一部分人只是国有土地或封建主土地的租种者。据载，在太湖，17 世纪的时候只有 1/10 的农民有自己土地，租种国有土地的农民比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还要多，对封建国家和整个封建主阶级的依附程度也比他们深。

而封建主私有土地的租种者或佃农是以上几类农民中人数最多的。这些农民的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16~17 世纪土地关系发展呈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大封建主不断侵夺农民的大量土地，扩充着自己的私有地产，国有土地愈来愈少，许多农民由于丧失了所有或部分田地而成为了分成制农民。

封建主榨取了农民的大部分劳动果实，而农民只好过着食不裹腹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自然灾害频繁的年代里，农民的生活更困难，他们常常不得不向封建主借贷，而封建主

往往从中抽取重利。

2. 土地与人口的管理

①黄册、鱼鳞册的制定

明廷开始对天下土田进行核实。当户部受命前往时，豪民富户为逃避赋役，往往隐瞒自己的田产，乡里也纷纷欺瞒州县，而州县又欺骗府部，这就使百姓负担的赋役越来越重，更加激化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国家赋税收入也难以保证。针对这种状况，明太祖果断下令户部编造“赋役黄册”。

赋役黄册编成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初，户部重新开始核实天下官田。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国子监生武淳等人受命开始清丈土地，建立田籍。首先是根据税粮的多寡划分区域，设粮长管辖，以税粮万石为一区，选出4名田产较多的人做粮长，负责赋税督收。跟里甲制一样，也是先抓组织落实，责任到人；其次，核实田亩，把田土面积、坐落、四至及其所属人姓名都编写到图册上，并按字号次序进行排列，因为所绘图形形状如鱼鳞，故得名“鱼鳞图册”。

黄册以户为主，新编鱼鳞图册则以田地为主。

鱼鳞册和黄册互为经纬，相辅相成，使得封建国家既控制了全国户口，又掌握了全国土地，完备了立法，减少了土地纠纷和隐瞒田土、转嫁税粮、产去税存等现象。

明廷根据制定的田籍清理出大批被隐瞒的土地，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富户，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使社会矛盾得到了暂时缓解，有利于农村安定和生产发展。此外，明廷还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因地制宜，促进了土地的开发，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至在当时很快出现耕地面积增加的情况。

明中叶以后的法律制度日趋失去效力，土地兼并再度盛行，鱼鳞图册不再具备实际作用，豪强又开始欺瞒田土，政府税收再次锐减。

②张居正清田丈土

张居正（公元 1525 ~ 1582 年），字叔大，号太岳，出生于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江陵），嘉靖二十六年考中进士。他做事果敢，有豪杰之称。万历改元他任内阁首辅，很得神宗尊敬，把持了朝政大权。在此期间，张居正进行了整顿吏治、巩固边防、综核名实等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治、经济改革。为了增加国家田赋收入，巩固皇权统治，张居正开始着手进行清丈田土改革。万历八年，张居正经过对前人清丈经验的总结，推出一套清丈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史称“万历清丈”。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明皇朝，张居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意识到吏治腐败是造成财政困难、社会危机的根源，于是在政治上强调“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

号令”，整顿吏治，对官吏进行考核，加强边防建设，综核名实；经济上意图通过打破土地兼并，使豪民不得“有田不赋”，而贫民不会“曲输为累”。

万历六年十一月，福建进行土地丈量，平均赋役。万历八年九月，成功地完成清丈，证明了张居正改革方案的可行性。同年十月，《清丈条例》出台，有八大条例。

明神宗批准了此款条例，并命令各级严格执行，不得“苟且了事”。于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清丈浪潮开始了。

当时，明神宗只有 10 岁，张居正独揽了朝政大权，其先前政治改革的成功成为其经济改革的基石。

张居正坚决把清丈运动进行到底。他一面给各地巡抚写信，鼓励他们放手去干，一面对抵制清丈的勋贵豪强和清丈不力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万历九年七月，河南获嘉知县张一心因为谎报清丈数字而被连降两级。同年十二月，松江知府阎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雄、徽州掌印同知李好问四人则因为清丈不力而被停止发放俸禄，“戴罪管事”。

为了更好地开展丈田运动，张居正以身作则，主动提出清丈自家田亩。他写信命令在江陵老家的儿子张嗣修严格查核自家有无隐漏田土。

张居正利用手中的大权命令全国各州县认真执行《清丈条例》。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各地得以编制出比洪武时期更加精密完备的鱼鳞图册，清楚地反映了清丈后的土地占有状况，成为政府摊派钱粮的依据。后来清朝入关就据此图册编写《赋役全书》。

这场“丈田亩，清浮粮”运动用了2年多的时间。

此次清丈目的在于通过核查田土，平均赋役，保证国家税收。清丈运动基本上达到了上述目的：首先，清查大量隐田，减轻了农民的赋役负担，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

张居正负责主持了这场清丈运动，因为他的好大喜功，使得清丈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丈量的方法上。各地为了讨好张居正，采用小弓进行丈量，为的是增加田地的数额。

一些地方还根据这些用小弓丈量出的土地数额征收田赋，多出来的“虚额”就摊派到农民头上，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无辜农民。

社会上便出现了“丈量之害”的言论，土地制度没能坚持多久，很快就被废除了。

整个明朝从开始到结束都在核查田亩，编造田籍，但始终没编出一本可以依照着平均赋税的图册，田籍始终混乱，田亩始终无准，这也是封建土地制度所带来的必然恶果。

3. 屯田制度的实行

还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便有了军事屯田。明朝建立以

后，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安定民心，朱元璋在民间实行屯田，称“民屯”，后来发展成为“商屯”。就这样，明初屯田出现了军、民、商三种类型。

①军屯

军屯，又称卫所屯田，一种是设在边境的边屯，一种是在内地的营屯，一般以每军受田 50 亩为标准，称“一分”。施行军事管理是军屯不同于其他屯田的地方，屯粮收入往往要维持屯军全家生计，这样的生活很是艰苦。据统计，明初曾有 89 万 2 千余顷军屯。

实际上，从永乐末年起，随着移民垦荒的基本结束，军屯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了。

明仁宗指出了卫所屯田存在的严重问题，仁宗规定“天下卫所，凡屯田军士，自今不许擅差妨农务，违者处重法”。

到正德初年，辽东军屯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正德嘉靖以后，社会再度掀起了一股土地兼并狂潮。农民所受的赋税和徭役日益沉重，不得已纷纷逃亡。此时的军屯制也已经是“名存实亡”。

嘉靖八年（公元 1529 年），浙江爵溪所屯田及象山县民代种本卫中前千户所屯田，每石税粮折交银两二钱五分。隆庆二年（公元 1568 年），政府宣布在宣府、大同每开垦 10 顷地将官可以得到 50 亩。隆庆四年政府又下令对那些在边地开垦的田地永不征税，还会给那些每年垦田成百上千顷，

粮食增加 10 万或 5 万石的人以重赏。

屯粮“折色”征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屯田制的完善，相反，由于屯法大坏，军士逃亡殆尽，屯田数额锐减，剩下来耕种的将士也多不用心，屯田制已经是没落在即。

②民屯

明初，官府或强制迁移或招募一些民户，另外还利用一些犯罪迁徙户进行荒地开垦屯种，称民屯。

这些民屯的田地实际上属于官田，赋税也按官田税额征收。各地民户按自家丁力领取田土，北方地区每人可领 15 亩田和 2 亩菜地。民屯被划分为里甲管理，归府县统辖。

③商屯

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产生了明代最早的商屯。第二年，山西行省认为“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提出“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因为担心原先所定盐价太高，会使得商人所得利润过低，从而影响到商屯效益，于是命令中书省商议减盐价的有关事宜。

中书省经商议后决定：凡运输粮食到凉州卫、梅川、临兆府及河州的，每盐一引，分别只需米 2 斗 5 升、3 斗 5 升、7 斗及 4 斗。

弘治中期，叶淇关于召商纳银盐运司的变法使得开屯之法大坏，商屯也随之遭到破坏。

民屯、军屯、商屯三者是同时进行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军需，但出发点有些不一样。民屯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而军屯主要供给边区及内地军队粮饷，商屯就主要是为了资助边境军粮。就作用而言，民屯和军屯要比商屯大，三者操作方法不尽相同。

民屯和军屯的价值是通过直接开垦土地扩大耕地面积，然后是增加粮食产量。商屯不与耕地有任何联系，而是通过与官商进行米盐交换来实现它的价值。

4. 庄田的形成

明代的庄田种类繁多，当属皇庄、诸王庄田、勋戚庄田及中官庄田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

①皇庄

皇庄是皇家的私有财产，收归皇室所有。

皇庄早于汉代就有，当时称“苑”，到唐代时改称“宫庄”，明代一开始也称“宫庄”。

宣德时，又陆续建立自北直隶东北部丰润县起向西南经宝坻、武清、静海直到河间等府县的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

上述三个宫庄发展到嘉靖初年已达 63 处，合计有地 16015 顷又 47 亩。

皇庄一开始只是占空闲之地而建，到后来就变成了侵夺民田。

明武宗即位不过短短一个月，就把皇庄建得到处都是。自此，皇庄建立越来越多，建速也越来越快，并开始有了“皇庄”之称。

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设立的皇庄，有：顺天府昌平州苏家口皇庄，三河县白塔皇庄。

仅隔一年又设立了：顺天府东安县南葛里皇庄，宝坻县李子沽皇庄，通州神树皇庄，武清县灰厂口皇庄、王头陀皇庄，河间府静海县四当口皇庄。

正德四年（公元 1509 年）设立的，有顺天府大兴县、三里河皇庄二处。

正德五年（公元 1510 年）设立的，有六里屯皇庄。

正德七年（公元 1512 年）设立的，有顺天府清县尹儿湾皇庄，大直沽皇庄。

正德八年（公元 1513 年）设立的，有：顺天府昌平州楼子村皇庄，保定府安州驸马庙皇庄，清苑县阎庄社皇庄。

以上各皇庄占地达 37595 顷 46 亩之多，遍布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 4 府。

明初没有皇庄。明中叶以后出现的皇庄其实是利用皇权侵田占土，大肆搜刮税粮，剥削民力，以满足皇室的高额消费。这种皇庄越建越多，民田必然越来越少，封建社会农民

与地主的矛盾冲突就愈来愈激烈，国家税收亦一年不如一年，皇权统治的物质基础受到严重动摇。这种情况使得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对皇庄加以整理和限制。

明世宗即位之初就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是裁撤管庄人员，其次，委命官员清查畿内皇庄。嘉靖二年（公元 1523 年）二月，兵科给事中夏言写成《勘报皇庄》一疏上奏。明世宗批阅了夏言的奏疏后下旨：“皇庄”改为“官地”，租银照数解进内府应用。

② 诸王庄田

明代的分封制产生了王府庄田，即诸王庄田。

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四月，明太祖第一次赐诸王庄田。

以成化、弘治二朝赐给各王府的庄田最多。王府庄田的发展过程显示：土地兼并之风主要是从正、嘉以后开始的，而在这之前，宗室已经开始疯狂地兼并田土了。可见明代的兼并之风是由最高统治者皇帝率先引起的。

王府庄田与皇庄的性质都是蚕食国家土地，因而威胁中央政府的税粮收入，造成军费支付的困难。明孝宗曾于弘治十三年（公元 1500 年）下诏限制王府庄田的扩充，此外，明孝宗还宣布，辅佐诸王的人如果胆敢“导王奏请土地”，一律定罪。但是这道诏令并没有制止住“奏献不绝，乞请亦愈繁”的状况。嘉、万以后，赐予王府的庄田越来越多。

明代历史上，在王府庄田问题上闹得最厉害的还属福王庄田。

福王朱常洵，明神宗第三子。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明神宗把河南洛阳赐给他做封国。

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迫于廷臣的压力，明神宗决定在庄田数额上做文章，下令拨给福王的庄田一定要达到 4 万顷。

诏令一出，廷臣上下震惊：4 万顷相当于全国田土总数的 60 。

明神宗之所以要赐予福王如此多的庄田，其目的在于将向国家纳税的大量土地转变为福王的私产。阁部大臣为保障国家税粮收入据理抗争。其中属内阁首辅叶向高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的进言最为尖锐，但也最中肯。

叶向高从当时的土地关系状况角度批评明神宗和福王无视祖宗法律。其他廷臣跟着叶向高一再上疏抗争。明神宗被迫把原定赐给福王的 4 万顷田地减半。明神宗在封赏土地问题上往往是有求必应，以致不少王亲贵戚纷纷效尤福王。于是出现了天启七年（公元 1627 年）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浩的汉中府，第六子、惠王朱常润的荆州府以及第七子、枉王朱常瀛的衡州府。与皇庄相比，明代王府庄田的特点是：

第一，分布广。王府庄田可谓遍及全国。

第二，数量多。王府庄田与皇庄相比，一个达数 10 万顷之多，一个才 76000 余顷左右。

第三，规模越来越大。皇庄发展极其缓慢，于永乐年间创立，到 30 多年后的天顺朝才有了正式命名。进入高峰期时是正德朝，也不过新建 31 处。王府庄田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都在不断地发展扩充。经洪武朝，仁、宣之世到英宗一路发展，成化、弘治年间发展更是迅速。

③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

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也都是明代土田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拜中国封建君主制土壤的“栽培”。这两类庄田主要集中于北直隶地区，其性质是为了侵吞国家税粮，前者与皇庄相似，后者与王府庄田无异。

弘治二年（公元 1489 年）以前，北直隶地区有勋戚、中官庄田 33100 余顷。后来从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到明末天启七年（公元 1627 年）的 120 年间里，勋戚、中官又从朝廷那里获得庄田 27900 余顷。这样一来，勋戚、中官庄田就有了 61000 余顷，比当时北直隶八府田土总数的 $\frac{1}{5}$ 还多。

正德以后，庄田的不断扩充使得京师内外的田土都被搜刮完了，社会滋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加之军需难以维计，社会要求限制庄田的呼声愈来愈高。

嘉靖八年（公元 1529 年）四月，大臣上疏痛陈庄田泛

滥及危害之大，提出限制勋戚庄田的办法，明世宗下旨查明已经赏赐的田土，命令把那些强占得来的土地归还原主，并告示勋戚大臣今后“不许妄行陈乞”。

清查勋戚庄田的工作于是逐步展开。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 1560 年），御史沈阳清查出 20600 余顷隐冒庄田。

明穆宗令户部制定出裁革勋戚冒滥庄田的 4 条具体规定。

万历十九年（公元 1591 年）十二月，戚臣可以占有的庄田数额终于定了下来，规定：皇后家族传了 5 代的可拥有 100 顷田土；皇贵妃和贵妃家族传了 5 代的只准留 70 顷土地；妃子没生有皇子的传到 3 代以后，所有庄田都得归还官府；而驸马传了 3 代的只能保留 10 顷田地。并且强调：“以后养贍香火庄田递减，都照今规则，永远为例。”

此规定颁布以后，虽然乞田人数不减，但毕竟封赏的田土数额有了一定限制，庄田给百姓带来的危害有所减轻和收敛。

明代庄田不仅只是以上提及的皇庄、王府庄田、勋戚及中官庄田，还有大量的公主庄田、大臣庄田和寺观庄田等。

④ 庄田的特点

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培植了名目繁多的庄田，并使它们衍变成为了侵田夺土、掠夺国家税粮的社会公害，极大地破

坏了皇权尊严。可以说这是明代所有庄田的一个共同点。

另一个特点是，这些庄田都是通过掠夺一些已经纳税的开垦田而建立起来的，荒地成分不大，此外这些庄田经过赏赐、奏讨、投献和强占，不断地发展壮大。其中投献占了不小比例。

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各类庄田的要害和实质，都是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即和国家争夺税粮，即田租，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国计日亏。

5. 明朝中期以后的赋役制度改革

明初，政治清明，赋役制度在政治效力的驾驭下得以正常运行。到了明中叶以后，政治变得腐败起来，国家失去了以往的控制力，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上述赋役制度就不得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解决之道，明中叶的赋役制度改革呼之欲出。

①里甲正役的改革

最早的里甲正役改革是宣德五年周忱在应天府推行的“里甲”制度。周忱一改明初的以人丁、财产为标准征收的徭役法，首创摊丁入地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此外，周忱的平末法还将性质与编金方法不尽相同的正、杂二役一体混编，把赋役完纳制度变成随粮带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舞弊行为。

除此之外，周忱还对里长之役做了一番重大改革，有三点极为重要：第一，固定一县一年应征里长之役，既保证了官府赋役的征收，又明确了百姓的负担；第二，顺应明初商品经济发展潮流，将力役折成银两征收，既不误官府收入又不误百姓生产；第三，缩短里甲 10 年轮支的应役时间。

周忱的以上改革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又在一定程度上均平了百姓的徭役负担。实际上后来明朝自下而上由局部到全国的赋役制度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完善周忱的一系列做法，并使之制度化。

欧阳铎的征一法把里甲诸项并入秋粮，所以又名均摊法，是对周忱改革的继承和发展。东南各省也纷纷仿效周忱，对里甲正役进行改革。因为华北在政治上所受的渗透控制比较强，而经济上又向来不如南方，因此华北的改革较为滞后。

总之，里甲之役既有利于均平赋役，减轻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又缓解了里甲人户的人身依附，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明中叶的上述种种里甲之役改革还孕育了后来的一条鞭法。但由于当时吏治腐败，改革后的里役制度在施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弊病。“见役里甲赋钱于官，曰纲银，曰办银。有司复摄之，令直日供应，无名之征纷然四出，即百缗不以抵数。穷乡小民，白首不识官府，雇

人代直，月费数十金，里甲大苦。”

②均徭法与十段册法

杂役改革与里甲正役改革是同时进行的，其突出表现为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立与推广。

明代杂役改革从均徭法开始。正统八年，江西按察僉事夏时把知州柯暹撰写的《教民条约》和《均徭册式》明文规定了下来，从此，均徭法正式创立实施。明代赋徭因此被分为里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三类。

均徭法从创立到完善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和试验，在此过程中有过一些新的调整：第一，出现了所谓的银差，即服役者纳银代役，正德以后银差、力差之分被逐渐固定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银差日益加重，而力差日益减轻。第二，南北方在均徭编审基准上大同小异。

明中叶以后，各种名目的杂派夫役都归并为均徭，造成均徭种类渐多，百姓负担沉重。均徭本意是均平徭役，但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一些不均的弊病。为了改革这些弊端，十段册法产生了。

十段册法即十段锦法，不管内容在各时各地有什么差异，其主要方式都是两种：一种叫十段田法，第二种叫提编法。

嘉靖二十九年后，十段册法被统治者用来筹款以应付频繁的倭寇骚扰。嘉靖四十四年直隶巡按温如璋也用十段册法

来防止品官优免过于泛滥，诡寄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在众多十段册法中，要数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元年浙江巡按庞尚鹏推行的十段册法有效。

③一条鞭法的推行

明中叶以来的赋役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没能彻底改变全国赋役不均的状况。于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于万历六年应运而生。

一条鞭又称一条边、一条编、条鞭、条边等。

嘉靖初年所创建的一条鞭法，到隆庆、万历年间开始盛行，万历中叶以后几乎遍行全国。这前后，一条鞭法有一个逐步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傅汉臣第一次提出了“一条鞭法”的称谓，但一条鞭法的最初创始者是桂萼。

一条鞭法虽未被世宗采纳，但还是得以在局部地区推广，南方尤其是江西、南直隶、浙江等地收效最大。

不仅浙江，万历以后，庞尚鹏还把一条鞭法推广到福建、两广等地，在南直隶，海瑞经过大量土地扒平田则，也实施了一条鞭法。

关于一条鞭法向来有人持赞同观点，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使得其实施“忽行忽止”。张居正上台后，一开始对一条鞭法抱着“任从其便”的态度，后来看到一条鞭法在局部地区的成功，的确显示了其利多于弊，于是决定在全国推广。

张居正坚决支持一条鞭法改革的态度加速了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广进程，到万历二十年左右一条鞭法已经是遍行全国了。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目的在于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以及百姓的赋役不均等问题。可以说，一条鞭法的实施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通过合并使赋役除繁趋简，固定其数额，简化了征收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吏治的整顿。

第二，部分徭役摊丁入亩，既保证了国家收入，又减轻了贫下户的赋役负担。

第三，以每年编审取代里甲排年轮役制，实施起来简易方便。

第四，赋役折银征收，百姓完成自家粮差后就再无别的徭役和差使了，彼此相安无忧。

一条鞭法在总结两税法 and 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经验及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反映了赋役制度发展的规律。清朝的地丁制度就是它所体现的“摊丁入地”、“度地而税”的趋势的继承。

④三饷加派与明代赋役制度的终结

从万历初到万历中后期是张居正的改革卓有成效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嘉靖、隆庆时的财政危机有所缓解，“海内殷阜”，“帑藏充盈”。这之后，明皇朝陷入了严重的内

忧外患中，财政危机也空前严重。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填补巨大的财政赤字，明廷推行了开矿榷税和三饷加派的赋役征收政策。

万历二十四年，只知钱财不知百姓的明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前往全国各地开矿榷税，他们所到之处无恶不作。

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恣意妄为使得整个国家一片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被引发了。

辽饷、剿饷和练饷统称三饷，为加派之饷，每亩征收。嘉靖二十九年秋，户部尚书孙应奎建议加派田赋用作军饷，通过此法，政府赋银增加了 115 万两。嘉靖三十一年后，因为倭寇及俺答的不断侵扰，南畿浙闽被列入加派范围。万历二十五年，山东也因为当时发生了朝鲜战役而被加派。

万历中期前，田赋加派范围不广，且数额不大。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后于赫图阿拉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打着七“大恨”的旗号，攻陷了抚顺，不久又攻克了清河，引起明廷上下震惊。明廷决定实行加派以助军饷，只有贵州因发生苗民起义而未施加派。神宗本来答应等辽战事一结束就停止这次加派，不料第二年辽饷用尽，后金仍频频进攻，明神宗再次加派，万历四十八年，明廷第三次加派辽饷。

崇祯三年，辽东战事急剧恶化，永平、滦州、迁化、遵化 4 镇被后金占领，明廷急忙调兵 5 万余、马 1 万匹赶往蓟

州、通州、昌平三镇，为提供 115 万两军饷，崇祯下诏第四次加派，每亩 3 厘。除了辽饷加派外，明廷还从天启六年开始施行辽饷预征制，如果缺 $3/10$ 就预征第三年的 $3/10$ 。田亩是辽饷加派的主要对象。

剿饷和练饷是为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而筹措经费的名目。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崇祯皇帝，提出剿饷征收办法。

崇祯帝于十年闰四月下诏依照杨嗣昌建议征收剿饷。原定期一年，无奈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逼境，明廷不得已练兵增饷，于崇祯十二年增派练饷。练饷征收的主要对象仍是土地。

加派完全是一项掠夺性的财政措施，曾一度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强烈的不满。崇祯十七年，北京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三饷加派与其他赋役制度一样跟着明朝倒下了。

七、明朝中后期的手工业

1. 工部手工业

工部属六部之一，在明代官营手工业中发挥最主要的领导作用。

工部下设四个清吏司，每个清吏司都掌管着一些官营手

工业生产机构。这些机构多由品级不高的官员负责，但他们在官营手工业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在所有的官营手工业管理部门中，营缮清吏司是最主要的，它掌管着的全部是官营手工业。

营缮清吏司的主要职责为“掌官府、器仗、城垣、坛庙经营兴造之事”。其次，皇帝和皇后、太子、亲王世子、皇妃的卤簿、仪仗、乐器也主要由营缮司来负责。此外，营缮司还负责管理供应京师各工程的物料，如木材瓦器、陶器、琉璃器以及薪苇等。其第四项职责是负责浙江等地轮班匠的簿籍、调拨和清查。再有就是负责一部分刑具的制造，以及流罪以下罪囚的调拨。

虞衡清吏司主要负责“典山泽采、陶冶之事”，催办祭祀、御用、宴宾客用的野味以及山泽禁令都归虞衡司掌管。在虞衡司诸多职责中，属于官营手工业的那部分有：一是小心保管及核查陶瓷器皿。二是负责铸器、铸钱方面的有关事宜。三是负责军装与兵器的制造和验收。四是把采集来的鸟兽皮张、翎毛、骨角制造成军器、军装和礼器。五是管理铜铁、颜料、纸札等的生产制造活动。

都水清吏司主要负责舟车、织造、衡量、川渎、陂池、桥道等项事宜，还管理券契。其中前三项职责与官营手工业有关。

此外，都水司还掌握着明官办纺织业的基本机构，包括

“应上用”的内织染局和备公用的外织染局，还有南京的神帛堂，苏州等地的织染局等。买卖中度量衡的精确度也归都水司掌管，都水司必须保证符合标准的衡量器具在社会上使用，并处罚那些使用不合格度量衡的人。同时，都水司还领导器皿厂，督造光禄寺及在京各衙门所需器物。其中仅抽分和修造山陵坟茔这一部分权限与官营手工业有直接关系。

工部作为一个有职权的机关，领导着许多手工业生产的骨干机构，组织及协调着整个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地位突出，影响重大。

南京工部既是明代管理南方地区官营手工业的得力助手，又是中央工部的辅助机构，在整个官营手工业的管理协调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2. 内府手工业

明代，直接服务于皇帝的宦官机构称内府，有四司八局十二监，共 24 个衙门，主要负责皇帝日用品的制造，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手工业生产体系，因而成为明代官办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及特殊部门。

内府中，不同的衙门掌管不同的产品制作。

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统称内府十二监。其中内官监及御用监是两个管理官营手工业的主

要机构。

掌印太监为内官监中最高长官，仅一名，下设总理、管理、金书、典簿、掌司等。

御用监主要负责造办皇帝所需的室内摆设及玩乐用品，此外，御用监还专门负责近侍长官以及各营的总兵官所用盔甲和绣春刀的制造，动用工匠极多，生产规模巨大。

十二监中职责与手工业有关的还有尚衣监及司礼监。前者主要负责缝制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袜等。司礼监位列十二监之首，职掌甚多，司礼监与手工业有关的职责主要是为皇帝提供文化用品和书籍。

内府十二监中司设监也负责一定规模的手工业。

内府四司指的是借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其中宝钞司的职责与手工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主要是生产草纸。其设掌印太监一名，下属有金书、管理、监工，但不固定。

内府中有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等 8 个重要的生产场地，统称内府八局。其中除浣衣局、司苑局外其他各局都与手工业生产关系紧密。

内府中还有负责铸造亲王印符和金牌、上值守卫官军金牌、士官信符和金牌的金牌厂以及掌造御酒的御酒房等手工业机构。

王恭厂与盔甲厂由于是生产军器和火器的重要机构，为防止泄密，表面上由工部军器局统辖，但实际工作交由宦官掌管。

内府手工业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南京内府的手工业。南京内府的衙门设置跟北京内府相差无几，其中南京司礼监、南京内官监、南京内织染局、南京兵仗局前厂执掌的手工业比较重要。

3. 户部手工业

户部作为明代主管国家财政的最高机构，在六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其所管辖的手工业不甚发达，大致只有制钞业、铸钱业几项，其中铸钱也是到明末时才有的职权。此外，明代官营手工业所需物料及产品的管理与户部有一定关系。

明代铸钱，在中央一直由工部的宝源局负责。后来的宝泉局是因为辽东战事频繁为以钱息弥补军需不足才于明末天启二年增设的，受户部督管。

户部还管理制盐业。作为户部十三清吏司之一的山东清吏司就掌管了两淮、两浙、长芦、河东、陕西、山东、福建各盐运司，四川、广东、海北、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各盐课提举司，陕西灵州盐课司，江西南赣盐税。产盐区里，盐运司和盐课提举司是明政府所设立的最高的盐

政盐税管理机构。

户部对盐政的管理职责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收贮折银盐课。

二是负责盐业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工作。

三是参与地方盐政的清理工作。

四是负责盐引勘合的印刷工作。

户部主管的制盐业作为一项官营手工业，并不像其他官营手工业那样把产品全部用来满足皇室和政府的消费与各项需求，而是把产品出售给商人，这正是其特殊性所在。由于制盐业的管理机构是朝廷单独设置在产盐区的，与地方政府没什么联系，因而制盐业是中央系统的官营手工业。

除制钞、铸钱、制盐外，户部还有一个与官营手工业生产有联系的部门：内府十库。其表面上由户部广西清吏司掌管，实际由宦官负责，与官营手工业有一定联系。

内府十库的管理极其严格，经办衙门和人员都手握一定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出现了不少弊端。

除工部、内府、户部的手工业外，礼部的铸印局也是明廷系统的手工业组成之一。中央的手工业是官营手工业的主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代表着明代官办手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

4. 其他手工业的发展

16 世纪，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

平，表现为出现了许多以使用农奴劳动为主的大型国家作坊和使用雇佣工人劳动的私营企业。

明朝，一批生产部门，像丝织业和棉织业、磁器制造业、造船业、造纸业、冶金业、采矿业（金、银、铜、铁矿的开采）、采盐业、玻璃制造业等，无论在技术还是规模上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①棉纺织业

明朝绵纺织业发展速度相当快，出现了“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九”的局面。价格昂贵的丝织品和产量不高的麻制品被逐渐取代。

棉纺业使用的加工工具被不断地改进，使得棉纺效率大大提高。

当时棉花种植面积扩大与产量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棉纺业的发展。万历时，棉花不仅在山东河南等地区有大面积种植，而且开始向南方倾销。南北棉花产量的剧增，直接促进了棉纺业的发展。浙江嘉善县棉纱、棉布生产十分发达，以至当时人说“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由于气候的缘故北方的棉纺织成品质量相当的差。直到万历年间，北直隶肃宁县的织工创造出提高棉布质量的方法，才织出了高质量的棉布。后来肃宁县所出产的布匹细密程度已经可以与松江的中等品相媲美，产量足有松江的 $1/10$ 。

随着棉纺业的发展，专门从事染布的染坊和用大元宝石

压平布匹的踹坊也逐渐兴盛起来，形成了一定的行业规模，产品销往南北各地。芜湖成为当时南方棉布染织的中心。

②丝织业

丝织业，中国自古就有，发展到明代，无论是养蚕、缫丝及纺织技术还是纺织工具，都有了新的改进。

丝织机有两种，一种是沿袭元代或明初式样、专织上等丝织品的提花机，也叫“花机”。另一种是专织平面丝织品的“腰机”，只需一人操机，技艺高的也可以织出精品。福州的织缎机原来有5层，弘治时，工匠林洪将它改为4层，称为“改机”，使产品质量提高不少。江南濮院镇原本使用土机织纱绸，万历时，机户沈大德改进制成“纱绸机”，专用于织纱绸，大大提高了丝织品的质量。当时织机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分出了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等多种织机，可见丝织业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发达了。

除江浙外，山西潞安府的丝织业也十分出名，特别是所产潞绸行销各省，甚至远销边境民族地区。

③陶瓷业

陶瓷业的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江西的景德镇因为拥有丰富且高质量的原料、设备完善而规模巨大的作坊以及高超的制瓷技术而成为全国的制瓷业中心。

除景德镇外，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河南禹州、北直隶

曲阳、南直隶宜兴等也是制瓷业相当发达的地区。

官窑因为是生产供皇家御用或祭坛陈列的瓷器，所以大多拥有雄厚的资本，而且汇集了大批能工巧匠，生产出不计成本的瓷器。民窑主要给民间提供实用的生活瓷器，产品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进行买卖，大批量地销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其中也有一此民窑生产出了一些精美的传世珍品。

工艺创造上，陶车辘轳代替了以前的竹刀辘轳，吹釉代替了以前的蘸釉。瓷器一改从前的单色釉，出现了大量青花、釉里红及三彩、五彩等多彩瓷器。瓷器的种类也较前代增多，除普通用品如碗、盘碟、钟、瓿、盏、盒、杯等外，还有酒海、炉、瓶、半边葫芦瓶、罐、坛、花缸、渣斗、醋注、烛台、花尊、笔筒、笔架、凉墩、扇匣等生活日用品及装饰品。

④造纸业与印刷业

明代造纸业已经非常发达，造纸作坊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

当时官方经营的作坊主要分布在各个主要产纸地，他们在那里设局造纸，抄造宝钞用纸、票据和公文用纸及各种精美官笺。不仅如此，民营的造纸作坊——槽坊也兴盛起来，而且逐渐增多。在这些槽坊中有的已具有较大的生产规模。这种生产规模和雇用工人的生产方式，是从前的家庭手工业所不能及的。

明代造纸采用的原料主要有竹、楮皮、桑皮、麻、稻草等。其中以竹作为原料的造纸业发展最快，在当时已处于全国纸业前列。这些纸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因此，深受印书业的喜爱。尽管竹纸生产技术难度较大，但经宋元时期的不断探索与改进，到了明代已趋于成熟。除竹纸之外在产量和应用广泛性上居于第二位的是皮纸。

依原料和用途不同，明代所造的纸张名目繁多，像连四纸、连七纸、毛边纸、观音纸、奏本纸、榜纸、开化纸、绵连纸、油纸等。另外明代在纸类加工上也很有成就，其中以磁青笺最为著名，羊脑笺是对磁青笺的进一步加工。此外，明代还曾仿制过前代的一些名纸，如唐薛涛笺、宋金粟山藏经纸等。除此之外，在冯梦祯《快雪堂漫录》及高濂《遵生八笺》等著作中还有其他一些加工纸的方法的记载，内容虽不详尽，但仍是研究我国古代加工纸技术的珍贵史料。

明代纸张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的显著发展，又为印刷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江南地区印刷业发达，因此出现大批刻字工人。

明末的印书作坊，也具有一定规模。天启、崇祯时的常熟虞山富翁毛子晋开办的印书作坊，经营对象主要是古籍。匠人分为刻书匠、印匠和装订匠。在所有的汲古阁中，属毛氏汲古阁所印书种类繁多，上自十三经、十七史，下至丛书、别集、道藏、词曲等，在当时影响很大。

明代印刷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砭板、拱花等工艺的使用。中国是最早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国家，到了明代，铜活字、铅活字排字印刷技术逐渐为人们所使用。套印、砭板、拱花技术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独创，对印刷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⑤矿冶业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手工业原料、燃料原料、铜、银货币原料的需求增大了，加上外来流民解决了矿冶业开发急需劳动力的问题，因而矿冶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其首先表现在采煤业的发展。中国是第一个用煤做燃料的国家。明代的煤已普遍应用于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手工业生产中。煤矿有：南直隶和州的含山县牛头山煤矿、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白羊口煤矿、京师的西山煤矿、山西太原平定州煤矿，而作为北京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的则是京师西山煤矿的煤。

当时在煤的开采过程中，已经能做到排除矿中瓦斯，防止中毒和爆炸了，同时还采用了木支架，以防冒顶。这些技术在世界煤炭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冶铁炼钢业有了长足的进步。铁产量得到很大的提高。冶铁业最先在山西省兴起。遵化官营铁厂，规模宏大，非常有名。

在民间，冶铁业也有发展。福建所产的铁，名为“建

铁”，质量很好，因此常用于制造火炮、马枪。用这种铁制造的佛郎机炮、将军炮和锻造的鸟枪枪筒，使用时不会发生爆裂现象。山西阳城、辽东本溪也都有大规模冶铁工业。

当时的生铁冶炼工艺，已形成半连续性的操作。

第三，银矿开发业也逐渐兴旺起来。最先进行银矿开采的是浙闽交界地区，但经常遭官府封锁。在白银成为流通最广的非法制货币后，社会经济活动中白银需要量日增，于是盗掘白银矿的现象日见普遍。

5. 官府对工匠的管理

①工匠管理制度概况

明朝政府编订匠籍以管理工匠，到洪武十六年编订工作基本完成。

编入匠籍的人来源有两种，一是占主导部分的元代遗留下来的手工业者，二是因各种原因充匠的手工业者。人们一旦被编入匠籍，便子承父业，不得脱离，他们一生就是为官营手工业从事劳作。这才是官府编匠籍的真正目的，也是工匠制度最基本的内容。政府就是以匠籍制度为基础对工匠进行管理的。

继匠籍制度之后，朝廷为协调好生产，又采取了轮班制。这些轮流赴京的工匠称轮班匠，政府会发给轮班匠勘合，到时轮班匠就凭勘合到京听从工部分拨。这是明政府第

一次给工匠发勘合。

洪武十九年制定工匠轮班制度时，并没有考虑工作量，所参考的只是匠户的丁力和路途的远近。为此明政府不得不对轮班制作了修订。洪武二十六年“上令先分各色匠作业，而验在京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率三年或二年一轮”。

各种工匠合计共 62 种，至嘉靖时又新增加了 80 多种。此次接受勘合的工匠共有 232089 人。

轮班匠不仅包括京城以外的各地工匠，还有京城中的。永乐之后，为了区别于轮班匠，居住在京城中的工匠被称作是住坐匠。

明政府对工匠采取一定的补偿性措施，但这种政策是随着不同时期而变化的。洪武十九年规定工匠家不用承担任何其他杂役。洪武二十六年将这一规定作了调整。宣德元年再次对优免政策作了改动。

除了实行优免政策外，政府还规定户部每个月发给在京工匠维持生活的粮食，称为月粮，上工时由光禄寺支給直米。这项政策保证了广大在京工匠生活的延续。

清理勾补是明政府针对逃亡工匠实行的政策。由于逃匠太多，官营手工业甚至难以为继，这不能不引起朝廷对清理勾补工作的重视。正统十年规定“今后有三次逃者，发充武功中卫军，仍令当匠。敢蹈前非，杀之不宥”。这是最严厉

的惩罚。弘治六年规定若抓捕不到逃匠，要“查其初起是何州县，行移原籍官司按名勾解”。

②工匠管理制度的两次变化

明代中叶，工匠制度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一次是工匠班次的更定，一次是向班匠征银。

对工匠班次的更定是从景泰五年开始的。自洪武二十六年班匠的班次定为5种以后，60多年来没有改变，至景泰五年，五班轮流被一律改为4年一班。

此次更定减轻了工匠的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班匠征银是工匠制度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一次改革。班匠征银经过很长时间后才得以完全实施。全国范围的班匠征银最终在嘉靖四十一年得以完全实施。

这意味着班匠与明代官营手工业之间已不存在直接关系。班匠不再受封建劳役的束缚。

③对工匠的管理

明代由工部负责工匠的最高层次管理，但其中又有分别，工部要主要负责管理各地造送的班匠册和逃匠的清勾，另外一个职责就是负责到京轮班匠的分拨派遣和放归工作。

除工部外，各地官府要负责管理本地班匠。这些事务包括：起送班匠、清理工匠。另外，各地官府还有造送班匠或班匠银征收情况文册的职能。

除上述行政部门之外，朝廷还派御史监督和帮助管理工

匠。

明代的工匠管理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法规管理制度，表明明代已进入了对工匠实行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尽管这些条文常带有惩罚的特征，但它体现了明政府的一种思路 and 态度：要想维护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秩序，必须重视对工匠的管理工作。

《明律》对官方手工业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处罚也比较严厉，这一方面体现了明律本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出明政府非常重视官方手工业生产和工匠管理。

《明律》是在明初制定的，但其中关于工匠的一些条文，在以后还多次被重新提起并引用，可见法规一直是明代管理工匠的重要手段之一。

八、明代的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

1. 明代商业概况

明代社会经济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明中叶以后，商税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来源。

商业之所以繁荣发展，与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国家长期和平稳定及全国交通状况的改善和畅通是分不开的。为适应商业的蓬勃发展，明代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

系统、严格的商业制度。这一制度对过去的商业制度尤其是宋元两朝的商业制度多有沿袭，并注重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相结合，是有继承有创造地逐步形成的。

明朝的商业制度包含朝廷颁布的法规和长期商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些行业守则、条规两部分。明中叶以后，随着明王朝的逐渐败落，统治者利用订立制度的权力，加重了对商业的横征暴敛，他们极力控制商人，严重压抑、摧残了蓬勃繁荣的商业活动。尽管如此，在当时形势下，一些商业制度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们使商务活动仍然能有序进行，也保证了商品的公平交易，促进贸易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大规模开展，这就是明代商业制度鲜明的时代特点。

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朝着广、深方向发展，因此呈现了活跃的局面。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致使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商人数目的增多促进了商业活动的开展，商业活动的频繁又把国内各地市场连成了一体。商业经营者转毂四方，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更是商人的集结之地。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

海外贸易在明代也有了新的发展。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海外各国纷纷与明廷建立朝贡关系，因此，这种贸易形式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臻于鼎盛。正统以后，向明朝进贡的国家越来越少，朝贡贸易也逐渐衰弱。朝贡贸易的衰落并没有

直接导致对外贸易的萎缩。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海外各地的特产和香料，中国主要向外输出如生丝、丝绸、瓷器、铜器、铁器、食品、各种日常用具以及牲畜等商品。

在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的基础上，明代中叶以后在一些地区崛起一种商帮组织，如徽州商帮、山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它们以地域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商业力量。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在这些商帮中，资本最雄厚、人数最多、经营范围和活动地域最广阔的，当属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

明代商业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工商业市镇的兴起。这类市镇遍布全国各地，但主要分布在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

这些市镇作为商品集散中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加强了地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联系，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指出了发展方向。

2. 商品交易与货币

① 商品生产与交换

自嘉靖以来，商品生产与交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城市交通

的发达，全国商业网络的形成，货币的白银化，都是商品交易发展的有利条件。

湖州是蚕桑业的中心。养蚕者有的自己并不种桑，而预租植桑户的桑。以前用来喂蚕的桑叶已成为一种原料商品，丝成为一种成品商品，原料与成品间建立了一种商品关系。

苏州是全国最大的丝织业中心。苏州居民所生产出的产品，不只是为了自家使用，更主要是作为商品投入市场。

最晚是在万历年间，商业贸易已呈网络化发展。从云南到辽东的直线距离有 3000 公里，从广东到河北北境直线距离也有 1000 公里以上。商路距离当然要比直线距离远得多。在这条南北商路干线上，还分有东西向的商路。各地的商品沿商路往返于市场。

②货币

明洪武时，铸币与纸币并行，用金、银交易得到严厉禁止。但“大明宝钞”仍与金银有对比价格，征税也仍收白银，民间交易则始终是银、钱并用。“宝钞”进入市场不长时间，价格大跌。导致“大明宝钞”在民间经济活动中缺乏信誉，到正统时，一贯钞已抵不上一文钱。在这种情况下，“宝钞”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作收税之用，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金银已起了主导作用，由此，明政府不得不放宽禁用白银的政策。正统以后，在流通领域中，出现了白银与铜钱并行，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局面。

张居正推行的以“计亩征银”为根本原则的“一条鞭法”政策，使白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地方州县要把铜钱或实物形式的田赋兑换为白银上缴户部，这就使全国的用银量大增，同时也使国家主要货币转变成了白银。从此以后中国正式成为行用银本位的国家。

3. 商税的征收机构

明代有很多的负责征收商税的衙门，主要包括：

第一，税课司、局：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 1364 年），朱元璋就在他的领地内建立宣课司、通课司，作为征收商税的机构。明朝建立后，全国各府的商税征收衙门又被改称为税课司，州县称税课局，由户部管理。

税课司、局的职责是制定商品的纳税细则，收取各类商税，然后将收得税款“去年末的时候具印信文解明白，分害存留，起解数目”，逐级解赴上司，再由各布政司在来年解到京都户部。

各税课司、局的负责人员被称为大使、副使。

第二，竹木抽分局（厂、场）：洪武初，朝廷在盛产竹木柴薪的道路关津处，设立竹木抽分局，目的是从商人贩运的竹木等货物中抽取一部分归官方所有，供朝廷土木营造之需。抽分对象起初针对实物，后渐转化为等值货币。

宣德年间，钞关普遍设立后，有的抽分局也相应地改称

为工部钞关。明中后期，全国抽分局比宣德前又增加了50%。

竹木抽分局、场一般设大使、副使，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后来，在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朝廷会特派工部主事、给事中、御使等中央大员监临抽分。

第三，钞关：出现于明朝中叶的商税征收衙门，为明朝所特有，是为挽救宝钞，同时也为了增加日益困乏的国家的财政收入而采取的疏通宝钞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些道路、关津处，设立关卡，对来往商人征收宝钞，从而达到流通宝钞的目的。洪熙四年（公元1429年），明廷首先在南北二京间沿运河重镇设立7个钞关，于是钞关的称号就开始应用起来。其中开设时间长、较为有名的，为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7处钞关。

钞关主要向做生意时所雇佣的舟船等运输工具征税，所征之税就称“船料”。所收之税归户部所有，因此钞关是户部分司，也称户部钞关。

以上三类商税征收衙门，结构合理，人员配备很整齐，各自的分工也很明确，互不干扰，独立行事，但也有互相协作、替代的地方。如北新、临清钞关也兼收商税；浒墅钞关还兼辖周边税课司、局9处，并征商税。明中叶后，淮安抽分厂、九江抽分所还兼收商税。

除上述三个主要机构外，塌房、官店、官牙也兼收商

税。其中又属官店最为突出，“国家设立官店，用来收取税课”。景泰之后，朝廷专为官店规定了收税准则、细则，这样，官店实际就成了明朝另一征税机构。

4. 税使制度

永乐以后，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干预朝政现象严重。正统年间，有内官到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抽盘，这是宦官对商税进行干预的开始。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 1596 年）后，明神宗为增加对矿业和商税的征税，下令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并规定这些税使由内官充任，负责监收各地的矿税、商税。

税使到来后，商人必要遭受盘剥。这是因为内官税使以皇帝的名义，凌驾一切，肆无忌惮，横征暴敛。他们搜刮民财、鱼肉百姓。

明代的税使制度，给商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许多繁华的城市，经过税使的疯狂掠夺之后，店铺倒闭，商旅也不再做生意、跑买卖，负贩稀踪，市场萧条。

由于税使制度的推行，对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也没有好处，因而也遭到从朝廷到地方无数官吏的强烈反对。广大乡民，更是对税使制度恨之入骨，发动了一起又一起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而且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更是闻所未闻。万历三十三年（公元 1605 年）后，皇帝在

滥派税使上有所收敛，并对有关政策作了调整，对税使也有所约束，然而，终未彻底废除税使制度。直至神宗死后，他的儿子朱常洛即位，才“传令旨，命矿税尽行停止”。税使张晔、马堂、胡滨、潘相、丘乘云等，“即行撤回”，长达20多年的税使制度结束了。

5. 明朝政府对商人的管理

明中叶后，随着社会商业的日益繁荣，统治阶级对商人的压榨不仅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重盘苛征，同时对商人的的人身控制依然未放松。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末，扼杀了明中后期活跃的商业经济，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明代商人大致可分为坐贾与行商两大类，对于这些商人，政府都要对他们进行户籍归类与登记，以对其个人、家庭人口及资产等情况进行控制掌握，有利于封建徭役的勾派。

在明代商人中，坐贾人数要多于行商，全国各大中城市和新兴城镇几乎都有坐贾的行踪。明中叶后，坐贾人数更是大幅度增加。这些人构成了城市人口的主要部分。

对这些人数众多的商户，朝廷采取将其纳入户籍的方法。

行商由于流动性大，管理起来不太容易。一般在原籍进行注册登记，按照规定承担役税。明前期行商的占籍制度还

不太完善。至明中叶后情况有了变化，无论行商坐贾，也无不论以前是什么身份，只有占籍之后才能合法贩运经营。

商贾占籍后，就意味着要处在封建徭役的金派之下。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不加入商籍。而大批商贾的逃匿，就使沉重负担落在了剩下的一部分人的身上，这一部分人不堪忍受，只得也采取逃匿的办法，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尽管明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铺户逃亡者、脱籍者仍屡禁不止，这大大影响了统治者派役和搜刮利益，于是明廷又制定了一套制度——清审制度。

所谓清审，就是对商贾的占籍情况进行清查核对，除去亡故、破产者的名字，官府通过清审制加强了对铺商的人身控制。

在万历年间，清审之风刮到了各名邑都市，边防重镇也不例外。

6. 城市与国内贸易的发展

随着明朝手工业和手工业工场的发展，旧城市逐渐扩大和新城市不断兴起，在 16 ~ 17 世纪，这些城市都成了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的中心。

① 城市的分布

明代的南京和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不但是政治中心也是南北经济的枢纽。这两个城市都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和

商业，还出现一些特殊的区域，如坊、巷、街、市，它们与一定手工业或商业部门都有联系。后来北京就作为中心与北方、西北、东北的省会和州县共同形成了北方城市经济体系；江南、东南、西南的省会和州县，则以南京为中心，形成南方城市经济体系。明朝还兴起了一些都会城市，它们大多是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在经济上都各有各的特色。自南北大运河开通后，运河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如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这些运河城市的经济非常发达。

其他都会城市如湖广的武昌、四川的成都、浙江的杭州、江西的南昌、福建的福州、广东的广州等都虽仍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但由于城市间商路的畅通，仍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②新兴市镇的崛起

嘉靖时期，在原来的城市，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还不完全具备传统城市的条件，只能称为“市镇”，但它们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带动，人口急速增长，商业、手工业较快地发展起来。

这类市镇，大都是商贾聚集之处，所谓“市”可能指交易市场、商业活动中心。而所谓“镇”可能指其已具有一定的城市规模。

新兴的市镇，大多坐落在江南的苏、松、杭、嘉地区。

这些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丝织业、棉纺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具有比较稳定的商品市场、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所以人民生活水平仍高于其他地区。而且商税与其他地方持平，抵消了田赋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传统的大都市和新兴的市镇，凭借着发达的商品交易，通过市场提供给居民一切衣食需用。

③发达的集市贸易

集市贸易在中国源远流长，明代更加繁荣。所谓集市，是民间贸易的一种，按固定的时间举行，是民间贸易最主要的形式，它沟通城市与乡村或乡村之间的经济往来，商人主要从这里买卖物品，民间也在此进行买卖活动。

北京城内有不少时间和地点都固定的集市。集市的繁荣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集市活跃了农村的经济，为农产品商品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7. 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

在明初，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出现在纺织业当中。

在明代末叶，苏州、杭州、松江等处出现了一些个体纺织者，最初是自备原料，自己劳动，后来觉得有利可图，逐渐增加织机，自己不再从事劳动，而雇用工人进行生产。还有的是以布商身份，事先准备好原料分交给机房、染房、踹

房等部门，然后依照工序施工，最终完成纺织品的生产。前一种，是由小商品生产者分化出来的手工工场主；后一种，个体纺织者已具有包买商的身份，实际上是他们把分散在社会上的一些生产单位吸收进来，形成手工工场。这两者，都已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过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还只出现在东南少数地区的少数生产部门中，这说明当时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

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出现，经历了近 300 年，但始终没有得到机会继续成长。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的自给自足经济结构的顽固性。这种自然经济的顽固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发展，阻碍了产业资本为自己开辟道路。

第二，手工业行帮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行帮形成于唐宋时期，它不是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组织，而是封建国家强加于手工业者的一种编制。到了明代，行帮已成为编制手工业者的普遍形式。规定构成了对发展与竞争的限制，这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很大的障碍。

第三，封建国家对商业、手工业征收的重税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第四，手工业商业要经常承担风险，相比之下，封建地租和高利贷更可靠些。所有这些封建因素都阻碍社会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对资本主义的成长十分不利。

第五，明代朝廷严重限制海外贸易的发展，这是对商品的对外销路的人为封锁，很不利于商品生产的发展。

总之，当时的封建势力还很顽固，资本主义萌芽尚处于幼年期，还不能取得自己的独立发展。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特色。

九、明朝的对外贸易和对外关系

1. 对外贸易

明朝时的中国与中亚各国，以及太平洋沿岸各国都有广泛的联系。明朝把这些国家基本上都看作是中国的藩属。

明代的对外贸易原有属于官方管辖的“朝贡贸易”和私人经营的私商贸易两种形式。前者是由朝廷经营，其中也掺杂着政治因素。

朝贡贸易在永乐、宣德时期，十分发达。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就是要扩大这种朝贡贸易。洪熙时不再增加新的朝贡国，并削减了赏赐数量。于是明初一度繁荣的海外朝贡贸易慢慢萎缩了。

私人的对外贸易活动，在明初海禁政策的限制下，发展十分缓慢。

由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织品、五金制品；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香料、颜料、药材、银、珍珠和其他

贵重物品。

海外贸易主要在中国东南和南部的港口（泉州、宁波、特别是广州）进行，它们于 16 ~ 17 世纪逐渐发展为海外贸易最集中的地区。但欧洲殖民者和商人大量入侵南洋地区，使中国对南洋诸国贸易大大减少。

当时的日本也是中国的贸易对象之一，贸易频繁广泛。

同日本之间的“进贡式”贸易关系，一直延续到 1547 年。后来被倭寇的劫掠行为打断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紧张起来。

2. 对外关系

①与西欧殖民者的冲突

十六世纪时，欧洲人多次企图侵略中国。最先的侵略者是葡萄牙人。1511 年，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中心马六甲，落入了他们的手中，然后他们由这里逐渐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整个南洋地区，并把一部分中国人赶走。

神宗万历时，葡萄牙殖民者继续在澳门扩展其势力，由于得到了一些好处，明廷也放任葡人租占澳门。

1601 年，荷兰派出两艘备有大炮的战舰，驶进澳门港内，自称与中国通贡市。1603 年，又有荷兰船舰炮击澳门，对商船进行焚烧、抢掠。次年，荷兰派军舰来攻，并进而侵占台湾岛，在台湾“筑室耕田，久留不去”。

从 1554 年起，明朝恢复了同葡萄牙人的贸易，准许他们定居澳门，于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自己的贸易殖民地。1557 年，葡萄牙人贿赂明朝的大官僚，获得澳门的租借权，但必须每年向中国交纳 2 万两白银作为租金。这是欧洲殖民者首次在中国境内获得了租界。被葡人租占后的澳门，不仅是商业贸易的基地，也是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中转站。1579 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来澳门学习汉语，第二年，去广州并向两广总督馈赠礼物。1582 年，又获准去肇庆传教，1590 年回国。意大利贵族出身的传教士利玛窦曾同罗明坚在肇庆一起传教，并努力学习汉语。利玛窦 1589 年移居韶州，以后又到过南京、北京与南昌等地。1596 年，他被教廷任命为耶稣会在华会长。1601 年，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向明神宗贡呈珠嵌十字架、自鸣钟及《万国图志》，神宗很喜欢他，他获准留住京师。利玛窦为了能与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交往，撰述各种天文、数学、地理、语言学等方面的著述，为西方的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1610 年病死于北京。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继任耶稣会在华会长。

16 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人占领了一部分中国海域的群岛，并以此为基地进行侵略活动。为了纪念一个西班牙皇子，就以他的名字把这片岛屿定名为菲律宾。1574 年，中国人在菲律宾起义失败，中国商人便被完全逐出群岛，两国

贸易一度中断。

荷兰人于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沿海活动。1624 年，荷兰人侵占了台湾岛的一部分，盘踞了 40 年之久。1661 年爱国志士郑成功率军攻入台湾并最终将荷兰殖民者赶出了中国。

英国人在 16 世纪末也入侵过中国，但未能得逞。后来，1637 年，英国的武装商船开到广州，并获得在那里的经商权。

从 16 世纪下半叶起，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17 世纪下半叶和 18 世纪活动最为频繁。

欧洲人在 16 ~ 17 世纪时入侵中国后，造成了中国在南洋诸国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削弱，使得明帝国的海外贸易因失掉对南方海路的控制而大大减少。

②与蒙古和女真人的关系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于 14 世纪 60 年代末被消灭。

明武宗时期，蒙古诸部被称为鞑靼，他们在达延汗的统治下，开始获得新的发展。

明世宗时，统领右翼的俺答汗以河套地区为据点，实力大增。1550 年侵入明朝境内，直抵北京郊外。1541 年，俺答汗企图与明朝恢复贸易关系，但遭到明政府拒绝。直到 1570 年双方才正式缔结和约。明朝政府在边疆各地开辟了市场以便于与蒙古通商。

16 世纪末，女真人（从公元 1636 年起叫做满洲人）开始侵犯中国东北边境。此时满州（现今东北）南部和一些其他地区已是明朝的势力范围，在满洲的其余地区居住着许多独立的游牧和半游牧女真部落。

16 世纪末，女真族中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人，1582 年成为其中一个部落联合的领袖。中国政府把努尔哈赤部当作明朝的一个附属国，曾多次诏令他参加军事行动。

努尔哈赤经过 20 年的斗争，最后终于统一了汗国。1601 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军队，每个部队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区分标志，“八旗兵”叫法由此而来。1599 年努尔哈赤制订了新的文字，即所谓满文，从而取代了原先的女真文和蒙文。

努尔哈赤在 1616 年称汗，定国号为“金”。两年以后，满洲人侵入辽东，攻占了抚顺城。

1620 年，几乎整个辽东都被努尔哈赤占领了。同年，满洲人又征服了许多蒙古汗国。1627 年，满洲大军侵入朝鲜，迫使朝鲜缔结条约。明朝同满洲人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

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公元 1626 ~ 1643 年在位）继位后继续与中原进行战争。1636 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

在侵占了内蒙古和完全打败朝鲜以后的几年间，满洲人

无所顾忌，径直侵犯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几省，大肆掠夺，攻占城市，甚至对首都构成了威胁。

③与朝鲜的关系

明朝与朝鲜基本上保持着友好往来、和平共处的友邦关系。万历年间明政府两次派兵援朝抗倭，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的辉煌篇章。明末，随着女真族在东北的崛起，两国关系也随之有了改变。

万历二十年（公元 1592 年）初，日本丰臣秀吉出兵攻打朝鲜。在 3 个月时间里，朝鲜全国几乎为日军所吞没。朝鲜国王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

明朝得知此情形后，遂派副总兵祖承训、辽东游击史儒率军 3000 余去朝鲜支援，结果明军全军覆没。明朝大为震动，神宗派兵支援。次年一月援军抵达平壤城外。经过激烈战斗，明军大败日军，这就是著名的“平壤大捷”。收复平壤后，明军与朝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相继收复了开城、汉城等地。汉江以南千余里的原属朝鲜的故土都被收复。

然而在援朝抗倭战争即将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关头”，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却力主与日和议罢兵。丰臣秀吉以和议为缓兵之计，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 年）二月，重新调集 14 万大军，再次侵入朝鲜。

明朝派兵，再次助朝鲜抗击日军。在朝鲜军队的密切配

合下，打得日军节节败退。次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去，明军乘势加紧发动进攻，日军死伤无数。抗倭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战争的胜利，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气焰，维护了朝鲜的独立和明朝边境的安全，但另一方面，战争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国力。

④与日本的关系

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嘉靖时又开始了。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 1647 年），明朝命赣南的巡抚右副都御史朱纨督巡浙江，监管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整顿海防，闽浙海商因为自身的利益受了损失，于是联合起来攻击朱纨，朱纨愤而自杀。海防的实力于是更遭削弱，海盗与倭寇的活动也更加猖獗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倭寇问题，明朝不得不再设巡视大臣。嘉靖三十一年（公元 1552 年）任命佥都御史王忬任提督军务，负责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 1554 年）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随机应变。同年秋，又任命其为右都御史，同时担任兵部右侍郎，专总督军务讨贼，还负责兵部的事务。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五月，诏令逮治张经。

就在此时，张经又继续指挥明朝大军与倭寇在王江泾展开激战，取得王江泾大捷，被当时人们称为自有倭患以来“为战功第一”。

王江泾大捷后，世宗却命人将张经押送到北京，十月，将张经斩首。张经死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胡宗宪设计消灭了海盗徐海、汪直等人，屡获胜利，但“新倭复大至”，又继续骚扰闽浙沿海地区。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戚继光担任参将，负责守卫台州、金华、严州三郡，以抗击倭寇。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军队已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在战场上，这支队伍英勇善战，立了多次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倭寇大肆侵掠浙东洮渚、圻头。戚继光率领人马急忙赶到宁海，扼守洮渚，在龙山大败倭寇。倭寇大败而逃，乘虚袭击台州，戚继光带兵回来应战，也大获全胜。戚继光先后九战九捷，浙东的倭患才平息下来。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戚继光被调入福建，在横屿、福清、兴化等地的战役中，戚继光又获全胜，戚继光回浙后，又有大批新倭来福建。次年四月，戚继光来到福建，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戚继光所率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部相继突入，共歼灭倭寇1200人，嘉

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广东总兵俞大猷在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吴杜芒的支持下，与其他将领先后在海丰等地击败倭寇，广东倭患也平息下来了。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虽然抗倭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明王朝在战争中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通过这场战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开放海禁会带来很大的坏处。明廷也鉴于嘉靖时“倭乱”的教训，到隆庆时开始部分地开放海禁。

3. 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入侵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发展阶段。欧洲各国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迫切要求发展海外贸易。葡萄牙人首先进入中国，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紧随其后。

① 葡萄牙占领澳门

世宗嘉靖年间，除倭寇以外，葡萄牙殖民者的势力也已扩展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葡萄牙人首先到达中国是在正德九年（公元 1514 年），他们在广东沿海的屯门登陆。次年，葡驻满刺加总督派遣菲莱斯特罗正式出使中国，葡官方与明朝的正式交往从此开始了。

正德十二年（公元 1517 年），葡萄牙人径直驶入中国内河，进入广州城。正德十五年，葡使皮莱资到南京，要求与中国通商，被拒绝。嘉靖初，葡使回广州被囚禁，嘉靖三年（公元 1524 年）五月死于广州。

葡人来中国，主要是为了打通与中国的商贸关系，而明朝则一味闭关锁国，一概禁止朝贡以外的私人海外贸易。中、葡之间的这种矛盾，必然爆发冲突。

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明朝下令将占据屯门（今广东深圳蛇口）的葡人赶出去。嘉靖二年（公元 1523 年）初，葡萄牙五艘船只来到广州，请求通商，遭到拒绝。葡人遂改为攻打广东新会，但遭到备倭指挥柯荣的打击。这两次冲突后，葡人遂转向闽、浙一带，并与当地沿海海商互相勾结。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宁波附近的双屿，把葡萄牙人全都赶跑了。次年，朱纨又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率兵进攻福建的浯屿（今金门），也大获全胜。

葡萄牙人虽几次被明军驱逐，但仍妄想在中国沿海占据一个通商据点，于是他们偷偷地把目标放在了位于珠江口边的澳门。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葡商私下贿赂海道副使汪柏，以货船遇到大风浪，打湿了货物为由，请求在澳门晾晒。他们的诡计没有被识破，于是他们便想长久居住下去。

到万历时，在澳门的葡人已多达万余人，势力膨胀到了极点。神宗即位后，即向在澳门经商的葡萄牙商船收税。明朝因有利可图，也就对葡萄牙人入侵澳门一事听之任之。但明廷对在澳门的葡人却一直戒备森严，因此在整个明朝的统治时期，澳门始终保持着稳定。

②西班牙迫害华侨

西班牙是紧随葡萄牙之后来到中国的第二个国家。隆庆五年（公元 1571 年），西班牙人占领了吕宋，并以吕宋为基地，与中国发展商贸关系。

西班牙占领吕宋后，极力招徕华人开发吕宋。明朝后期，越来越多的中国沿海人民前往吕宋垦殖、采矿或从事其他手工业生产。另外，西班牙人为了获得中国的商品，促进吕宋的繁荣，在马尼拉附近专门为中国商人建立了一个经营丝绸的市场，后来很多华人在此长期住了下来，人数激增至万人，他们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这不得不使西班牙殖民者提高警觉。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西班牙人加紧了对华侨的迫害，华侨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万历二十年（公元 1592 年），西班牙殖民当局突然下达了驱逐华侨的命令。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对吕宋华侨进行了第一次大屠杀，二万五千个华人被处死。这次事件是由“采金案”引起的。许多华侨被杀，其中以漳、泉人为多。于是，不少华人纷纷逃回家乡。华人离开后，西班牙人

的贸易收入也相应地减少了，于是又招抚流离失所的闽商到吕宋。与此同时，明朝也遣使前往，告诫西班牙人“不要妄自猜忌”，不要再杀害华人。万历三十三年以后，逃离吕宋的华人又陆续返回。但到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吕宋华人又遭到一次屠杀，被杀害的有二万二千人之多。

③ 荷兰侵占台湾

荷兰，在明朝时被叫作红毛夷或红毛番。它来东方的时间比葡、西二国要晚。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 年），荷兰武装船队到达澳门，想发展贸易关系，葡萄牙人没有允许。荷人在澳门逗留一个月，毫无所获，快快而去。这是荷兰与中国第一次交往。万历三十一年（公元 1603 年），荷兰军舰来到澳门，劫夺葡萄牙一艘商船。万历三十三年，荷兰军队再次进逼澳门，但因葡萄牙人防守坚固，只好无功而返。此后，荷兰人对澳门的多次进攻都没有成功。

荷兰人在广东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便转而妄图在福建沿海夺占地地方作为通商据点。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 1604 年）八月，荷兰军舰驶抵澎湖，明朝的一些官员极力主张赶走他们。于是总兵施德政派兵把守要塞，又命令将官沈有容率兵前往勒令荷军退兵。同时，施德政下令严守海岸，切断荷军在海上的后援之路，还声称要火攻荷军，荷人终于离去。这次占领澎湖，前后约五个月。

荷兰人从澎湖撤走后，又占领了台湾南部，在以后的几年里陆续修建了安平城（又名台湾城，荷名热兰遮城）、赤嵌城（今台南，荷名普罗文查）。与此同时，他们还建学校，设医院，招民开垦荒地，并以此为基地，发展与中国、日本的贸易关系。天启六年（公元 1626 年），西班牙人为了对抗荷兰，侵占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和淡水。崇祯十五年（公元 1642 年）荷兰人将西班牙人驱逐出境，台湾完全落入了荷兰人的手里。

十、明朝中后期的文化

明朝时期，中国的文化取得了新的发展，成就颇丰，主要表现在，出版了许多历史著作，出现了新的百科全书，建筑术也更加丰富，漆器和细瓷器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世纪儒家繁琐哲学的限制和束缚下，仍持续向前发展。

1. 科学的发展

16~17 世纪，中国在技术、自然科学和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明末，发明了改良的灌溉用水车。锻铁风箱更广泛地被应用于熔炼金属技术中。造船业也得到了发展，郑和海上远征的大船全是由明朝自己设计建造的。

明朝是一个重视八股文的时代，大多数的读书人都把读

书做官看作是自己惟一的出路。明朝中后期，随着心学的崛起与传播，理学走向没落，晚明的读书人越来越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在被视为末技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①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李时珍（公元 1518 ~ 1593 年），字东壁，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家中世代为医。

从 24 岁开始，李时珍在父亲的带领下正式行医。他治病注重“辨证施治”，“脉症合参”，用药根据药性，加以灵活处理。他还根据从实践得到的真知驳斥了方士荒诞不稽的邪说。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 1552 年），李时珍为楚王的儿子治好了气厥病，被任命为楚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当时他才 35 岁。几年后，李时珍又被荐举到京师太医院任职，一年后即托病辞职返乡。在楚王府和太医院任职期间，他翻阅大量的珍藏的医药书籍，见识了珍贵药材以及外国进贡的药物，开阔了眼界，为他日后修撰《本草纲目》奠定了基础。

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始终本着钻研和求实的原则。当他发现世传《本草》有不少的谬误、遗漏时，他就立志要编出一本新《本草》，以指导人们正确鉴别药物品种、认识药性，同时也方便医生们行医治病。

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44 岁的李时珍开始编写

《本草纲目》，经过三次大的改动，经历近 20 年的努力，直到万历六年（公元 1578 年）才最后定稿。

《本草纲目》的编写，是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基础，结合李时珍通过野外考察、访问、查阅图籍得来的新资料，根据新的分类标准，加以创新而得出的。全书共 50 卷，190 余万字。李时珍在书中把药物分为 16 部、62 类，收载药物 1892 种，比前人增加 374 种，载入药方 11091 个，是以前医书的 4 倍，同时附有动植物插图 1110 幅。

《本草纲目》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它订正了前人科学成果中的错误，同时还补充了许多新发现的研究成果，体现出我国医药学水平的提高。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 1596 年），《本草纲目》在南京第一次付诸印刷，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 年）流传到日本，后来又被译为各国文字传入朝鲜及欧洲各国，对世界药物学和植物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②徐宏祖和《徐霞客游记》

徐宏祖（公元 1586 ~ 1641 年），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今属江苏省）人。他家道殷实，祖辈都是隐居学者。他从小就对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一类书籍很感兴趣，所以他一生都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从 22 岁开始，他就出游四方，“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

母亲的衷心支持与勉励，使徐霞客的信念大增。在 30

年的旅游生活中，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历尽艰险，云游四方，遍览名山大川，在科学考察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徐霞客以日记的形式记下每次出游的所见所闻以及内心感受，因而日记的内容丰富多彩，山脉江河、地形地貌、奇峰异洞、瀑布温泉、风土人情、民族关系、边疆防务、矿石物产应有尽有。后人把这些文字编辑出版，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徐霞客游记》。

这部科学文献采用清新绮丽的散文手法，所以它既是文学名篇，又是重要的地理学文献。

《游记》的价值更体现在它是一部科学巨著。在这部著作里，勘察了江河的源流，考察了地形地貌，对动物、植物生态品种作了比较和鉴别，还对矿产、物产、水文气候作了仔细的观察和记述。其中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创造性考察和研究，比欧洲人早了 200 年左右，这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徐霞客不读死书，通过实地勘察，写出了著名的《溯江纪源》（又名《江源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推翻了《尚书·禹贡》提出的“岷山导江”一说。

此外，他还对盘江等诸多江河的源流作了考证，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的混乱和错误。

徐霞客毕生从事旅行事业，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

人。他的行迹遍及今天的 19 个省、市、自治区，旅行考察区域之广，实属罕见。他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系统描述自然的先例，体现了近代的科学精神。

③宋应星和《天工开物》

宋应星（公元 1587 ~ 1661 年前后），字长庚，江西奉新人。家中世代为官，他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 1615 年）乡试考中举人。崇祯七年（公元 1634 年）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后来又先后担任福建汀州推官、安徽亳州知府等职务。清兵入关后，他弃官返乡，在乡村度过了余生。

宋应星关心世事，注重了解农、工、商各行各业的情况，强调对客观事物仔细观察和调查。他关注国计民生，注重总结对发展社会经济有利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验。

宋应星一生有很多著作，如《卮言十种》、《画音归正》、《杂色文》、《原耗》和《天工开物》等，其中前四部已失传。

宋应星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著作要数《天工开物》。此书写于分宜教谕任上，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由宋应星的朋友涂伯聚刊行。

《天工开物》全书分上中下 3 卷，又细分 18 卷，每卷一目，还附有 123 幅插图，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著，内容涉及到衣食住行、金属冶铸、锻造、矿物的开采、矿石的烧炼、造纸、兵器、火药、颜料、酵母剂的制造、珠宝玉料的开采等等，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社会生产行业，既对我国古

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成就作了总结，又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生动反映。

《天工开物》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首先，它总结了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经验，并详细记载了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水稻的有关情况。

其次，《天工开物》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阐述了自然界和生活中的一些知识，为破除迷信做出了贡献。

第三，《天工开物》善于引用数据加以论证。这种注意运用具体数据的方式，对只注重定性描述的传统思维方法是一种突破。

《天工开物》出版后，很快流传国外。1869年，它有了法文译本，译名为《中华帝国古今工业》。但遗憾的是，《天工开物》在清朝年间就失传了。辛亥革命后，才又有从日本刻本转手重印的版本传入中国。解放后，我国在浙江宁波发现了崇祯十年的原刻本，再印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④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徐家汇）人。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35岁的徐光启考中解元，3年后在南京结识了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经过一番长谈后十分佩服利玛窦的知识，从此二人结成了朋友。万历三十

一年（公元 1603 年），他成为一名天主教教徒。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 1604 年），徐光启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他把家搬到了北京。从 1606 年开始，徐光启便和利氏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向利氏请教起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来。他深深地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心只想读书做官，只知死记经书教条，轻视实学，学术空疏，这是导致中国科技停滞落后的真正原因。于是便着手与利氏合作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翻译成汉语以在中国传播。

魏忠贤专政时，徐光启因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被罢了官。崇祯皇帝即位后，他重新担任了礼部左侍郎，不久又提升为礼部尚书。他向朝廷建议，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来改进历书的编写。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让他主持开局，聘请耶稣会士修订历法。历时多年，终于编出了一部一百多卷的《崇祯历书》。

作为一个科学家，徐光启的最重要成就是编写了《农政全书》，书中总结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同时吸收了西方科学技术，是一部“总括农家诸书”的，集我国古代农学大成的巨著。

《农政全书》大约成书于天启五年——崇祯元年（公元 1625 ~ 1628 年）间，在徐光启生前并没有得到刊印。直到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才由陈子龙等人整理刊行。全书 60 卷，50 余万字，分为十二门：农本、田制、农事、水利、

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其中“水利”和“荒政”内容最多，是全书的重点。

《农政全书》的价值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重视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的总结。它不但辑录了古代 300 多种重要的农学文献，对明朝当代农学家以及徐光启本人的农业实践经验也作了及时的总结，使一些传统的农田园艺知识和新经验得以流传推广。

第二，注意提倡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推广。

第三，表达了“人定胜天”思想，反对保守。但在徐光启的时代，他的这类科学思想根本无法变成现实。

2. 哲学思想及代表人物

①阳明心学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今余姚市）人。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公元 1481 年）的状元，曾担任南京吏部尚书。

正德五年（公元 1510 年），刘瑾被诛，王守仁从此仕途一路顺畅。他先是升任江西庐陵知县，不久升为刑部主事，调吏部主事，再晋升为员外郎。一年内，官级连升了三次。不久又升鸿胪寺卿。

阳明心学表现的是一种读书人的人生态度。它教导读书人以康济天下为己任，在不理想的政治与社会体制中，充分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为外物所累，把握住自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社会、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些主张与张载的话不谋而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阳明心学是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但在研究过程中，王守仁发现了程朱理学的一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王守仁阅读佛教与道教的经典。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王守仁因触犯大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这场人生巨变，促发了他的思想转变，终于感悟“心即理”的真实性，由此他创立了阳明心学。

王守仁从认识论的角度认识“心即理”。在这里，王守仁已初步对感觉与知觉的联系与区别作了论述。王守仁的论述涉及到了心的知觉功能与感觉器官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心（脑）对感觉的选择、重组作用，也就是心主宰身。

在王守仁的心学中，所谓“心即理”，指的是人的思维对仁、义、理、智、信的伦理模式的把握是直接的，不必求之于外。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人性修养的方法就必然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建立在这种修养方法之上的行为倾向，是一种积极坚定的行动主义。

阳明心学是理学的逻辑终结。尽管王阳明的目的是“破心中贼”，以巩固封建秩序，但事实上，王学在历史上却为思想解放种下了诱因。它成为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的人文

思想的前音。

②李贽童心说

李贽（公元 1527 ~ 1602 年），号卓吾，又号宏甫，福建泉州晋江（今属泉州市）人。李贽思想的核心是“童心说”。

李贽把童子当作是人的原初，童心是心之初。童心代表着纯真。童心泯灭，真心也随之丧失。失去了真心，也就失去了作为真人的根本。

李贽推翻了《六经》、《论语》、《孟子》的经典权威地位，否定了孔、孟的思想永恒不变的真理。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是非观（真理观）。

李贽强调了真理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它具有相对性。虽然在当时没有产生近代的实验科学，更不会有现代的科学哲学的情况下，他的真理观还略显粗糙，但与同时代人以孔子的学说作为万世不变的真理的态度和所有的教条主义相比，更接近真理的本质特性。他的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呼吁人们给思想以自由，强调文化与思想的宽容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中国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和统治者对文化与思想的钳制，正好与这种宽容精神相悖，是中国从先进的文明大国沦落为近代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的重要原因。

李贽还以童心说与人人道德平等的观念批判了道学家的“道统”说。“人必有私”是李贽进一步提出的一个问题。

李贽的思想充满矛盾，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一方面，他反对把事功看成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外在化，主张实学、经世，但另一方面，他在政治理论上并没有脱离“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模式的限制，在思维方式上仍是将“外王”看成“内圣”的合理结果。因此，虽然他对个人功利做了肯定，即肯定了个人利益，但由于他没有突破“内圣外王”的模式，所以他所提倡的要保护个人利益，仍只是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③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

黄宗羲（公元 1610 ~ 1695 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父亲黄尊素是位东林名士，积极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天启六年（公元 1626 年）被魏忠贤阉党杀害。当时，黄宗羲只有 17 岁。两年后，新天子审判阉党，他藏铁锥于袖中，入京替父亲申冤。黄宗羲也因此而出了名。清军南下，强迫人民蓄发，并对人民实行野蛮屠杀，江南人民奋起抵抗。他与钱肃乐等人组织地方抗清武装，号“世忠营”。此时的黄宗羲是南明鲁王政权的左副都御史，他带领武装队伍在四明山结寨防守，反抗清军。南明灭亡后，清廷多次前往征召，都被他拒绝。他最终隐居山林，著述以终。后世称他为梨洲先生。

黄宗羲的幼年到中年时期，是明朝专制皇权与大贵族走向全面反动的时代。黄宗羲突破心学的藩篱，摆脱狭隘忠节

观的束缚，以对民族的无比热爱和深邃的思想，及时分析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倡导以立法限制君权，使之为人民服务。

早在清顺治十年（公元 1653 年），44 岁的黄宗羲写成《留书》8 篇，批判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十年后，又写成了《明夷待访录》，系统阐述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

黄宗羲主张制定符合天下万民利益的“公法”来取代维护专制君主一家一姓利益的“私法”，不能全靠“正君心”的把戏，因为公法符合人民的利益。这意味着他认为限制王权应用现实的规则、法律而不是用空洞的说教。这些规则起到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作用，可以由此达到“治”的局面。针对儒家有治人无治法的情况，黄宗羲推陈出新，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意思是说：必须先有了能保障天下太平安宁的法律，能保证天下太平安宁的人（君主、政治家）才会出现。只有先有了治法，治人出现才是必然的。这是近代的法治思想，是与先秦法家以法治反对人治有所区别的崭新的思想。

为此，黄宗羲主张把从国子监到府、州、县的各级学校改造成类似近代立宪议会的机构。

黄宗羲的民主主义思想，在那时肯定不能公之于众，但他希望有朝一日，他的思想能够实现。所以，他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留书》、《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最后如愿以偿，《明夷待访录》给 19 世纪末中国的近代民权思想者以很大的启发。

王夫之（公元 1619 ~ 1692 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他一生著作很多，主要哲学、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黄书》、《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读通鉴论》、《宋论》等。

在明末清初的三位大师中，王夫之以哲学见长。一方面，他对理气心性作了细致和透辟的论证，对宋明理学作了总结，批判了王学，对程朱的学说作了修正，发展了张载的“气”唯物论，并把它作为正统学说；另一方面，他又系统阐述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并把它提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哲学高度。

王夫之从哲学上指出了以心性修养代替外在事功的弊端。他发现，单纯从道德上看是恶的行为，在实际行动中却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他把这种“恶”称为“势”。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夫之并没有真正发现历史与道德的巨大矛盾，从而进一步将它展开概述，但在那个时代，他的确走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尽头。

顾炎武（公元 1613 ~ 1683 年），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他出身“江东望族”。清兵下江南时，他与归庄、吴其沆等人参加了江阴、嘉定、昆山三县的抗清起

义。后来，清政府渐渐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复明无望，他便不登权门，不涉利路，拒应博学鸿词科，以著书立说终了其生。他的代表性著作是《日知录》。

顾炎武的政治社会思想，仍处于启蒙阶段。他反对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主张应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反对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认为应将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他肯定下层人民议论国事的权利，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认为政府理应受到人民的监督。

顾炎武做学问的方法对后人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他反对心学末流不愿读书的做法，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他指出，知耻为做人之本，博学才能成就事业。

他开创了一种新学风，后来称为“朴学”或“考据学”。在他之后，学术史开始转入为考据而考据的狭路，以至于出现了乾隆、嘉庆时代所谓的“专门汉学”。这种汉学研究方法烦琐冗碎，考之于不必考之地。就这样，启蒙主义的思潮最终还是被伪古典主义的潮流淹没了。

3. 小说和戏曲的繁荣

白话小说的发展是明朝最大的成就，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小说于明清时期在文学史上具有和唐诗、宋词、元曲同等的地位。明清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其中前三部完成于明

代。在这三部之后，过了一百余年，又出现了奇书《金瓶梅》和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明代小说创作进入一个繁荣阶段。

《西游记》成书于明代后期。作者吴承恩（约公元 1500 ~ 1581 年左右），他的父辈曾为官，后来成了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却很有教养。

《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一样，是从讲故事慢慢演化为长篇小说的，但吴承恩的创作却是最为根本的。它虽是一部神魔小说，人情味却很浓。正义与邪恶斗争的严肃主题，经诙谐、怪诞的方式展开后，洋溢着乐观与浪漫的情趣。

如果说《西游记》是人世在神魔世界的折射，那么《金瓶梅》则是对人世间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直接刻画。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作家单独完成的长篇小说。作者署名为兰陵（今山东峄县）笑笑生，大约成书于万历中期（公元 1582 ~ 1602 年）。全书描绘出封建社会没落时期丑陋、变态的社会面貌和家庭关系。整部书就像是一幅描绘晚明世俗人情的图画。其写作技巧，对结构、方言俚语的运用，人物的刻画，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到天启、崇祯年间，市民的文化水平相对提高，印刷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文学艺术逐渐变成一种商品，从而出现了面向市民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

《三言》是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

言》，是一本宋元明话本总集，由冯梦龙（公元 1574 ~ 1646 年）加工编纂。《三言》共收话本 120 篇，其中三分之二是按照明人话本或模拟话本样式创作的拟话本。

《二拍》指的是浙江乌程人凌旺初（公元 1580 ~ 1644 年）创作的拟话本总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书共收 78 篇拟话本小说。由于作者推崇封建教化，书中充满了忠、孝、节、义的伦理说教，但也有例外。

明后期的戏曲也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家和有影响的作品。徐渭、汤显祖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徐渭（公元 1521 ~ 1593 年），字文长，浙江山阴人。徐渭多才多艺。他自己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他的诗文很好，善草书。戏曲虽是他的业余之技，但他对此仍造诣颇深。他的戏曲代表作品是《四声猿》（包括《渔阳弄》、《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他赋予传统的题材以现实性，表现了对黑暗势力和封建礼教的极端蔑视，艺术风格则体现出豪迈奔放、无拘无束的个性。

汤显祖（公元 1550 ~ 1616 年），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江西临川（今抚州）人。他自视甚高，“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一生只做过几任小官。他是个正直的人，曾师从泰州学派学者罗汝芳，继承了他的个性解放与人权思想。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歌颂爱情，感人至深。该戏曲写成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 1598 年），三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

们的喜爱，经久不衰。

与小说、戏曲相比，明后期的诗文创作就显得有点乏力。

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公元 1475 ~ 1531）为首的“前七子”发起了文学复古运动。嘉靖、万历年间，又有以李攀龙（公元 1514 ~ 1570 年）、王世贞（公元 1526 ~ 1571 年）为代表的“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在诗文复古派盛行的这段时间，作为前后七子反对派出现的是以归有光（公元 1506 ~ 1571 年）为代表的“唐宋派”。他们提出“变秦汉为欧、曾”，主张写文章要直截了当，要有自己的见解，与前后七子走着不同的创作道路。因此，“唐宋派”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归有光的散文成就较大。

万历时期，“公安派”继续反对复古主义。袁宗道（公元 1560 ~ 1600 年）、袁宏道（公元 1568 ~ 1610 年）、袁中道（公元 1570 ~ 1623 年）兄弟是其代表人物。和“公安派”同时反对复古主义的，还有以湖北竟陵人钟惺（公元 1574 ~ 1625 年）、谭元春（公元 1586 ~ 1637 年）为代表的“竟陵派”。

4. 西学东渐

明朝后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公元 1573 ~ 1644 年），东方航路被发现后，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东方，欧洲

的一批耶稣会士也开始到中国传教。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精神的觉醒作出了贡献。

①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公元 1552 ~ 1610 年），号西泰，意大利马塞拉塔城人。他是一个贵族，少年时曾在故乡的耶稣会书院学习，后来就读于罗马神学院，1571 年加入耶稣会，曾得到罗马神学院教授、著名数学家克拉维斯的教导。他于万历十年（公元 1582 年）来到澳门，其传教的足迹遍及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

为了能真正融入到中国社会，利玛窦积极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因而，他精通儒家的经籍、诸子百家、中国历史，并能流畅地讲汉语和书写中文。同时，他也注意了解、尊重中国的风俗与礼节。名士瞿太素、李贽、王应麟等人都和他有密切的交往。一些达官显宦，如两广总督郭应聘，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徐光启，太仆少卿李之藻等人，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徐光启和李之藻甚至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

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 年）初奉诏入北京，万历皇帝在偏殿召见了。他。万历三十八年（公元 1610 年），利玛窦卒于北京寓所，享年 59 岁。

②西学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明末修订历法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万历三十八年（公元 1610 年），崇祯皇帝下令开设历局，由徐光启主持，聘用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公元 1591 ~ 1666 年，日耳曼人）等人，正式修订历法。经过七年的努力，至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新历《崇祯历书》编成。新历的准确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崇祯十四年（公元 1641 年），崇祯皇帝决定采用新历法。《崇祯历书》中的《星录》部分，把整个天体的恒星图都画了出来，这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首创。《崇祯历书》对宇宙结构的论述，虽然仍采用天主教会所坚持的地球中心说，但同时也介绍了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对他的一些天文计算方法也多有采用。汤若望等人还专门培养了一批天文历算方面的人才，并为钦天监制造了一批天文观测仪器。

耶稣会士还通过写作来促进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如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了《乾坤体义》。后来，在传教士的帮助下，李之藻又自己编写了《浑盖通宪图说》，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著作。在传教的过程中，利玛窦还制作浑天仪、地球仪展示给人们，亲自向人们介绍天体知识，解释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产生的原理。这些天文知识的介绍，有利于破除迷信，开启民智。

西方的数学理论也随之传入我国。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

的《几何原本》，是第一本介绍欧几里德平面几何学的数学著作。

161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制造出了改良过的望远镜。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汤若望把新型望远镜带到了中国。四年后，他撰写出《远镜说》，介绍了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和制造方法，《远镜说》也成为中国介绍光学原理的第一部著作。1629年，徐光启建议制造三架望远镜。1634年，中国制造出了第一架自己的望远镜。同年，汤若望和罗雅谷还向崇祯帝进献了一架望远镜，它是由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

传教士邓玉函和中国学者王征（公元1572～1643年）合著《远西奇器图说录最》3卷，内容涉及力学中重心、比重、杠杆、斜面、滑轮等知识，并介绍了一些简单的机械构造和钟表结构的原理。

1618年，后金兵占领了抚顺。第二年十月，徐光启开始训练兵士，有意购买西洋炮并招募炮手。1620年，李之藻派门人张焘赴澳门购炮与招募炮手。次年，购炮4门至江西广信。1626年，明军利用从澳门购买的4门大炮在宁远城击伤努尔哈赤。1629年，明廷再次从澳门购买10门大炮并雇募葡萄牙炮匠。1630年，明廷将其中4门留镇涿州，另6门运抵北京守城。

耶稣会士东来后，还制定了第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这在

中国文字史上是一件大事。自此，中国人民开始掌握一种比反切更加简便的拼音方法。

此外，耶稣会士还带来了西方的绘画、音乐和艺术，并在清初对我国的传统绘画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 艺术的发展

① 音乐与舞蹈

宫廷乐舞被称之为雅乐，是官方歌舞的一种，为明代乐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的宫廷乐舞主要用来主办各种礼仪事项，其器乐、歌舞都有一定的要求。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歌舞、器乐。

这种单调的歌舞，除了用于礼仪外，没有其它的用处。所以后来宫中教坊司等机构便试图改变旧的歌舞形式，于是，一些民间的歌舞被引入了宫廷。

明代的民间音乐、歌舞包括娱乐型和表演型两个类型。民间娱乐型的歌舞内容广泛，人们非常熟悉的凤阳花鼓，是这类民间歌舞的代表。一种被称作时调的民间歌曲，时代特色很强，是明代非表演型民间音乐的代表。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民歌的形式也有所改变，这表现在带有流行歌曲性质的民歌时调的兴起上。有些时调小令，被传奇、戏曲采纳，也就演变成表演音乐。

除了这些流行歌曲之外，明代的民间音乐还包括民间的

器乐表演，这种器乐表演不同于官方教坊中乐师的表演。如嘉靖、隆庆年间的李近楼琵琶，是京师的一大景观。

明代表演型的音乐主要体现在戏曲表演中。兴起于明中叶的传奇戏所采用的南曲，无论是余姚腔、弋阳腔还是昆山腔，都是地方民间流行的曲调，其中的器乐伴奏也带有明显的地方音乐特色，被后人称为剧乐。许多明代戏曲中的舞蹈可以单独表演，而且有相应的固定曲调。

朱载堉精通音乐理论中的乐律学，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数学方法完全解决了音乐的旋宫转调问题的人，对全世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乐律全书》收集了朱载堉所著 14 部著作，这些著作对声律、音乐、舞蹈、历算等多种学科都有论述。《乐律全书》最大的贡献是用科学方法解决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计算问题。

朱载堉的《乐律全书》还保存了许多乐谱和舞谱。他第一次提出了“舞学”的概念，从而使舞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② 绘画及其代表人物

明中叶以来，江南的画坛十分发达，当时的苏州地区形成了以沈周为首的“吴门派”。

沈周（公元 1427 ~ 1509 年），长洲（江苏吴县）人，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一生没有做官，自称是“市隐”一类的人

物。他工于山水，注重文学意趣的表达，画中带有士气，这是吴门派绘画的典型特征。

文征明（公元 1470 ~ 1559 年），长洲人，别号衡山。他出身仕宦家庭，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他的绘画风格，早年细致清丽，中年用笔粗放，晚年则融合了细致与豪放的特点。

唐寅（1470 ~ 1523 年），字伯虎，吴县人。他生性聪明，举止大度，不拘小节。唐寅终身不得志。面对人生厄运，唐寅终日诗酒，或漫游名山大川，或沉浸于作画。做一个职业的文人雅士，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不易和悲哀，在他的诗画中多有表现。唐寅与沈周、文征明、仇英一起，被誉为“明四家”。

吴门派追求文学与绘画的统一，注重对意境的追求，即要求神似。这对于其后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吴门画派以后，晚明的绘画分为两派，一派是创新派，以徐渭、陈洪绶为代表；另一派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书斋文人画派。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相映成趣。

徐渭（公元 1521 ~ 1599 年），号天池山人、青藤山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擅长诗文、戏曲，工书画。他才华横溢却与科举无缘。他的绘画区别于吴派文人画那种恬雅闲适，着意于情感的发泄与个性的追求。这与当时社会上泰州学派传人那种反传统的思想特征十分相似，都反

映了当时明朝知识界强烈的思想变革要求。他在吸收宋、元诸家和当时一些画家技法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开创了中国画大写意的手法。这深刻影响了中国写意画的发展。因此，徐渭又被归类于“青藤画派”。

晚明绘画史上另一位大师是陈洪绶。陈洪绶（公元1598～1652年），幼名莲子，号老莲，浙江诸暨人。陈洪绶善于画人物，对人物画法有独特的见解，他还致力于木刻人物画，对以后版画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晚明时代，求变与保守两种思想交织而行，虽然强烈的社会变革要求赋予一批画家以改革的精神，但是当时主流依然是保守的士大夫绘画，其代表人物是“松江画派”的董其昌。

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号思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中进士。他在文人画方面是当时的典范。但是，由于他过于追求笔墨功夫，片面强调形式，将其后的文人画引入了误区。董其昌在当时画坛上影响极大，他与李流芳、杨文骢、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王时敏、王鉴被后人称作“画中九友”。

在中国传统美术中，书法和绘画是统一的，然而在明代却并非如此。直到明中叶以后，文人绘画兴起，二者才逐渐统一起来。在明代，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同步，更为接近。吴门派的画家大部分也是吴门派的书法家，只是有的书

法更好，有的绘画更棒。吴门派书法的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征明与王宠。万历以后，董其昌和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称四家，代表晚明书法的最高成就。

③民间美术

明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向大众化方向发展，民间美术相应变得丰富起来。明代的民间美术主要包括民间风俗画、版画、寺庙壁画、雕塑和工艺美术等。

流传至今的明代风俗画代表作品有《皇都积胜图》、《南都繁会图》等。它们主要表现的是民间生活，内容真实生动、场面巨大、刻画细腻。同类作品还有浙江太平（今温岭）周世隆所画的《太平抗倭图》。这些民间风俗画的价值还在于它们保留下来了关于当时民间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有助于对明代文化的研究。

除风俗画之外，版画也是民间绘画的一种。版画分三类，一类是年画、孝行图之类的风俗版画，另一类是小说插图，第三类是木刻的画谱。

自明代中叶以后，得益于小说、戏曲的流行，小说、戏曲所作的插图版画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忠义水浒传》、《三言》、《二拍》、《金瓶梅词话》等书的插图及明代杂剧传奇《琵琶记》、《望江亭》的插图，都是佳作。

明代版画吸引了一批画家加入其创作行列，如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绶、萧云从等人的加入，促进了版画的发展。今天

我们还可以看到陈洪绶的木刻《水浒传》和《西厢记》插图，确实是版画中的精品。

明代的壁画受到建筑风格的限制，发展缓慢，但是，从北京法海寺壁画及山西稷益庙壁画中，也能看出明代壁画的高超技艺。

明代的一些宫廷建筑雕塑也都是出自民间工匠之手。从现存的大同上华严寺内大雄宝殿中宣德年间的佛像雕塑来看，明代的佛像雕塑有一个突出特点，即程式化。

与雕塑相比，明代的工艺美术则经历了一个辉煌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代的官营与民营工艺也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以至于明代出现了重今不重古的现象。明代的绘画与造型美术被很好地应用到手工业工艺上，如古朴的宣德炉、精美绚丽的景泰蓝以及典雅的青花瓷，再加上高超的工艺技术，明代的工艺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十四章 16 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新航路的开辟

一、16 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在 14~15 世纪，即使是在当时最先进的国家里，封建关系依然占统治地位。

当时，受封建剥削网束缚的小生产体系的一部分生产环节在最先进的国家已开始解体。在意大利和法兰德斯，已经偶尔可以见到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开始萌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产生，但旧的封建主阶级还占据统治地位。这使得社会上的阶级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与此同时，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更加激烈了，既有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又有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还有早期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中世纪西欧各国经济发展较快。到 16 世纪初，这种发展引起了物质生产方面的深刻变化。生产技术的复杂化，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从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在技术进步的同时，社会分工也进一步发展。这些变化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共同构成了 16 世纪西欧经济变革的主要原因。

1.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

到 16 世纪初，所有主要的工业生产部门都彻底改进了手工操作方式和劳动工具。与此同时，生产技术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中以西欧各国采矿业和制造业方面的进步最为显著。

在某些部门，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些已经超出了改进手工业技术的范围。手工业劳动工具的改进，是与各种机械装置在手工业中的应用，以及以人力、畜力、风力或水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同时进行的。

大约从 14 世纪起，冶铁业中就有了 2~3 米高的较大的炼铁炉，取代了以前的小炼铁炉。大炼铁炉装有用水轮带动的风箱。高炉和炼钢法的改进与采矿业中的变革相比，意义更大。

从 13 世纪起，在金属加工业中，德国、捷克和英国开始使用靠水力驱动的锤来加工熟铁。14~15 世纪，这些装置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用水力驱动的用于制造铁板和铁丝的机床。水轮的广泛使用对当时的技术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随后，在造纸业、火药和锯木等部门中也开始采用水轮。

技术的发展不限于工业生产领域。航海术、农业生产技术等都有了较大发展。

15 世纪中叶，人们又发明了一种能拆卸使用的金属活字的印刷术。因此，从 15 世纪下半叶起，用纸印刷的书籍迅速地代替了羊皮纸的手写稿。13 世纪，开始制造玻璃透镜，1300 年左右出现了眼镜。大约在同时期，西欧开始制造依靠重锤的重力开动的大塔钟。1500 年左右，西欧又发明了以发条推动的比较精致的小钟。

这些发明虽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但它们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间接影响。发明造成了新的需求，新的生产部门也相应产生。火器的广泛流行，增加了对生铁、铜和钢的需求量，同时也推动了冶金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金属加工的新部门。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出现。钟，特别是用发条的钟发明后，很多新的生产部门涌现出来，这些新的生产部门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它们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生产技术的进步。

这一切各种各样的改进和发明从根上改变了生产技术。15 世纪至 16 世纪初，西欧各封建国家的生产力有了更新、更快的发展。

生产力方面的这些重要进展，深刻影响了西欧各封建国家的社会生产。使用各种机械设备和原始发动机的部门的劳动工具日益趋于精密复杂。

生产技术的显著进步，使社会分工日益细致，生产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越来越活跃了。15

世纪时，西欧诸国的手工业产生了许多专业部门，行业的种类增加了。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带来了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劳动工具的革新，随之而来的就是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生产分工的扩大，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与农业发生了分离，像纺织、酿酒、烤面包、农具制造等以前依附于农业的手工业，最后都转变成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形式也趋于复杂化。

小城市中专供当地狭小的市场的工业生产继续存在。但是，以更广泛、更发达的分工为基础的工业品生产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生活中占很大的比重，不但某些旧工业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新的工业城市。工业产品开始向远离城郊的地区外运。

于是，一批工业中心在西欧相继出现。佛兰德尔主要生产呢绒，米兰以制造甲冑闻名，托勒多则以造刀剑而著称。尼德兰北部的造船工业也很发达。英国的羊毛纺织品出口到了海外。在工业中心形成的同时，粮食、农畜产品和工业原料也进一步商品化。一些以各自特产而闻名的农业区相继形成。

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促进了欧洲货币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也波及到了农村的自然经济。16世纪时，西欧各地货币流通繁荣起来，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以及信贷和银行业相继发展起来。

15 ~ 16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也从侧面推动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它不仅大大扩展了欧洲商人活动的领域，而且对于被进行地理探险的国家奴役并受到武力恐吓的居民来说，这无疑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进行诈骗性贸易的机会。

2. 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欧各封建国家在生产力状况方面的上述变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6 世纪的这些新变化，使当时封建社会的小经济破产了，而且在一定的经济活动部门，这种经济已经开始解体，逐渐被一种生产能力较高的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这种经济曾一度占据着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它的解体应归因于生产技术的发展。

16 世纪，由社会分工发展引起的生产变化决定着西欧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入，生产过程在实质上已经具有社会性，而参加生产的个别生产者已经进入了社会生产之中，变成了复杂的、拥有分支机构的经济组织的各个环节。他们彼此间已发生的关系远远超出个别经济地区之间的联系。这种经济关系牢固而复杂，它能把各种不同专业的大批生产者联系起来。但是，在个别的生产者之间，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都不可能在市场上建立那种商品生产与地方有限市场间所存在的联系。生产组织形式的

复杂化，要求工农业产品作远距离的运输，而在当时具体条件下，这只有靠商人才能实现。于是，商人担当起了这个重要的中介角色，他们通过市场把由社会广泛分工引出的各个经济组织紧紧联系起来。因此，商人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很多小生产者逐渐丧失独立的经济地位，同包买商之间形成依赖关系。与此同时，为数不多的手工业者富裕起来，摇身一变、成为小业主，逐渐成了手工工场主。

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大企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生产集中在一定的中心，使企业组织具备了生产大量商品的潜力。同时，供应市场的扩大和手工业技术的统治地位，也使较大的企业比手工工场式的小企业有了更大的优势。比如说，大企业的主人获得货币资金的贷款也更为容易，所以一般能够更多、更快地利用改进过的技术，拓展更广泛的事务联系，也更易于把握市场需要。大企业还能充分发挥协作和分工的作用。当各生产中心之间广泛的社会分工配合各工业产品生产部门内部的细密分工而发展时，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形成了。

结果，一方面，大部分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去了自己的财产并变成被剥夺了生活资料的颠沛流离的人；另一方面，大量的货币资金被掌握在居民的上层代表人物手中。于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大大加速了。大批没有生活资料的人民为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充足的

劳动力，而大量的货币资金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也解决了发展资本主义类型的企业所必需的资金积累的问题。这样，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原始积累的各种具体形式大不相同，但不管方式如何改变，原始积累的实质都在于以暴力来剥夺劳动群众，逼迫无产者走向市场。资本家侵吞大量的生产资料，用暴力迫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因此，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野蛮的暴力剥夺的结果，是一部充满血腥的历史。

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又一个基础。因为，雇佣工人的出现，为这种新生产方式所必需。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时期诞生的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生产力。最初的雇佣劳动者的主要来源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小手工业者和与家庭手工业有联系的农民，也有手工业帮工。这些有生产经验和技术的雇佣工人组成了最初的手工工场。

雇佣工人阶级的产生，就是对封建主义制度下存在的两种所有制的破坏。农民阶级为摆脱封建义务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又对取消封建社会对生产者人身的部分所有制起了重要作用。

无产阶级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同资产阶级进行着斗争。1539～1542年，法国里昂印刷工人就举行了罢工，表明了两

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时期工人斗争的规模不大，大多因经济原因促发。

3. 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工业是通过小企业对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依附，或通过把小生产者变为资本家而发展起来的。

商人向小手工业者提供贷款使得小生产者在经济上依附于商人。这种依附的程度和具体形式一直在发生变化。

在家工作的分散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带有小生产的性质。16 世纪，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迅速流行，尤其是在没有行会限制的农村。这是因为从农村居民中分化出来的手工业者，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已没有条件成为独立生产者，他们逐渐变成为包工商工作，实际上他们变成了雇佣工人。这样，在农村就产生了一些小规模的企业，生产毛织品、麻织品和多种金属制品，它们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手工业者中也能产生资本家，这个过程造成的后果更为彻底，它能把旧经济破坏得更为彻底。发了财的手工业者成为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组织者后，会先扩大自己的作坊，然后再吞并其他小生产者。

手工业工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从 15 世纪起直到 18 世纪下半期，在英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

生产中的主导形式。

在那些生产资料繁多、价格猛涨的工业部门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最快，如采矿业、冶金业、某些金属加工业和造船业。除此之外，如缫丝业、造纸业、印刷业和火药制造业等一些采用机械发动机或复杂设备的小的生产部门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在这些部门中，商品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破坏了手工业主的小经济。新技术一旦不能在个体手工业者的小经济范围内使用，就必然要求出现拥有一定数量工人和适应新技术设备的资本主义大企业。

这种资本主义企业一般规模都很小，但在这些企业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个别技术和组织因素已经出现。

还有另一类工业部门，它们虽然参加供应广大市场的生产，但还完全保持手工业技术。这类部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慢。在这些部门里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是以手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因而也就不具备像采矿业或冶金业等资本主义大企业在技术上对手工小生产的优势。手工业者的小经济在这里越稳固，它让位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时间也就越慢。

手工业者的小生产经济的稳定性集中体现在有发达行会统治的各个旧城市之中。行会的统治地位及其平均主义的规章制度妨碍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至少是以极狭小的圈子限制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生产主要是在

乡村和行会生产传统不那么牢固的新兴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虽然都是以手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工业部门，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速度和具体形式还存在着差别。

但是，16 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毕竟也影响到农业生产领域。农民的分化首先为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农民局部地参加商品生产，引起了他们的分化。最能适应供应市场生产条件的少数农民发了财，他们用各种方法扩大自己的农场，并开始雇佣那些地少或完全破产的农民为他们劳动。这样，就产生了小规模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于英国和尼德兰等地区。

资本主义生产在农业中采取的另一种形式，是某些封建土地占有者和因发财而拥有了土地的市民所拥有的农场在新的条件下发生了转变。封建主为了扩大农产品的生产，以雇佣工人的劳动代替了生产率很低的依附农民的劳动，这使他们的封建经济具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于是，在封建主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新贵族，他们的利益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致的。英国最具有这种特点。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资本主义农场，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规模。但这种资本主义农场在 16 世纪的西欧各国没有普遍流行，只是在西欧一个国家即英国有所反映。

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这两条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表现

形式，但在很多方面相互交织，不分你我。

16 世纪，尽管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迅速，可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经济方式仍然存在着。因为它在很长时间内是在封建社会的范围内发展的，只能局部地排挤一些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经济形式，而社会产品的主要部分仍然依赖于那些形式。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封建制度内部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只有建立在大工业技术和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经济形式。这种情况直到产业革命时才出现。

尽管这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还是给 16 世纪的西欧各国的经济生活以很大的影响。同时，它所提供的那一部分商品在为供应广大市场而生产的那些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且这些产品是与当时的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如采矿业产品、许多金属制品、船舶、各种军事装备、优质毛织物和麻织物等。

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内部发生的各种变化，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也引发了 16 世纪西欧各封建国家社会生活的变动。

二、17 世纪上半叶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的进程并不同步。16 世纪，几乎

西欧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以某种形式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但是在 16 世纪中叶，德国和西班牙明显地落后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上，英国、尼德兰和法国三国跃居世界前列。

自从 15 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英国的工业发展很快，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呢绒业作为英国“民族工业”，发展最快。

早在 16 世纪，在呢绒业中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有的行业已经采取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形式，集中的手工工场也出现了。

另外，海外掠夺和殖民侵略也是促进英国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海外贸易、海盗掠夺以及殖民侵略，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的三种主要来源，对它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6 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已经由羊毛出产国变成了呢绒成品输出国，其它如采煤、冶金、造船、造纸等行业也相继发展。17 世纪初，英国已经出现了 50 多个集中的手工工场，分散的手工工场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总之，资本主义的逐渐深入，严重破坏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使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封建农业国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这又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准备了必要条件。

17 世纪前期，荷兰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呢绒

业、麻织业、丝织业及陶瓷业等都很发达。直到 17 世纪初，英国的呢绒还要靠荷兰最后加工和染色。荷兰的造船业尤为发达，居当时世界的首位。

当时，荷兰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商业比工业发达，产品对外输出比在国内消费的要多。17 世纪初，重要商埠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荷兰的经济中心，也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荷兰商船多达一万艘，航遍世界各地，替许多国家转运商品。1609 年，荷兰创办了欧洲第一个资本主义类型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经营大规模的存款和信贷业务，是一个国际性的银行。

17 世纪前期，荷兰已开拓了很多殖民地。早在 16 世纪末，荷兰就已开始了海外殖民活动。它逐渐排挤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在东方的势力，把贸易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17 世纪中叶，荷兰几乎控制了德国的对外贸易。在对俄国的进出口贸易中，荷兰把英国排挤出了首位，成为波罗的海贸易的主人。

17 世纪的荷兰共和国是一个联邦国家，它在荷兰省设置了两个首都。在三级会议中，资产阶级起着主导作用，它既具有共和性质，又有贵族专制的性质。

与英、荷两国相比，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更加艰难，它必须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层层阻碍。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一直遥遥领先。在工业部门中，封

建行会制度阻碍了手工业作坊向手工工场的转变。这一切，使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三、新航路的开辟与海外扩张

1. 开辟新航路的原因

“地理大发现”是15~16世纪欧洲现实和此前历史相互作用的结果。

欧洲人最初远航是为了寻找香料。还有许多别的商品，如宝石制品、化妆品和丝绸等，也是吸引欧洲人的东方商品。这一切使经营东方商品的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西方各国越来越觉得要为西方世界找到一条通向印度的自由的、不用纳税的、畅通无阻的道路，从而打破阿拉伯人的控制。

14世纪和15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历史发展对欧洲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新的刺激。首先，由于西欧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增长，西欧各国商品流通量的扩大，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货币的需求量剧增。15世纪后，黄金不但要供贵族们享用，还成了国际贸易中的主要流通手段，而当时西欧的贵金属开采量却非常有限，加上在东西方贸易中西欧入超，金银大量东流，所有这些，大大刺激了西欧寻找黄金的欲望。西欧的教俗封建主、骑士、教士和航海

家们，无一例外地做着黄金梦。可以说，“黄金”一词是驱徙欧洲人到亚洲（也是美洲）探险的咒语。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第一个目标就是黄金。其次，15世纪中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占领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克里米亚等地，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传统商路。他们在商路上进行海盗式的抢劫，而且对过往商品征收重税。因而，从这时起，运抵欧洲的商品数量大减，且价格昂贵，一般商品的价格也提高了8到10倍。连意大利人也对此感到不满。因此，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大西洋沿岸诸国，都迫切希望找到一条摆脱阿拉伯人，绕过地中海东部，直达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的商人认为，这条不经过地中海的新航路的开辟，将使东方货物所缴纳的通行税降为原有的 $1/80$ 。

另外，新航路的开辟也包含着宗教扩张的动机。

地理发现是一个既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它的成功需要欧洲各国人民的努力和多种文化技术。东方人的航海仪器、西班牙和北非犹太人绘的天文图表和航海图、西班牙人设计的装有横帆的船，以及大部分由意大利人充当的海员，这些都是促使航行成功的因素。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针，经阿拉伯人西传后，14世纪时已在欧洲普遍使用，这保证了船在远航过程中有正确的方向。欧洲的文艺复兴促使人们再次将目光集中到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学说上，其著作在15世纪初已译成拉丁文，地圆学说在欧洲日益流行，这意味着实验

精神的觉醒。

15 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沿海国家对新航路的开辟和探险家们的海上探险活动表现出最大的关注。15 世纪末，两国在收复失地运动后完成了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专制王朝为扩大收入来源，把开辟新的航路同开拓疆土以及扩张基督教结合起来。两国的城市如巴塞罗那、塞维尔、里斯本等，商业都很发达，也力图扩大同东方的直接贸易。收复失地运动中涌现的一批以战争为职业的军事贵族，战争结束后仍热衷于军事和殖民活动，再加上西、葡两国的造船和航海业又比较发达，一些港湾是意大利和尼德兰之间航路的中转站，热那亚许多水手迁居葡萄牙。所有这些，使得西、葡两国成为最早组织远航和殖民侵略的国家。

由于这些内外原因，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先开始寻觅通过大西洋的新航路。

2. 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

最先探寻由欧洲直通东方航路的是葡萄牙人。15 世纪初，出于对摩尔人作战和商业的需要，葡萄牙人侵入非洲西北海岸的休达地区（公元 1415 年），这块地区成了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北海岸最早的殖民地。

葡萄牙人竭力想从休达继续往南前进，深入到“昏暗的海”中去，但地中海的西部掌握在阿拉伯海盗的手中。所

以，阿拉伯国家不允许葡萄牙人实现沿非洲地中海岸往东的扩张政策。

15 世纪上半叶，葡萄牙在非洲西岸进行考察工作，亨利亲王也参加了。在位于葡萄牙西南岸上萨格里什远伸入海洋的石角上建立了天文观测台、造船的船坞，还开办了航海学校。亨利与希望由海外贸易扩大自己收入的富有贵族和商人合股开办了许多贸易公司，来筹措准备航行的资金。

企图掠夺整个非洲沿岸的强烈欲望，加速了他们的南进。60 ~ 70 年代，葡萄牙海员到达几内亚湾并通过赤道，一些新的地方进入葡萄牙人的视野：“胡椒海岸”、“象牙海岸”、“奴隶海岸”、“黄金海岸”。80 年代初期，海员迪亚哥·加奥完成了三次从黄金海岸往南的航行。他经过刚果河口时，在南回归线旁树立了石柱，作为发现这块土地的“界碑”，标志这块土地并入葡萄牙国王的领地。最后，巴左罗缪·迪亚士在 1487 年到达好望角，绕过该角来到了印度洋。彼得罗·科维良诺于 1487 年奉葡萄牙国王之命去寻找通过北非地区 and 红海到印度最近的道路，他到过印度的马拉巴尔沿岸、东非的一些城市和马达加斯加岛。

为了寻找通往印度的海路，葡萄牙国王马努艾尔派出了一支以出身贵族的宫廷亲信瓦斯科·达·伽马为首的考察队。达·伽马的航行也是葡萄牙人的一次扩张活动。从葡萄牙征服摩洛哥境内的休达要塞开始，这个扩张就开始了。由于葡

葡萄牙人在航海学、造船以及探险、殖民等方面的领先地位，葡萄牙人开始把寻找通往东方的海路作为一项国策加以执行。

从 1517 年起，葡萄牙人开始和中国发生商贸关系。1553 年，他们借口遭遇风暴，他们在我国澳门住了下来。1557 年，他们竟自设“官府”，建城垣，修炮台，将澳门窃为殖民据点。这样，他们就开辟了从西欧到印度和东亚的海路。

沟通欧亚海路的开辟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意义，同时，它也成为封建的葡萄牙发财致富、掠夺和压迫非洲和亚洲的各族人民的工具。

3.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环球航行

1492 年，西班牙国王授哥伦布以“海军大将”军衔，预封他为“新发现土地”的世袭总督。8 月 3 日晨，哥伦布率水手 88 名，分乘三艘帆船，从巴罗斯港出发。经过 69 天的艰苦航行后，10 月 12 日黎明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海岛（萨马纳礁岛）。该岛位于北纬 $23^{\circ}05'$ ，西经 $73^{\circ}45'$ ，在华特林岛南边 110 公里处。因为这座岛是在哥伦布几乎绝望时发现的，所以他异常兴奋，将此小岛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其意为“救世主”）。哥伦布误以为他所到之处便是亚洲的一个海岛，这个海岛所在地便是印度。哥伦布此行的目

的是寻找黄金，因此，他又继续从萨马纳岛向南航行，先后到达古巴和海地，还在海地北部建立了西班牙第一个殖民地。第二年3月15日，哥伦布返抵西班牙的巴罗斯港。这是他的第一次远航。

其实，哥伦布航行的初衷是要来中国，然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他发现了新大陆。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他的日记里，这也是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个特征。每见一地，他总以心中既定的想法推测它们是中国或日本的某个部分。尽管遇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仍是坚持他的看法，总以为自己到了亚洲。可以说，如果当时没有日益强烈的“东方热”的兴起，如果东方没有这样一个富饶而文明的传奇式大国，如果没有中国这样一个明确的航行目标的存在，哥伦布恐怕不会有勇气和决心去冒如此大的风险。因此，美洲的“发现”是欧洲人在实现自己东方美梦过程中的一件副产品，一个伴生物。

发现“新大陆”运动的第二个特征是，它是在错误的至少是不够精确的知识指导下进行的。

第三个特征是，这次活动带有较强的宗教热情。这种热情对哥伦布的西航事业产生过很大影响。他在西航过程中，不断用基督教精神激励自己和船员，鼓励他们要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哥伦布的发现并没有带给西班牙大量的黄金收入。在他

胜利返回之后，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失望。一下子，他失去了所有的收入，而他的财产全部用于还债。1506年，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在穷困潦倒中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人们也立刻把他忘却了，甚至他所发现的大陆也被用意大利学者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名字来命名。

哥伦布之后，西班牙的另外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人，继续扩大在美洲的领地。

葡萄牙海员斐南多·麦哲伦出身破落的贵族家庭，从小生长在西班牙。他向西班牙国王提出了一个新的大规模考察计划，目的是寻求从西南方进入太平洋，并经西路到达亚洲的通道。在葡萄牙时，他就对考察做了详尽的计划，想要开辟一条从大西洋到巴尔普亚所发现的“南海”的西南海峡的航路。这个草案引起了设在马德里负责有关西班牙殖民事务的“印度事务委员会”的兴趣。

1519年9月20日，奉西班牙政府之命，麦哲伦和265名船员乘着5艘船，从塞维利亚的圣卢卡尔港启航。他们穿过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于1520年10月21日到达美洲南端海峡，（后人命名为“麦哲伦海峡”），又继续西航进入“南海”。航行中，海面风平浪静，因此，“南海”被称为“太平洋”。1521年3月6日，麦哲伦舰队到达菲律宾群岛。4月初，麦哲伦出面干预诸岛内讧，在攻打马克坦岛（在宿务以东）的战斗中，于4月27日夜被杀死。事后，他的同

伴继续航行，到达摩鹿加群岛。他们获得了大量的香料，并推选第·卡诺为船长，沿着原葡萄牙通往印度的航路，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 1522 年 9 月 6 日返抵西班牙圣卢卡尔港。船到达目的地时，生还的仅 18 人，“维多利亚”号船是仅存的一条船只。麦哲伦等人的环球航行，充分证实了地圆说，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念的转变均有重要意义。

4. 欧洲其他国家的海外扩张与探险

欧洲其他国家的海员和商人为了追逐暴利和财富，也开始了探险。英国和法国的航海家相继考察了北美的东部，17 世纪多次航行的经验，为荷兰发现澳大利亚奠定了基础。1606 年，荷兰人首先到达澳大利亚的北岸，1642 ~ 1644 年，航海家塔斯曼又进行了两次澳大利亚沿岸的航行，证明了澳大利亚是一块独立的新大陆。

伦敦的商人在 1552 年组织了以威罗比为首的三只船的考察队，试图找到一条绕过西伯利亚沿岸通往中国东北的通路。

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加向往美洲大陆的北部地区。1524 年，受雇于法国的佛罗伦萨人维雷扎诺从北卡罗来纳出发，沿北美洲海岸航行，到达纽芬兰。这次航海活动在雅克·卡蒂埃和弗朗西斯一世指挥下，为法国的扩张活动铺平了道

路。1534年，卡蒂埃奉国王之命前往纽芬兰探险，接着又来到了拉布拉多，后来又占领了加斯佩盆地。

在卡蒂埃的航行以后，法国人派出一支探险队，任命罗贝伐尔担任总督和军事长官，前往北美，其使命是强迫印第安人信奉基督教并探寻通往西印度群岛的航线。1541～1542年，卡蒂埃又接受命令第三次远航，远航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航行纪略》的书，使法国人对加拿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世纪初期，法国向加拿大殖民，成立诺曼底商人公司，开展殖民贸易。1608年，法国在北美圣劳伦斯河下游建立了魁北克城。1644年又开始向南美的圭亚那移民。17世纪，法国还侵占了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和塞内加尔等地。在兼营纽芬兰、加拿大和南美贸易的同时，法国仍将重点放在东印度方面。1602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它对东南亚的侵略变本加厉了。

英国人在英吉利海峡内大肆从事海盗活动，拦截西班牙等国载运金银的船只，扰乱西班牙等国的航线，打击它们的海上霸权。英国从中获得的各种财富是它与低地国家金融贸易中无法相比的。

1584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弗吉尼亚殖民地。1588年7月，英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树立海上霸权。同年，英国成立几内亚公司，专门从事殖民活动，并把大量掠夺来的黑奴从非洲贩运到美洲去。1600

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从英国女王处得到“特许状”，“有权”独占一切从好望角到东方国家的贸易，并在它所侵占的殖民地中拥有军政全权。印度是英国在东方的主要侵略目标，开始时，英国采用“经济渗入”等段，不断派使团去印度向莫卧儿王朝骗取各种贸易特权。1609年在印度的苏拉特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商站，1613年即占领该城，并逐步深入印度腹地。

荷兰人凭借自己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在经商方面的聪明才智，很早就从海外商业经营中获得了很多好处。

1595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财团资助下，科内利斯·德·胡特曼率领船队经好望角远航印度。在其后的五年内，有14个荷兰船队在这条航线上往返航行，由荷兰的新贵族和殖民者不同程度对这些航行进行资助。为了扩大殖民侵略，荷兰的许多小公司又合股成立大公司，以实现垄断。其中最著名的是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它独立经营荷兰的香料贸易，其联合资金共6424588弗罗林，联省议会又增拨25000弗罗林。

荷兰的早期殖民侵略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东印度公司就专门管理殖民和侵略事务。荷兰力图排挤葡萄牙的势力，在东南亚与葡萄牙展开了殖民争夺。17世纪初，荷兰两度侵占中国的澎湖列岛，1624年侵占中国台湾。经过一系列的殖民角逐和战争后，葡萄牙在亚洲的霸权逐渐落入荷兰手

中。1517 年筹建的西印度公司，垄断了美洲和西非的殖民和贸易特权。荷兰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岛屿，在美洲东岸占领哈德逊河口一带，把它称作“新尼德兰”（今纽约）。1623 年，荷兰一度从葡萄牙夺得巴西（1661 年又被葡萄牙逐出）。1648 年，荷兰的殖民活动大获丰收，这一年，它把葡萄牙人从非洲南端的开普敦排挤出去。自 1652 年起，好望角长期成为荷兰的殖民地，也成为荷兰前往印尼的中转站。

从 1643 年开始，B·帕雅尔拉夫和叶·哈巴罗夫率领部队长途行军，远道出征欧洲人从未实地调查研究过的黑龙江，获得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

这样，在从 16 世纪 80 年代到 17 世纪 40 年代较短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俄罗斯人途经草原、森林、苔原，横穿整个西伯利亚，在北极洲各海域航行，完成了一系列地理发现。

5. 地理大发现对西欧和美洲的影响

在 15 至 17 世纪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的航海家和旅行家完成了一系列的探险活动，发现了大部分陆地和濒临的海洋，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开辟了一些海路，使各大陆间取得了联系，但地理大发现也带来耸人听闻的掠夺和对新大陆人民的奴役，开始了欧洲殖民者对新大陆的抢劫和剥削。在此基础上，西欧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条件加速形成。

地理大发现带来了殖民体系的产生，它的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积累了资金，也开辟了海外市场。因此，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殖民体系成为一个重要杠杆，殖民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由于伟大的地理发现，东西半球日益汇合，世界各大洲之间经济和文化交往逐渐扩大，开始形成世界性的贸易，流通商品的数量与品种也不断增多。

从此，亚、非、欧之间的贸易扩大，并且同美洲开始建立联系。在欧洲市场上不断出现其它地区的新商品，16世纪中叶以后，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烟草、可可、向日葵、西红柿、辣椒、南瓜、菜豆、菠萝等在当时鲜为人知的蔬菜瓜果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到亚洲和欧洲等地区。中国盛产的茶叶、丝绸、瓷器、药材和手工艺品等对欧洲的输出量剧增，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喝茶、喝非洲产的咖啡在欧洲开始流行。以前，每天只有2100吨胡椒通过意大利商人运往欧洲，开辟新航路后，每年就有7000吨香料从东方运往里斯本。

地理大发现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而也导致了美洲、大洋洲人口中原有种族和民族的构成发生变化。同时，不同肤色和民族人口的大量涌入，为当地文化带去了新的因素，形成了五彩纷呈的多元文化格局。

从人种和民族构成上看，北美殖民地的居民，除印第安人和非洲的黑人外，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民族成分复杂。因此，在美洲出现了大批混血人种，如印欧混血人种“梅斯蒂索”、黑白混血种人“穆拉托”和带有混血成分的所谓土生白人“克里奥尔”等。在当今美洲人口种族构成中，混血人种仍占显要地位。

在语言方面，如今的美洲人口中足有 6.1% 的居民仍然在坚持使用本土印第安语系各方言，而绝大多数的人口是使用印欧语系的各种方言，这其中又以拉丁语和日耳曼语最多。

在宗教方面，在少数幸存的印第安人和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的影响下，美洲的印第安人信奉不同类型的原始宗教，但来自欧洲移民的基督教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基督教就来到美洲，再加上传教士多年来不断向印第安人和黑人传教，基督教已在精神领域中确定了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

在文化和风谷方面，来自欧洲和非洲的移民，同样将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艺术带到了美洲。在血腥压迫的伴随下，这种文化完成了再造。“地理大发现”虽然是人类能力巨大突破的反映，但却制造了对人类自身任意摆布的戏剧性后果。欧洲运用其优势手段夺取了美洲及大洋洲原有居民的大部分生存空间。在欧洲移民进入美洲的同时，大批土著印第安人

被驱逐、奴役，遭到种族灭绝式的屠杀。由此展示了一幅历史悲剧式的“人口置换”图景：一方面是本地人口的被驱赶和消灭，另一方面是外来人口的进占和移入。美洲的这场灾难开始于“地理大发现”的15~16世纪，大约在19世纪下半叶结束。

对印第安人进行的两次大范围的杀戮，使其蒙受了巨大损失。一是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西印度及中、南美大陆时期，一是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时期。

1542年、1543年和1548年，葡萄牙国王下令，禁止把印第安人变为奴隶。为了弥补日益短缺的劳动力市场，在美洲勃然兴起了黑奴制，从15世纪中叶葡萄牙一国的垄断事业，很快发展为一项多国自由竞争的国际贸易活动，延续长达四个世纪之久。根据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估计，16世纪有90万黑奴运入美洲，17世纪为275万，18世纪为700万，19世纪为400万，共计约有1500万人。加上在掳掠和海上运输过程中大批黑奴死亡，在这场空前悲惨壮烈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大约有5000万~6000万的非洲人口丧生。

四、新航路开辟的意义

欧洲新航路的开辟，使封闭的地中海被大西洋和印度洋所取代，人类文明的交往通道从大陆与近海转向大洋，从而使东、西两半球相对隔绝发展的格局得到根本改变，“新旧

两个世界”，亚、非、欧、美几大文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汇合，世界不再破碎分散而是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首先，通过“地理大发现”，欧洲从美洲、非洲乃至亚洲吸取了很大一部分养料和力量，为实力不足的欧洲实行对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条件。非洲、亚洲尤其是美洲一旦和欧洲发生联系，欧洲的全部基本条件得到逐渐改变，甚至连欧洲的发展方向也得到调整。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它刺激了所谓“商业革命”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流通商品种类与数量的增加，商路及商业中心的转移和商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是“商业革命”的直接表现。

伟大的“地理大发现”引发了商业领域内大规模的革命，原先半封闭的地区性经济通过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贸易联系起来，变成了世界性贸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东西半球的汇合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从而使世界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第二，新航路的开辟引起贵金属供给量的增加，导致所谓“价格革命”。在欧洲经济史上，“价格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它带动了资本迅猛而有推动力的增长，却大大损害了土地所有者、按传统方式征收地租的封建主和靠工资为生的贫苦劳动者的利益。这就使欧洲的封建制日趋衰落，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和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第三，新航路的开辟所带来的国际间贸易的扩大为欧洲

外交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它从一种单纯的政治行为过渡到渗透着政治成分的经济行为。加之当时欧洲正在抬头的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地理大发现”加剧了欧洲列强的国际竞争。于是，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竞争开始向白热化方向发展。

第十五章 16 世纪至 17 世纪 上半叶的尼德兰与西班牙

一、尼德兰革命

“尼德兰”一词是通过荷兰文中“低地”一词音译过来的，包括莱茵河、马斯河、些耳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的低洼地区，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地区。中世纪初期，尼德兰从属于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分裂后，它分属德国和法国。15 世纪，它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勃艮第公国的领地。从 1516 年开始，由于婚姻和血统关系，尼德兰成为西班牙的领地，由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进行统治。

尼德兰的国家机构极其特别，这是由历史发展的特点造成的。在 14~15 世纪，尼德兰的商品货币关系和手工业生产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因此，查理五世把尼德兰称为他“王冠上的一颗珍珠”。他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压制一切自由思想，把天主教会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对新教徒进行残暴的迫害。尼德兰也由于从属于查理五世的帝国而获得了一些好处。在欧洲，

尼德兰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凭着这一优势，尼德兰差不多控制了和西班牙殖民地的全部贸易，以及西班牙的大部分金融业务和对外贸易，这就促进了尼德兰经济的快速发展。尼德兰在查理五世的帝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获得了许多经济利益。

1.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到 16 世纪中叶，尼德兰进入繁荣时期，人口大幅度增长，在一块不大的土地上拥有 300 多座城市和 6500 多个乡村，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

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封建关系的解体和资产阶级关系的形成是尼德兰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从 13 世纪起，法兰德斯和不拉奔的古老城市——根特、易普斯、布鲁塞尔、卢汶等，已经是手工业的中心，行会发达，进行着规模很大的贸易。

到了 16 世纪中叶，行会制度衰落了，工场手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在纺织、冶金、制糖、制皂、印刷业中，手工工场普遍存在于南方各省。南方的中心城市安特卫普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和信贷中心之一。在南部农村，大部分地区还是封建地主所有制，甚至在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农奴制，但在经济发达的法兰德斯和不拉奔地区，资本主义的租佃关系已经取代封建关系，还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农场。

不拉奔最大的港口城市安特卫普，变成了贸易和财政活动的重要中心。在安特卫普城，集中了欧洲各大金融家的事务所，每天有 5000 多名各族商人出入城内的交易所。

在荷兰、西兰和乌得勒支，大量生产呢绒和亚麻布、船舶装备和帆布的资本主义手工业生产也同样取代了行会生产。航海业和造船业迅速发展起来了。这样，行会中有技能的工人不断破产，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也日趋贫困化，最后分化出一小部分大资本家——金钱财源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在中世纪，一部分市民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的一般商人、手工工场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要求推翻西班牙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在后来反对西班牙殖民者残暴统治的斗争中，这些人和人民群众形成了暂时的联盟，并起了领导作用。

上述事实证明，在尼德兰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形成过程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集中了大量资本，并对城乡劳动阶层，即手工业者、帮工和农民进行剥削。广大农民受到封建贵族、天主教会、农场主、包买商以及高利贷者的重重剥削与压榨，处境日益恶化。

在尼德兰，南方的经济中心安特卫普和北方的经济中心阿姆斯特丹之间发生了竞争，随着竞争日益加剧，安特卫普逐渐衰弱，而阿姆斯特丹的势力则不断强大。

尼德兰各省的经济发展呈不平衡态势，有些省份，特别是边缘省区如阿多瓦、那慕尔、卢森堡等，经济发展比较迟缓，封建势力还很强大，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对封建主不仅有土地依附关系，甚至还有人身依附关系。农奴制在边远地区还相当牢固。

2.16 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在西班牙争夺欧洲霸权的过程中，经济发达的尼德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西班牙国库收入的一半来自尼德兰。因此，他们加紧对尼德兰的控制，实行专制统治。天主教会是西班牙进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1522年，西班牙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对新教徒进行残酷迫害。

腓力二世企图使整个欧洲都置于封建天主教势力的管辖之下，这一想法暴露了西班牙封建主的最终意图。

从一开始，腓力二世就决定在尼德兰建立西班牙专制的官僚体系，以便完全统辖其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果导致尼德兰的银行破产，商业低迷，手工工场关门，尼德兰经济濒临崩溃。腓力二世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既得利益，工人、农民也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尼德兰国内的形势非常紧张，革命一触即发。

为了保护西班牙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腓力二世限制尼

德兰商人进入西班牙港口，禁止他们同西属美洲殖民地直接进行商业贸易，提高从西班牙出口羊毛的税额，从而使尼德兰从西班牙进口的羊毛锐减 40%。许多手工工场破产，成千上万工人失业。他还宣布国家破产，公开拒付国债，给许多尼德兰银行造成巨大损失，被迫倒闭。外来统治者强加给尼德兰的这些灾难，都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的性质。尼德兰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与西班牙专制政府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在佛兰德尔、不拉奔、荷兰、弗里斯兰和安特卫普等省市，先后多次发生新教徒暴动，反抗西班牙的反动统治。

1566 年 4 月 5 日，贵族同盟中三百多人联合向玛格丽特总督呈递请愿书，提出废除“血腥敕令”、召开三级会议、撤退西班牙驻军、免除总顾问格兰维尔的职务等项要求。他们的要求遭到了西班牙政府的拒绝。

这样，形成于封建社会内部的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阶级，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无时无刻不受到顽固的封建势力的迫害与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独立战争才能推翻封建制度和外来的西班牙统治。支持加尔文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领导了这次斗争，受封建和资本主义双重剥削最深的农民和城市平民是主要的动力。

3. 革命条件的成熟和破坏圣像运动

受上述事件的影响，国内的城市平民和农民掀起了激烈

的暴乱，在法兰德斯、不拉奔、荷兰、弗里斯兰等工业城市和村镇取得了很大成就。

尼德兰北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1567 ~ 1568 年，荷兰北部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但因缺乏领导而被击溃。

1561 年，发隆西纳的人民赶走了宪兵队和市政局的成员，把两个异教徒从死刑中解救出来。1564 年，在异教中心的安特卫普城，当革职修道士克里斯托夫·法布里齐乌斯被处死刑时，人民和警卫队发生了冲突。资产阶级的加尔文教公会领导了传教，有时还领导群众运动。尼德兰贵族也开始参加斗争，反对西班牙专制制度。最初，贵族反对派的核心由国务会议的成员埃格蒙特伯爵、奥伦治亲王和霍恩提督组成。

外来的统治压制了尼德兰的经济发展，人们把西班牙的专制统治看成是民族迫害，这也是反西班牙情绪日益高涨的另一原因。

1565 ~ 1566 年的十年间，尼德兰的形势变得非常紧张。

1565 年 11 月，贵族反对派组成“和解会”，又称为“妥协协会”。贵族凭借自己中世纪特权来与专制制度进行抗衡。新教公会由资产阶级分子领导。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以及和保持人民较紧密的联系，他们不得不把革命付诸于行动。他们宣称，如果政府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不予以满足，那就要“杀光神甫，捣毁教堂，破坏圣像”。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把

西班牙当局推向了孤立的境地。国内革命时机成熟了。

1566年8月11日，首先在佛兰德斯的一些工业城市爆发大规模的起义，斗争的目标指向了天主教会。群众冲进教堂和修道院，破坏圣像，捣毁圣徒遗骨，把教会财产没收，焚烧教会的田契。起义迅速席卷了17个省中的12个省，数万人参加了起义，五千五百余所教堂和修道院被捣毁，史称“破坏圣像运动”。由此揭开了尼德兰革命的序幕。

在乌得勒支，破坏圣像起义者的行动不再是单纯的反对宗教的活动，而是带有明显的社会和政治性质，所以帕尔马的马加丽特认为这些行动“不仅是推翻宗教，而且是破坏司法程序和整个政治秩序”。在安特卫普，首先倡导破坏圣像的是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在图尔恩的城效乡村，800个农民参加捣毁教堂的活动，许多富有的商人也参加了起义，他们还建立了专门的军队维持城市秩序。在发隆西纳，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破坏圣像起义的规模逐渐扩大，短短几天，就有12个省相继爆发了起义。起义者在破坏圣像的同时，还烧毁债券和地契，到处强迫市政当局停止迫害新教徒，承认新教徒信仰自由，对天主教僧侣的活动加以限制，起义者甚至准备夺取城市领导权。

在这次汹涌澎湃的群众性革命运动面前，当局显得软弱无能。强大的革命压力使帕尔马的马加丽特被迫作了某些让

步。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大富商、资产阶级和贵族感到害怕，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而开始动摇。以奥兰治亲王威廉为首的一批贵族反对派同政府谈判，订立协议，无条件地接受政府提出的条件，解散同盟，企图平息这场风暴。8月23日，西班牙总督宣布，对贵族参加革命运动的反叛行为不予追究，废除宗教裁判所，允许加尔文教徒在指定地点传道和祈祷。接着，贵族和资产阶级退出运动，放弃了领导起义的责任。

4. 阿尔巴公爵的残暴统治和奥伦治亲王

阿尔巴公爵，是西班牙的高级贵族和天主教的狂热信徒。1567年8月，西班牙国王派阿尔巴公爵为尼德兰总督。在阿尔巴的恐怖政策下，尼德兰到处是绞架和断头台，宗教裁判所里哀鸿遍地，火刑柱的浓烟弥漫于大地的上空，8000多人被杀害。

9月，译号“血腥委员会”的“骚动调查委员会”成立并开始活动。贵族反对派的首领埃格蒙特伯爵、霍恩提督以及资产阶级领袖安特卫普市市长凡·斯特拉连等人，都被处死。阿尔巴不仅企图消灭所有反动分子，还想把法庭没收的财产输入西班牙的国库。1571年，他颁布新税则，苛刻的税收及盘剥使尼德兰经济濒临崩溃。在阿尔巴的恐怖统治与

掠夺政策的高压下，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相继逃亡国外。

奥伦治·威廉亲王生在德国的拿骚一个邦君家中。他逃到他的德国领地拿骚，在那里联系德国新教徒诸侯和法国胡格诺贵族，向他们寻求援助。1568年，威廉率领23000名雇佣军进攻弗里斯兰，但败给了阿尔巴。后来，他几次带兵回尼德兰进攻西班牙反动军队，都因没有发动群众而失败。

1568~1569年，奥伦治亲王远征失败。1571年，他开始和法国及英国秘密举行外交谈判，企图取得这些国家的军事援助。作为回报，威廉答应割让汉瑙、阿多瓦和法兰德斯给法国，把荷兰和西兰让给英国，而亲王自己才是最大的赢家，得到不拉奔和其它一些省份，并成为帝国的不拉奔选侯。

但是，在奥伦治亲王流亡海外、四处求援时，社会的政治局势已经相当紧张，在革命和解放战争中形成的阶级力量的变化，都使他不得不修改计划。最后，他实际上成了尼德兰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人，奥伦治亲王被资产阶级看作是它所需要的“强者”。同时，奥伦治·威廉也使得社会各阶层包括贵族、富裕市民，甚至一部分人民群众支持自己。

5. 北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产生和《根特协定》

1571年，阿尔巴推行销售税，整个国内经济陷入停滞

状态。契约被废除，大量店铺和手工业工场倒闭，许多商号和银行破产。

1572 年 4 月 1 日，西兰省的战略要地布里尔城被一支海上游击队攻占。这一胜利不仅为海上游击队赢得了根据地，而且为北方各省的起义点燃了信号。人民起义迅速在北方各省铺天盖地般席卷开来。

同年夏季，荷兰和西兰两省最先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奥兰治·威廉派贵族组织自卫队，建立城市政权。1572 年 7 月 19 日，北方各省召开代表大会，推选奥兰治·威廉为荷兰省和西兰省的总督。到 1573 年底，北方各省相继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奥兰治·威廉亲王成为北方各省公认的总督。

在北方，革命的加尔文派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起义，为未来的资产阶级联合省共和国打下了基础。

1573 ~ 1575 年是起义的艰难时期。拉开森斯对尼德兰起义进行疯狂镇压。1574 年 5 月，被包围达半年之久的荷兰的海滨城市莱登城遭到围攻。守城居民英勇抵抗，双方相持达数月之久。在城郊农民的协助下，守城居民英勇抗击西班牙军队，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消灭了小股敌军，最终以胜利而结束。

阿尔巴公爵的后任拉开森斯停止征收销售税，并宣布了一次范围很小的赦令，但国内形势并未好转。北方起义各省

承受着艰苦的考验。

1576年，西班牙兵士发生暴动。他们罢免了自己的军官，离开北方，大批自行转移到南方，经过之处都变成了废墟和荒野。

1576年9月4日，在奥兰治党人的领导下，布鲁塞尔市民发动起义。起义者迅速占领了总督的统治机构国务委员会大厦，这标志着西班牙在南方的长达多年的统治政权终于被推翻了。三级会议掌握了政权，其中，大商业资产阶级和有反西班牙情绪的贵族占主导地位。

9月4日以后，全国各地相继爆起义。人民群众用自己手中的武器推翻了反动的市政局。广大的城市平民和农民参加了这次起义。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反动贵族、富裕的市民阶级、商人以及新贵族都力图掌握领导大权。因此，尼德兰的政治陷入极度混乱的局面。

而且，发生暴动的西班牙军队控制了安特卫普、根特、亚罗斯特等许多大城市的要塞，使政治局势雪上加霜，愈加复杂。这些城市的居民时刻生活在暴动的西班牙雇佣军的暴力和抢劫的威胁之下。

1576年10月，南北双方代表在根特城召开三级会议。会上，北方代表希望南方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脱离西班牙，但被南方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拒绝。会议还没有结束，安特卫普城的西班牙士兵就发动叛乱，他们四处横行，掳掠财物，

导致八千多名城市居民丧生。西班牙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迫使南北双方达成协议。

1576年11月8日，三级会议完全通过了《根特协定》，宣布废除阿尔巴公爵的血腥法律，当国家还没有摆脱西班牙人统治之前，必须和暴乱的西班牙军队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保持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但在这个协定中，对尼德兰独立、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没有涉及，因而这个协定具有保守性。

6. 国内阶级关系及其矛盾的加剧

1577年2月12日，南方三级会议和西班牙签订了《永久敕令》，对西班牙新派来的总督予以承认。激进的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强烈反对这一举措，许多城市又爆发了新的武装起义，人民起义的新浪潮席卷全国。

“十八人委员会”在根特实行了信教自由的宗教政策，建立了以平民和手工业者等民主分子组成的军队来代替原来的政府军。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掌握了这支军队的领导权。他们没收教会财产，并予以廉价出卖，所得的款项用来发军饷和救济贫民。

三级会议的政策没有得到根特人支持，他们为了联合革命解放运动的力量，与布鲁塞尔和法兰德斯等城市缔结了同盟。

阿拉斯和发隆西纳的城市民主制被倾向西班牙的汉瑙和阿多瓦贵族粉碎。1578 年秋，他们发动叛乱后，遭到根特人和法兰德斯农民联合力量的军事镇压。真正的农民战争在法兰德斯点燃。法兰德斯的农民没有取得土地，封建义务仍然保留着。同时，贵族以及三级会议和奥伦治亲王召入尼德兰的雇佣军的对他们进行抢劫并施以暴行。农民组织自卫军反对雇佣军和贵族，他们夺取贵族土地，拆毁城堡和修道院，贵族和天主教僧侣都担心自己遭到彻底毁灭。

奥维依谢尔、弗里斯兰、德伦得、格利德恩、哥罗宁根等许多北方省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7. 革命的进程及荷兰共和国的独立

到了 1567 年，盛极一时的“破坏圣像运动”遭到了镇压。8 月，腓力二世派遣有“凶暴公爵”之称的阿尔巴率领 1 万大军进驻布鲁塞尔，对尼德兰革命进行镇压。阿尔巴设立“除暴委员会”，对参加过起义运动的人进行审判，有 1.2 万与起义有关的人被传讯，其中 9000 多人的财产被全部或部分没收，1000 多人被判处死刑。在血腥镇压的同时，阿尔巴还开征新税。阿尔巴实行的军事镇压和经济压迫，遭到了尼德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

在尼德兰革命中，宗教问题尤为突出。奥兰治亲王威廉在复杂的现实斗争中逐渐形成其宗教观。他认为新旧教各派

应该平等相处，政府应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对每个人的宗教信仰予以保护。到 1578 年，尼德兰国的天主教徒占多数，即使在加尔文教势力相对集中的荷兰、西兰，也是绝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据统计，只有接近 10% 的荷兰人是加尔文教徒。1578 年 7 月，尼德兰三级会议通过了《百户宗教和平法》。1579 年后，《百户宗教和平法》得到了后来在联合省政治生活中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乌特勒支同盟盟约的肯定，由威廉等资产阶级政治家所倡导的宗教宽容政策基本上被确定下来。

1581 年 7 月，乌特勒支等同盟议会通过《誓绝法案》，废黜腓力二世，彻底断绝与西班牙的联系，在尼德兰北部成立联省共和国（又称荷兰共和国）。1609 年 4 月，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签订停战协定，并于 1648 年正式独立。

8.1609 年的停战协定与尼德兰革命的意义

在 1587 ~ 1609 年间，荷兰共和国和英国、法国结盟，继续对西班牙作战。西班牙失败了，但它并不死心，多次进攻联省共和国，却是屡战屡败。这时，欧洲的国际形势对联省共和国较为有利。1588 年，号称“无敌舰队”的西班牙海军被英国海军击败；1589 ~ 1598 年，法国爆发胡格诺战争，西班牙派兵干涉，又以失败告终。连连受挫以后，西班牙的国力大大被剥削了，而联省共和国在外交上得到了英、

法等国的支持。面对尼德兰的革命，西班牙再也无能为力了。1585年，奥兰治·威廉的儿子摩里斯成为北方诸省联军的总指挥。他具有优秀的战略指挥才能，不仅解放了原被西班牙人侵占的地区，而且还吞并了不拉奔和法兰德斯的许多地区。同时，共和国海军利用西班牙海上力量的削弱，在它的海运线上及殖民地内进行积极的军事行动，这就为此后荷兰建立殖民帝国奠定了基础。

西班牙遭受一系列沉重的军事打击后，不得不同意停战。1609年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尼德兰北部革命的胜利。

尼德兰革命是一次以民族独立运动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以推翻西班牙的专制统治为主要任务，积极争取民族独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它通过民族解放斗争，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北部的统治，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与1648年和1789年的革命相比较，在尼德兰革命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表现还相当不成熟，这个特点在南方各省显得极为突出。在当时，由于民族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阶级矛盾被忽略，资产阶级与贵族及专制制度的对立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所以，以经济力量最强大的大商业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尼德兰资产阶级，比英国资产阶级更加支持与贵族的联盟，而不支持与农民和城市平民的联盟。17世纪资产阶级化的英国“新贵族”不同，尼德兰贵族主要由封

建贵族组成，在缔结这样的联盟时，尼德兰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比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作了更多的让步。这次革命的主力是城市平民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联盟，并领导了这场革命。

虽然尼德兰革命有其地区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为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17 世纪前期的荷兰

由于同外国统治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成为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荷兰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对外贸易和航海业。17 世纪中叶，联合省的海军几乎超过英、法海军总和的一倍，总贸易额达到每年 7500 万到 1 亿佛罗伦。17 世纪，荷兰和俄罗斯商业往来频繁，贸易成交额在荷兰总贸易额中占有较大比重。

商业资产阶级在共和国经济生活中之所以占统治地位，是因为当“商业的至上权保证工业的优越”的时候，它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手工工场时期。

在 17 世纪，荷兰共和国实行联邦制，有两个首都：海牙为政治首都，阿姆斯特丹为经济首都。两者都在荷兰省。荷兰的政治制度具有半共和、半专制的特点。三级会议是国

家最高权力机构，国务会议是常设的行政机构。各省的资产阶级、教士和贵族代表组成三级会议，有立法、征收赋税、宣战、媾和、处理重要国务的权力。各省都只有一票表决权，与代表人数多少无关。对重要问题的决议，必须一致通过才有效。国务会议主要处理军事问题。在内务处理上，各省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

统治国家的大资产阶级的对内政策是公开反民主的。在政治上，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权利。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在本国被资本家转化为资本，使工人受到的剥削进一步加强。1609年停战协定签订后，奥兰治·摩里斯执掌政权，这种矛盾愈发尖锐。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尼德兰文化

尼德兰并入哈布斯堡帝国，标志着封闭的尼德兰文化时代宣告结束。尼德兰与德国和西班牙，尤其是与意大利建立了紧密的文化联系。西班牙的残暴统治和高压政策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民族反抗意识日益觉醒。这样的社会背景造就了16世纪的尼德兰文化。

从15世纪开始，尼德兰逐渐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中世纪宗教教条的破产和新的世俗世界观的产生，这一过程实际上和意大利发生的情况相类似，但是在尼德兰，这些过程进行的形式最初不太明

显。在富裕、经济发达的城市中产生的新的社会结构，暂时还只是在封建的勃艮第国家范围内形成，但这种现象也对尼德兰文化的一般性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 16 世纪开始，尼德兰为争取教会改革公开进行斗争。加尔文教得到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北方各省的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宗教改革促进了 16 世纪人文主义文化的高涨，同时，作为一种与宗教运动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文化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在人文主义的文学中，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代的世俗乐观的精神。16 世纪初，欧洲北部人文主义运动中名誉和声望最高的是伊拉斯姆斯，他出生在尼德兰的鹿特丹，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活动家。

大学和学术团体是传播人文主义文化的主要场所。创建于 1575 年的莱登大学成了人文主义的中心之一，并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研究院。文学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因此，革命年代的文学具有十分激进的性质。它的杰出代表是一位积极的革命活动家菲利浦·马尼克斯·宛·辛特·阿尔德洪德（公元 1539 ~ 1598 年），他在歌曲“维列尔摩斯”中歌颂了反对西班牙压迫的起义。另外，由中国传到欧洲的印刷术对人文主义文化的传播也起了推动作用。

在革命爆发前，雄辩协会中革命斗志很高的会员就积极参加了阶级斗争。在阿姆斯特丹、莱登等北方各省市的雄辩

协会中，许多会员加入了革命的再浸礼派，积极参加直接和孟斯德公社有关的 1534 ~ 1536 年农民和城市平民的起义。后来，他们中还有人成了孟斯德公社的领导者，莱登城的约翰·勃凯尔松就是其中一个。

在革命和独立战争年代里，雄辩协会不断涌现出反对西班牙压迫和束缚的英勇战士。只要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地方，雄辩协会就成为建立荷兰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的中心。

到 16 世纪上半叶，尼德兰的艺术完全摆脱了中世纪的艺术原则。在革命即将到来的年代里，尼德兰的版画又兴起了一个高潮。当时最有名的大师彼得·阿尔特生和他的学生阿希姆·贝克拉尔的艺术就主要面向人民的现实生活。

老彼得·布莱盖尔的创作代表了 16 世纪尼德兰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布莱盖尔后期的一些悲剧性作品中，反映了那时代的尖锐社会矛盾和西班牙恐怖统治下的黑暗岁月。布莱盖尔对风景画的发展所做出的成绩也是不可忽视的。他第一个在尼德兰从半童话的风景转向描写大自然的现实主题。布莱盖尔画风朴实，重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感染力强，有民族特色，代表了尼德兰的绘画成就和独特的绘画风格。布莱盖尔为后来的以鲁本斯和伦勃朗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画派奠定了基础。

15 ~ 16 世纪，尼德兰乐派也在欧洲其他国家占据统治地位。

四、17 世纪前期的法兰德斯文化

革命结束后，尼德兰分为南、北两部，因而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民族艺术派别——法兰德斯派和荷兰派。

在法兰德斯，17 世纪的国内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革命失败和西班牙压迫的不良影响。所以，进步的社会趋向在法兰德斯不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艺术的形式间接表现出来，最初是表现在 17 世纪上半叶盛极一时的绘画上。鲜明的有血有肉的生活体会、发自肺腑的自然感受、粗暴鲁莽而又不乏对周围世界的美感、普遍的愉快和乐观的情绪，是法兰德斯艺术最典型的特质。

对统治阶级思想体系的依附性也明显地体现在法兰德斯的建筑艺术中。

法兰德斯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在绘画中表现得极为鲜明。它的世界意义和彼得·保罗·鲁本斯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鲁本斯凭借杰出的艺术天才和广阔的创作范围，成了法兰德斯艺术繁荣时期最优秀的大师。

在鲁本斯的学生中，最优秀的是安东尼·宛·戴克，他以肖像画闻名于整个欧洲。

雅各布·约丹斯代表着法兰德斯艺术中另外一种更大众化的倾向。他曾经与鲁本斯合作完成一些订制作品，而且在艺术风格形成方面得到鲁本斯很多帮助。

以鲁本斯为中心，当时艺术界成为法兰德斯静物画的卓越代表。

在绘画中，除鲁本斯所代表的绘画风格外，还有一派以农民生活为主要题材。这种对比本身就反映出法兰德斯社会生活的各种现实矛盾。

法兰德斯风俗画另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大卫·特尼尔斯，他的创作充满了柔和的情调。

五、17 世纪的荷兰文化

1. 思想、文学和建筑艺术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为 17 世纪荷兰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尽管荷兰的总人口只有 200 万左右，但它的经济力量强大，文化发展也先于欧洲其他国家。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废除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这些都有利于荷兰社会进步思想的发展。

莱城的代表，前海尔邦大学校长约翰·阿尔图吉（公元 1557 ~ 1638 年）的人民主权思想最为鲜明而又自成体系。他的“论政治”就是七个联合省政治结构的写照。早在卢梭以前，阿尔图吉就认为最高权力（主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不能分离，不可转让。作为一个狂热的加尔文教徒，阿尔图吉要求维护统一的信仰，确定国教的合法地位。

摆脱西班牙的统治枷锁以后，尼德兰各省发生了宗教迫害。新教的神学家加紧煽动教徒的狂热信仰，为新教的教义而进行斗争，而拥护自由思想的人是最大的受害者。在政治统治相对宽松的荷兰避难的法国思想家笛卡尔也曾遭到迫害。

17 世纪上半叶，民主倾向占绝对优势的荷兰文化开始成熟起来，在这段时期，荷兰文化不断汲取力量，逐渐走向繁荣。在这种民主思潮的基础上，荷兰的社会思想和艺术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17 世纪，荷兰文学的思想方向与尼德兰革命和反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欧洲其他国家的那些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荷兰的剧作家也都具有积极进步的政治倾向。

荷兰的建筑艺术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历来注重简单、朴素。荷兰文学的另一路线是直接描写现实。

没有哪个国家的市民住房比荷兰布置得更合理、更经济、更舒适。荷兰珍视每一小块土地，生活在那里的市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这种习惯。只是从 17 世纪中叶起，荷兰的建筑艺术才开始转向古典主义。

2. 绘画艺术

荷兰艺术的最高成就几乎全都与绘画有关。在短短 50

年的时间里，荷兰涌现出大量画家，真正堪称一流的大师就有几十位。

17 世纪荷兰绘画艺术的全部历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640 年以前是形成时期，1640 ~ 1670 年为高峰期，1670 年以后为衰落期。

肖像画家法朗士·哈尔斯（约在公元 1580 ~ 1666 年）是荷兰艺术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哈尔斯的画面上出现了荷兰社会的所有阶层，从政治活动家到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他对这些人物给予了特有的兴趣和同情。无论是肖像画，还是在描写日常生活的风俗画，他都对同时代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乐观主义世界观为 17 世纪 40 ~ 60 年代的荷兰风俗画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荷兰的生活风俗画接近现实生活，成为最受人欢迎的绘画艺术。荷兰风俗画的最高成就与德弗特的扬·弗梅尔（公元 1632 ~ 1675 年）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风景画方面，荷兰画家也取得了出色成就。雅各布·宛·雷斯达尔（公元 1628 ~ 1682 年）是荷兰风景画最优秀的

大师。

伦勃朗的创作代表了荷兰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伦勃朗凭着卓越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跻身于世界艺术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列。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写生画家，又是一个伟大的版画、素描画能手。

1606 年，伦勃朗·哈尔曼斯·宛·列因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个磨坊主人。他自幼就显露出绘画的天赋。30 年代是伦勃朗的艺术鼎盛时期，除了用圣经和神话的题材作画以外，他还创作了很多订制的肖像画。

40 年代初，伦勃朗的创作发生转折，他摆脱了早期作品的某些局限性，现实主义手法进一步加深。

在 40 年代，伦勃朗开始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他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高尚的道德和诚挚的情感。

最后 20 年是伦勃朗一生中最痛苦的阶段。但正是在这些年月里，伦勃朗的艺术达到了巅峰。

伦勃朗的著名油画《浪子回头》是他的后期作品，其中流露出对人类的深刻感情，让人震撼。在 17 世纪的荷兰，要想树立人文主义的理想，就注定要与脱离革命传统的资产阶级分道扬砦。1669 年，伟大的艺术家伦勃朗逝世时却无人知晓，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 1675 年到 1700 年，荷兰艺术陷入全面衰落。

六、16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1. 社会概况

15 世纪末，西班牙完成国家统一后，其领土差不多囊括了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同时，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西

西里岛也在它的统治范围之内。

16 世纪前期，工商业发展迅速的西班牙出现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萌芽。

16 世纪初，西班牙开始发展对外贸易。西班牙拥有上千艘商船，把美洲产品运销欧洲各地，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从西班牙向外输出的产品有羊毛、金属、水果、葡萄酒、橄榄油和皮革等，其中羊毛的数量最大。西班牙同意大利、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北非的贸易也很活跃，但西班牙输出的多为农产品和半成品。西班牙的沿海城市塞维利亚、卡迪斯、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等，逐渐发展成大商埠。

在经济繁荣的同时，西班牙君主力图实行专制主义政策，但未能集中王权。

2. 封建土地制度和农民运动

在西班牙，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不但没有引起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反而使封建关系继续遗存下来，加速了农业的衰落。在西班牙很多地区，主要的农业类型是牧羊业。农民为了避免田地被畜群践踏，用篱笆把自己的土地圈起来，但是遭到大牧羊主联盟——麦斯塔的反对。

1489 年，由于国王授权，麦斯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村社牧场。

苛刻的税收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1510 年，原来间

歇征收的役税改为固定税，而到 16 世纪中叶，税额增加了两倍。

在艰难的生活状况下，大部分农民饱受连年歉收和饥饿的煎熬，陷入靠借贷生存的境地。很快，他们就彻底破产了。

土地转到新地主手中后，农业经营方式仍旧没有发生变化，农业技术极其落后。整个西班牙都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

因为西班牙统一国家的各省是以前的各个独立王国，各自保持着不同的历史发展特点，所以，国内各地区农民的状况各不相同。

在亚拉冈，农奴制仍然保存着。

在加泰隆，15 世纪末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运动废除了农民极其繁重的人身徭役，并且农民通过可以交纳赎金而获得人身自由，但是一些领主却抬高赎金数量，或者根本拒绝解放农民。

在卡斯提尔，大部分农民已经获得了解放，仅有少数农民还处在封建主的控制下。

在西班牙南部一些地区，被迫离开富饶土地的摩里斯克人，生活更为艰难。他们依附于定居这里的西班牙封建主，向领主交租，向国家和教会支付重税。

农民无法忍受沉重的生活负担，纷纷逃亡，有时整个村

庄的人都背井离乡，开始流亡。

在西班牙，一些小范围的起义不断爆发。其中，1585年比利中期山脉南坡的里瓦戈尔斯伯爵领地的起义规模最大。起义者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推选出领袖。起义军占领了伯爵的全部领地。

3. 工业、手工业及贸易的发展

15 世纪末，尤其是 16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工业发展的特点是：集中在西班牙各城市或城郊的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并在手工业工厂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

塞维尔成了最大的贸易、金融和工业中心，它的繁荣主要得力于塞维尔垄断了对美洲殖民地的贸易。塞维尔不但和西班牙本国各地区以及美洲的殖民地进行贸易，还和安特卫普、英国、法国南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及非洲的一些港口城市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西班牙的纺织工业闻名于世，特产美利奴优质羊毛，可以用来织造高级呢绒。塞维利亚是呢绒工业的中心，拥有将近 16000 家作坊和 13 万纺织工人。

在细呢绒产量，尤其在质量方面，塞哥维亚名列前茅。除了塞维尔以外，马拉加、牟尔西亚、塔拉维拉等城市的陶瓷工业也很发达。

此外，武器制造、皮革、船舶制造及陶瓷等行业也十分

繁荣。

农村中大量逃亡的农民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生产的增长。

但是，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西班牙工业生产的规模还非常小。尽管西班牙自然资源相当丰富，但采矿业还是很落后。

由于国家统一后各地区经济仍然处于分散状态，国内贸易发展缓慢。

甚至在 16 世纪初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西班牙的商业贸易仍然是入超，出口商品以原料和农产品为主，如橄榄油、酒类、水果、皮革，以及金属。西班牙的纺织工业不仅无法占领国外市场，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无法和尼德兰、英国和法国货竞争。这使得西班牙工业的发展进一步衰落。从 16 世纪中叶起，西班牙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这是和它的经济总衰退密切相关的。

4. 查理一世的统治和人民的反抗

①查理一世的统治

1516 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继承王位。查理的统治范围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西西里和撒丁、尼德兰、法兰西、孔德和帝国本部，和西班牙同时并入的还有刚建立的新大陆殖民地。西班牙在 16 世纪是一个大国，并在国际政治

体系中占有首要地位。但是这个领地遍布全世界，联合得很不巩固的大国，却面临着国内外危机的严重威胁。

查理依靠欧洲反动势力尤其是教皇的支持，推行大国政策，企图建立“全世界基督教帝国”。他不断和法国、德国等新教诸侯作战。查理在他统治下的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所有国家中执行的政策都以建立世界帝国为目的。

查理一世在位期间，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欧洲，这大大激怒了作为狂热的天主教徒的查理一世，他勾结西欧保守势力镇压了各国的新教运动。

②卡斯提尔公社城市起义

在卡斯提尔和亚拉冈统一后，查理依靠伊达戈和城市的力量，收服了旧贵族，使他们为王室服务。但是，真正的中央集权却没有完成。

在卡斯提尔，很多城市还保留着自由公社。因此，在16世纪上半叶，当国家中央集权化的最后阶段到来的时候，当王权开始要求过去的同盟者——城市对它服从的时候，卡斯提尔各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

1520年初，当查理一世准备去德国主持帝国议会时，卡斯提尔议会向国王提出：“第一，国王不要离开西班牙；第二，不要从国内运走黄金和马匹；第三，不得任命外国人担任高级官职。”查理一世信誓旦旦地向卡斯提尔承诺同意其要求，并在卡斯提尔各议会取得新的辅助金后，于1520

年5月前往德国。到德国后，查理马上背弃诺言，并任命外国人、枢机主教阿得连为摄政。这件事是卡斯提尔城市起义的直接原因。

1520年6月，卡斯提尔爆发了城市起义。7月，在卡斯提尔，以托勒多为首的11个城市，组成号称“神圣议会”的革命军事同盟，同盟中心设在阿维拉城。一部分贵族和僧侣也参加了起义。托勒多贵族胡安·德·巴狄利亚等人成为起义军的领袖。托尔德西里雅斯和瓦拉多利德城很快就被起义军占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推动了起义的迅速发展，很快，整个卡斯提尔都卷进这场运动。起义不仅反对专制王权，而且也反对贵族的某些特权，因而，贵族开始脱离起义倒向国王。奸诈老练的查理一世采取从内部瓦解的政策，他任命两个西班牙大贵族为副摄政，诱使大贵族彻底叛变，马上退出起义。1521年春，中等贵族也退出起义阵营。1521年4月，在维拉拉战役中，国王政府军击溃由市民和农民组成的起义队伍，起义军首领巴狄利亚被处死，革命城市相继失陷。1522年夏天，查理一世依靠4000名德国雇佣军镇压了起义，290名起义骨干被判处死刑。

城市起义被镇压后，城市的特权被取消，议会虽然存在，但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查理一世竭力扼杀城市力量，并大力扶植贵族势力，这就使西班牙的专制政体增添了反动色彩，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政权不集中、涣散的国家，“仍

旧是一堆共有一个挂名君主的治理不善的共和国”。

③瓦棱西亚和马罗卡岛起义

反对查理一世的起义不仅仅局限于卡斯提尔的城市，几乎在卡斯提尔公社城市起义的同时，在瓦棱西亚和马罗卡岛上也爆发了互有联系的起义。

在瓦棱西亚市，查理剥夺了手工业者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管理权被中上层贵族控制着。不久，又谣传阿尔及利亚海盗要来袭击，为抵抗可能受到的袭击，瓦棱西亚四五十个行会的会员武装起来组成军队。后来，海盗并没有袭击瓦棱西亚，但是，手工业者却拒绝了省当局解除武装的要求，反而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海尔马尼亚”，即兄弟会。“兄弟会”向查理呈递请愿书，控诉贵族把他们当奴隶看待，请求准许他们有携带武器，承认他们组织的合法地位，并给予他们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兄弟会推举出 13 人组成委员会作为自己的领导机构，大部分成员是手工业者，起义者已经掌握了城市的领导权。参加这次起义的还有瓦棱西亚省其它一些城市，以及该地区的部分农民。在瓦棱西亚城中，起义者愤怒地摧毁了贵族的房屋。1522 年，瓦棱西亚起义被镇压下去。

1521 年 2 月，手工业者和城市下层平民以及农民发动了起义。起义席卷了除阿尔库迪亚外的整个马罗卡岛。1521 至 1522 年间的冬季，起义者围攻阿尔库迪亚，但是没有攻

破。在这个冬季的几个月中，起义者与贵族以及富裕市民的斗争达到顶点，人民群众要求处死所有富人，平分他们的财产。他们冲进贵族的城堡，把贵族杀死。1522年10月，西班牙派遣四艘大船和800名王室士兵进驻马罗卡岛，到12月，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岛屿。1523年3月，起义者停止对抗，向西班牙政府屈服。

马罗卡岛起义带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参加起义的不只有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还有农民。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的西班牙历史表明，专制制度的胜利并不代表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团结。

七、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侵略

西班牙殖民者从西印度群岛入手，开始征服拉丁美洲。哥伦布第一次远征时，在西班牙尼奥拉岛上建立了第一个小殖民地，虽然很快就被消灭，但是，规模更大、更凶残的征服却接踵而至。继哥伦布以后，其他殖民者为了寻找“黄金之国”，不断涌到西印度群岛来。

1. 对西印度群岛的征服

为了能够长期统治西印度群岛，从1496年开始，巴托洛梅·哥伦布即在西班牙尼奥拉岛建立了西班牙对美洲实行殖民统治的第一个永久性根据地——圣多明各城。1502年2月，西班牙国王又命大贵族尼古拉斯·德·奥瓦多率领30艘

船、2500 个殖民者从加的斯出发前往西班牙奥拉。奥瓦多正式在圣多明各建立殖民统治机构。1509 年，迭戈·哥伦布接任奥瓦多职务。迭戈·哥伦布是哥伦布的大儿子。他们二人先后在西班牙奥拉大力推行殖民统治，到 1513 年为止，西班牙在西班牙奥拉岛上已经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城市。

1511 年，贝拉斯克受西班牙奥拉督军的派遣，以武力夺取了古巴。他除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外，还大量残杀那些不愿交出土地和拒绝成为奴隶的印第安人。随后，他们继续扩张，迅速占领了波多黎各、牙买加以及其它西印度的富饶岛屿。

为了征服更多的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不择手段，残酷镇压印第安人的抵抗。古巴的 30 万印第安人，到 1548 年就差不多全部被杀，海地岛约 25 万印第安人也只剩下 500 人。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真是有史以来所罕见的。

2. 对墨西哥和古巴的征服

1517 年，在古巴督军贝拉斯克斯的支持下，西班牙殖民军官科尔多瓦航行到尤卡坦半岛，从玛雅人手中掠夺了大量的金制器皿。

科尔特斯出生于西班牙的贵族家庭。1504 年到达拉丁美洲，后来做了贝拉斯克斯的秘书。1518 年，他正式受命继续格里哈尔瓦所未完成的任务，但他必须自己设法筹集和

支付这一行动所需的装备和费用。科尔特斯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但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其它一些因素，却引起了贝拉斯克斯的忌妒，撤消了对他的任命状。可是，科尔特斯拒绝接受撤消的命令，并于 1518 年 11 月 18 日把舰队撤出圣地亚哥，继续在古巴沿海一带纠集力量组织军队。1519 年 2 月，他终于离开古巴，以一个非法司令的身份向大陆进发。

科尔特斯率领的舰队，沿着科尔多瓦和格里哈尔瓦的原有航线，直接向尤卡坦海岸进发。不久，科尔特斯在塔巴斯科海岸登陆，在马丽娜和阿吉拉尔神父二人的大力帮助下，阿尔特斯基本上解决了在征服墨西哥过程中所遇到的语言困难。

1519 年 4 月，科尔特斯在今天的韦腊克鲁斯登陆，建立了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的第一个城市。他按照西班牙源于中世纪的传统习惯，先宣布“辞去”贝拉斯克斯授予的职务，然后由市参议会任命他为将军，从而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此后，他在韦腊克鲁斯一共逗留了四个月。在把掠夺来的财富运往西班牙交给国王以获取国王的认可的同时，他还积极为深入墨西哥做准备。1519 年 8 月中旬，他率领 400 名西班牙步兵，正式向墨西哥内地进军。

由于是首次与殖民侵略者打交道，阿兹台克人完全不知道如何应付侵略者。阿兹台克“国王”蒙特苏马二世一方面

给科尔特斯送去许多金制的艺术品、棉织品、皮披风和皮斗篷等宝贵礼物，一方面又派出少量军队，劝说科尔特斯的军队不要继续前进。

对这次军事进攻，科尔特斯不仅作了周密的战略布署，还运用了狡猾的外交手段。一路上，他采取“以夷制夷”和“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对阿兹台克不满的印第安部族拉到自己一边，组成一支 15 万人的军队。

1519 年 11 月 8 日，科尔特斯的部队来到了阿兹台克神话般的首都，蒙特苏马在城郊亲自迎接他。蒙特苏马的引狼入室让阿兹台克遭受了无数的灾难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科尔特斯进城一周后，他以一部分西班牙人在韦腊克鲁斯附近被阿兹台克的军队杀害为借口，趁机逮捕了蒙特苏马。科尔特斯强迫蒙特苏马向西班牙国王宣誓效忠，并由他控制操纵对阿兹台克进行统治。

然而，科尔特斯的政权仍然面临着威胁。1520 年 5 月，古巴督军拉斯克斯派纳瓦埃斯率领大约 1200 人的远征队，来到墨西哥海岸，试图将科尔特斯逮捕。得知这一消息后，科尔特斯率领小部分军队亲征纳瓦埃斯。他迅速击溃纳瓦埃斯的远征军，并收编了大部分军队到自己部队，然后迅速返回特诺奇蒂特兰。

科尔特斯回到特诺奇蒂特兰以后，局势发生变化，对他很不利。上万名全副武装的印第安人聚集到宫殿之前，向西

班牙人表示抗议。王宫之内的西班牙人被愤怒的印第安人围住，没有食品和饮水，科尔特斯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1520年6月27日，他逼迫蒙特苏马劝说人民停止战斗，但不起作用。

蒙特苏马死后，就爆发了一场血战，阿兹台克人的包围愈来愈严紧，攻击愈来愈激烈。1520年6月30日，科尔特斯的部队带走了蒙特苏马宫殿中所有能够带走的黄金宝石，开始突围。当西班牙人走出王宫，企图从秘道突出去时，忽然间，战鼓齐鸣，成批的利箭由四面八方射来。

次日清晨，侥幸逃得性命的科尔特斯，身边只剩下一些高级部属、两个翻译、一个船工、23名骑兵以及和他结成同盟的印第安人特拉斯卡兰部族的残余士兵。

连连受挫并没有让科尔特斯收敛他的野心。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他又在韦腊克鲁斯收拾残兵，准备东山再起。他从古巴和西班牙尼奥拉补充了不少武器和其它装备，在原来残余的船只基础上，建造了13条新船。他还和另一些印第安部族结成了联盟。在再次向特诺奇蒂特兰进军之前，他直接指挥的西班牙部队已达1000人，并拥有12门大炮和共86匹马的骑兵队。

1521年4月28日，科尔特斯开始围攻特诺奇蒂特兰。新“国王”夸乌特莫克率领域内的阿兹台克人顽强抵抗，围城战一共继续了三个月。城门被打开后，他们仍旧严密防

守，在各个街口和角落进行殊死的巷战。到 1521 年 8 月，绝大部分阿兹台克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攻城战役到此结束。特诺奇蒂特兰城遭到毁灭性破坏，这座凝聚着世代印第安人聪明才智和劳动的新大陆最繁盛的城市几乎成为虚墟。而这次自卫战的领导者阿兹台克“国王”夸乌特莫克，则受到严刑拷问，最后，以“叛国”的罪名，被殖民主义者送上了断头台。墨西哥人民在墨西哥城起义者大街上树立了一座铜像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印第安人。从此，这个面积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生活富裕的印第安“王国”，便一步步变成西班牙王室的私产，变成一伙凶暴、疯狂的冒险家的领邑了。

除西班牙人以外，葡萄牙人也积极参与了对美洲的殖民统治。

到 16 世纪 30 年代，传统中的印加“帝国”的富裕吸引了葡萄牙，另外，法国人在巴西海岸获得了巨大利益，也使葡萄牙人正式决定大力开拓巴西。葡萄牙人采用了西班牙同样的殖民方式，完全吞并了巴西。

在征服拉丁美洲过程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掳杀当地人民，破坏他们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仅仅到 1541 年为止，就有上百万无辜的印第安人死于葡西殖民者的摧残蹂躏下，少数苟活的印第安人也都变成了奴隶。从此，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就在印第安人的鲜血

和枯骨上，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对拉丁美洲开始了长达300年的残酷统治。

八、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文化

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是伟大的，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扼杀它。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文化与人民密切相关。尽管西班牙的城市和部分农业发展持续时间较短，但西班牙有着优秀的文化遗产。西班牙古典文化的辉煌成就就是根植于这片土壤中的。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西班牙文艺复兴的矛盾性很大，它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没有完全和封建天主教思想断绝关系，甚至连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和洛普·德·维加也没有能彻底和天主教的传统决裂。

1. 人文主义者及其诗歌

16世纪上半叶，在西班牙活动的一批拥有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伊拉斯姆斯派”。阿尔方索·德·瓦尔德斯承袭古希腊讽刺家路奇亚努斯，运用犀利刻薄的语言以对话体形式的创作抨击教皇和天主教会，指责他们贪得无厌和糜烂腐化。同伊拉斯姆斯有关的，还有西班牙哲学家胡安·路易斯·斐弗斯。他在瓦棱西亚出生，后赴巴黎求学，住在英

国和法兰德斯。他参加过全欧的人文主义运动。斐弗斯在他早期的一本著作《基督的胜利》中，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对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进行了猛烈抨击。

他的哲学理论以经验为前提，认为观察和试验是宝贵的手段，可以引导人们认识世界。斐弗斯是弗兰西斯·培根的引导者之一。斐弗斯的理论始终以人为本，为使心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做了许多努力。

除斐弗斯外，西班牙的思想家弗兰西斯哥·桑契斯也反对经院哲学和被经院哲学家所歪曲的亚里士多德。

在西班牙民间创作繁荣的 15 世纪，出现了许多浪漫诗歌。西班牙浪漫诗歌是一种民族形式的诗，主要是简短的抒情诗或者抒情叙事诗。浪漫诗歌里闪动着伟大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渗透着卡斯提尔农民诗意的世界观。

凝聚着人民群众智慧的浪漫诗歌促进了西班牙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成为 16 至 17 世纪伟大的西班牙诗歌成长的起点。

还在十五世纪的时候，西班牙诗歌中的贵族派就欲根据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学形式创立“学术抒情诗”。

同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也是以人民创作为基础，融入人文主义思想的先进形式。

宗教抒情诗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诗歌中也得到了普遍发展。当时，诗坛出现了一批号称神秘主义的诗人，路易

士·德·列昂是其领袖。

16 世纪下半叶，西班牙文学进行了一次创造长篇英雄史诗的尝试。

2. 小说

16 世纪，骑士小说在西班牙风行一时。这些封建主义文学的后期创作，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冒险远航、周游远方的人们某些方面的心理。

16 世纪下半叶，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把田园诗主题引入西班牙文学，以小说的形式获得了成功。何赫·德·蒙特马约尔的《狄安娜》和塞万提斯的《加勒提亚》，这些小说反映了货币关系已经渗入西班牙人民的生活，宗法关系解体，人民群众破产，生活日益贫困。

《卡利斯托和美利佩的悲喜剧》奠定了西班牙文学这一派别的基础，这部短篇小说又名《塞列斯蒂纳》，由斐南多·德·罗哈斯写成。

《塞列斯蒂纳》问世 60 年后，1554 年，同时在三个城市以小书的形式出现了骗子小说的完美典型——著名的《托尔密塞城的拉萨罗》，这部小说对欧洲文学的发展有过深远的影响。

另一作家马提奥·阿列曼继承了《托尔密塞城的拉萨罗》的创作手法，他的代表作是《狡猾汉古斯曼·德·阿里法拉赤

的冒险和生活，人生的监视塔》，被誉为最受欢迎的骗子小说。马提奥·阿列曼笔下的社会背景更广阔，对社会的批判更尖锐。

西班牙作家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欧洲近代小说，真正着力刻画塑造典型人物的，就是从塞万提斯的小说开始的。他的创作是在综合过去文学发展全部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对欧洲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塞万提斯（公元 1547 ~ 1616 年），是一个穷医生的儿子，生于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加拉·台·艾那瑞斯城。塞万提斯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写过不少诗歌、剧本。当时，荒诞的骑士传奇在西欧各国已销声匿迹，但在西班牙却风行一时，塞万提斯对此深恶痛绝。另外，他对人民生活有极透彻的了解，再加上敏锐的观察力和写作的天才，因而能创作出一部意义大得多的作品——《拉曼契的狡猾骑士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形象的二重性在于，他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却由荒诞离奇的游侠行为表现出来。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的具有人民性的书籍，是西班牙文学语言的纪念物。塞万提斯把封建西班牙方言之一的卡斯提尔方言转变为西班牙的民族文学语言。《堂·吉诃德》标志

着西班牙古典艺术创作的高峰。塞万提斯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

凯维多早年创作的《放浪者的范例、骗子之镜、奸徒堂·帕布洛斯的生平》是骗子小说中最深刻的一部。

3. 戏剧

和英法一样，16 至 17 世纪是西班牙戏剧的繁荣时期。从洛普·德·维加到卡尔德朗的西班牙戏剧，主要描写了在收复失地过程中，西班牙贵族和卡斯提尔农民剥夺了旧日西班牙的特权后与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紧张尖锐的斗争。

西班牙的民族戏剧具有独特性和人民性，这一点与遵循古希腊罗马范式的法国悲剧有所不同。反对专制制度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观众，希望舞台上的表演能够表现先辈的丰功伟绩和当时震惊于世的事件，戏剧作品正好迎合了这一要求。

①洛普·德·维加

西班牙民族戏剧中成就最大的是洛普·德·维加，他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在洛普·德·维加的二重性中，反映了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特征。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了这一卓越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同时，洛普·德·维加虽然在当时有较先进的思想，但他仍然没有能和封建天主教西班牙的传统彻底断绝关系。

洛普·德·维加是一位罕有的多产艺术家，据说他写过 1800 多部剧本，现在留下来的有 400 多部。他同时还写了各种形式的诗歌和小说。洛普·德·维加的剧本大部分是历史剧，主要描写各国人民的生活，《莫斯科大公》就是根据俄国 17 世纪初的历史事件创作的。

他的代表作《羊泉》是西班牙戏剧乃至世界戏剧中最优秀的剧本之一。洛普·德·维加的这个剧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对君主制的幻觉。

继塞万提斯创作了《努曼西亚》之后，洛普·德·维加创作出刻画人民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剧本。

维加的剧作反映了西班牙的社会现实，揭示了西班牙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歌颂了西班牙人民的善良、勇敢以及不屈不挠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他的戏剧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为西班牙戏剧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②彼得罗·卡尔德朗

洛普·德·维加逝世以后，卡尔德朗成为西班牙文坛的主将。卡尔德朗全名彼得罗·卡尔德朗·德·拉·巴尔卡，出生于马德里的一个贵族家庭。

卡尔德朗还写过许多“斗篷和宝剑喜剧”，有的可与维加相媲美，他的“荣誉戏剧”中具有特有的现实主义力量。

卡尔德朗有很多戏剧表现人类的罪恶行为，阐述天主教救世之道。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他认为人们应该皈依上帝，

这是具有反动性质的思想。

尽管 16 ~ 17 世纪西班牙文学存在着它所特有的矛盾，但它所创造的艺术珍品，尤其是西班牙的小说和戏剧，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4. 建筑与绘画艺术

16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新的建筑风格对西班牙建筑影响深刻，但是一些优秀的西班牙建筑师并不满足于此，开始探讨如何从本质上把握意大利建筑的精髓，从而使西班牙建筑具有民族特色。

建筑家胡安·德·艾列拉（公元 1530 ~ 1597 年）活动于 16 世纪下半叶，他创造了“艾列拉式”这种特殊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吸纳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形式。

艾斯库略尔是一座大型宫殿，同时也是皇家陵墓和修道院，这一设计思想在反宗教改革时期很有代表性。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绘画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西班牙艺术中固然没有 15 至 16 世纪意大利绘画那样谐调的作品，但在 16 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就出现了极具创造性的艺术家艾尔·格来科，他的本名叫多曼尼科·蒂奥托科普里，出生于希腊的克里特岛。艾尔·格来科久居意大利，汲取了替善和廷托勒托威尼斯派著名大师们的宝贵经验。他的艺术是意大利仿古主义的支派之一，在西班牙独树一帜。

在格来科的艺术中，有种极为动人的力量，反映出他内心无比的痛苦。他完成了一系列宗教题材的作品，但他的绘画不似教会艺术那样刻板，其宗教画反映出人文主义思想。

17 世纪是西班牙绘画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在 17 世纪西班牙艺术家中，何塞·李伯拉（公元 1591 ~ 1652 年）是比较突出的。他早年定居意大利，卡拉瓦卓的艺术对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他继承并发展了卡拉瓦卓的传统，成为西班牙最优秀的民族艺术家之一。在他的遗产中，描述基督教苦行者和圣徒们殉教的绘画占据主要地位。

西班牙艺术家迪埃戈·德·西尔瓦·维拉斯开斯（公元 1599 ~ 1660 年）受到国王腓力四世的赏识，被聘为宫廷画家。维拉斯开斯和其他西班牙艺术家不同，他是远离宗教绘画的。他的主要作品是生活画和肖像画。他的早期作品描绘了人民生活中的情景。

维拉斯开斯最优秀的学生是巴托洛姆·艾斯特班·穆里略（公元 1617 ~ 1682 年）。他的宗教绘画带有感伤的情调，这表明繁荣一时的西班牙画派开始走向衰退。

第十六章 英国与法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一、16 世纪英国经济的发展

和欧洲其他封建国家不同，16 世纪英国封建关系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尤为迅速，而且这种情况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出现。这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开端，导致了 17 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在 200 年之后即 19 世纪使英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当时人们所称的“世界的工厂”。

1. 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16 世纪，制呢业是英国的主要工业部门，它的迅猛发展是英国财富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

“英国呢”或“伦敦呢”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输入俄国，又从莫斯科运往伊朗、克里米亚汗国、诺盖依帐，17 世纪上半叶，俄国商人还把它贩运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

1565 年，是 16 世纪呢绒生产最兴旺的年份，呢绒出口占英国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 78%，羊毛仅占 6.3%，其它所有商品占 15.7%。

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

速发展。

与其它部门相比，毛纺织业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极为迅速，这是英国毛纺织业最重要的特点。由于制呢行会的规章比其它生产部门松，织呢工及其它制呢手工业者当中的财产分化也进行得比其它手工业者快得多。此外，国内外市场对英国呢绒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经营该业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很早就刺激商业所积累的资本渗入呢绒生产，并使它从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又过渡到工场手工业。英国养羊业的成就、农民财产的分化，尤其是 16 世纪圈地运动所造成的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出现，也为制呢业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16 世纪，各通航河道和许多沿海港口大批各种类型船只的建造，推动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殖民扩张。很久以前，康瓦尔半岛就已开采出铅和锡，到 16 世纪中叶，铅、锡和羊毛一起成为英国主要的出口货物。到 16 世纪下半叶，铅、锡、铜、铁矿石的开采量增多，又出现了黄铜生产。但是，在 16 世纪的英国，与其它生产部门尤其是制呢业相比，冶金业的发展相当缓慢。尽管英国的铁矿和煤矿资源丰富，但制铁的技术相当落后。

虽然在 16 世纪英国手工业工场发展成就显著，但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小手工业生产占优势地位，而且，在一些城市还存在着手工业行会制度。

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各地产品互通有无，活跃了国内市场。16世纪时，全国有26个大城市，17000多个小城镇。其中，伦敦发展最为迅速，成为全英的经济中心。以前，威尼斯和汉萨同盟的商人控制着英国同东方和北欧的商业贸易，从16世纪开始，英国商人逐渐打破外国商人的垄断，并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权，开始组织贸易公司，专营海外某一地区的商业。

实际上，英国的海外贸易大多以经商为幌子，疯狂地进行海上抢劫，走私贩卖奴隶。女王伊丽莎白时期（公元1580~1603年），英国海盗活动特别猖獗。女王允许海盗船公开悬挂王国的旗帜，她的著名海军将领霍金斯、德累克等都是海盗出身。

2. 原始积累和圈地运动

伟大的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贸易发生变化，英国成为世界海上商路的中心，这大大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决定这一时期英国资本主义顺利发展基本条件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的原始积累过程。圈地运动就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途径。随着英国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许多贵族领主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便采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抢占农民的土地，用篱笆或壕沟把土地圈起来，作为牧场放牧羊群。这一抢夺农民土地的过程，

自 15 世纪最后 30 年起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初。

圈地运动有两次高潮，一次是 15 世纪后半叶至 17 世纪末，另一次是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初。

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使成千上万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为了生存，大部分农民被迫沦为出卖劳动力的农业雇工，圈地养羊的新贵族和农场主则发财致富，并获得了土地。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

亨利八世（公元 1509 ~ 1547 年）时进行的宗教改革加重了对英国农民的剥削。

除了圈地外，富裕的大地主还在“价格革命”的影响下，提高土地的租额，增加税收，这对贫苦的农民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掠夺。

英国贵族实行的圈地运动，是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手段，它使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转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过渡，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 300 年。

由于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也得到了提高。

3. 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农民争夺土地的斗争

社会的重大变化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而来。在经济发达的郡中，数量众多的中层贵族乃至大贵族，都成为资

产阶级地主。在农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条件下，土地成了有利的投资对象。16 世纪，城市居民、富裕的农民和官吏都愿意购买土地。由于在英国成为贵族的根据就是地产的多寡，只要其地产能够维持贵族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获得贵族头衔，因此，许多人成了新贵族。

新贵族将农民土地、公社土地及修道院土地收归己有，使自己的地产大为增加。此外，富有的新贵族往往创办资本主义企业，从事商业活动，这就使得他们的财产更多了。但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地租，因此他们仍是地主。他们的生活方式同英国农村的封建秩序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因此，他们应被称为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而非资产阶级。

16 世纪英国新贵族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接近资产阶级。此外，如上所述，16 世纪英国富裕市民通过购买或租佃土地，开始加入贵族地主和大农场主行列，这也促使资产阶级同新贵族接近。于是，在 16 世纪，新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结成联盟，在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这个联盟的作用不容忽视。

尽管英国经过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变革，但封建制度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仅仅作为一种新方式在封建制度内部发展出来。大量土地仍然属封建地主所有，大部分农民依旧与贵族存在封建依附关系。

1536 ~ 1537 年，约克郡与林肯郡的农民发动起义，随

后，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发生在东部诺福克郡由小贵族罗伯特·凯特兄弟领导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

英国政府对起义十分惧怕，采用欺骗和镇压相结合的反革命手段对付起义农民。一方面假意答应农民的部分要求；另一方面则派兵向起义军进攻。农民军击溃了政府的军队，并于7月底攻占了诺里奇城。这时，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和康华尔郡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起义军没能摆脱最终溃败的命运。

1569年，圈地运动引起了英国北方各郡不断的反抗和斗争。1596年，牛津郡爆发暴乱，而在1607年，中部其它各郡也成了新的大规模的农民反圈地运动的战场。

16世纪英国的客观经济情况决定了英国的农民斗争具有进步性，斗争的目标是争取土地改革和自由农业经济，巩固产生于农业经济内部的农业资本主义形式，为资本主义发展清除障碍。

英国的农民斗争，具有农民运动固有的特点，即自发性、觉悟性和组织性不足以及行动的地方性。在斗争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同盟。此外，在16世纪，因为财产分配问题，起义农民内部开始分化。财产多寡不同的农民各阶层，在反圈地斗争和土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农民反圈地斗争遭到了失败。

4. 血腥的立法和贸易的发展

16 世纪，圈地运动的发展影响到国家的税源和兵源，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无以为生，社会动荡不安。

从 16 世纪 30 年代起，英国政府颁布了“对于被剥夺者的血腥的立法”。

圈地运动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生产资料，他们不得不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价格革命”中，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一再降低。致使工人工资降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国王颁布了对雇佣劳动的法律。其中特别重要的是，1563 年伊丽莎白颁布的所谓帮工条例。

16 世纪，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和对外贸易额也都相应增长。在这个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伦敦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就连北部比较落后的山区也同伦敦有了贸易往来。在 14 ~ 15 世纪，英国与意大利和东方各国的贸易都是由威尼斯和汉萨同盟的商人控制。到 16 世纪，威尼斯和汉萨的垄断被打破。1588 年出现了掌握奴隶贸易的几内亚公司，1600 年又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为英国人渗入印度奠定了基础。英国的整个对外贸易都由英国商人的大贸易公司控制，它们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很多特权。

英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呢绒、皮革、蜡、啤酒、锡、铅、

铜、铁和其它商品，而进口细麻布、丝织品、花边、造船木材、蔬菜、水果、植物油、香料、药品、银器和刀剑。英国的航运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二、英国的内政与外交

1. 都铎王朝的统治

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封建关系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过程中，英国确立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从 1485 年到 1603 年，英国处于都铎王朝统治时期，他们加紧巩固自己的政权，几乎达到了“王权无限”。这个王朝的第一个国王——亨利七世（公元 1485 ~ 1509 年）进一步抑制旧贵族，提拔新贵族，任命他们为中央的高级官吏和地方的治安法官。亨利七世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是为了扩大商业贸易，取得更多财富。

都铎王朝时期，议会成为巩固王权的工具。议会下院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而上院主要由贵族阶层的代表人物组成。都铎王朝分给他们很多土地，他们对国王更是惟命是从。在都铎王朝统治下，尽管王权得到加强，但各地方的官僚机构仍很松散，依旧是地方自治机构掌握特权，由各郡和教区的地方自治机构来执行国王的一切命令。

由于这些特点，都铎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和法国、西班牙不同，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没有欧洲其他封建制国家那样尖锐。

没有常备军，这也是英国专制制度的特点。但都铎王朝重视海军建设，创立了正规海军。

圈地使封建农村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农民失业，乞丐和流浪汉数量增加，社会动荡不安，这激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因此，都铎王朝依仗自己是英国全部土地最高领主的权威，曾多次颁布法令，反对圈地，但是，都铎王朝禁止圈地的一系列法案全部失效。

1541年，亨利八世设立一个机构专门收税，所有贵族和他的藩臣，在转让、继承和监护土地时都要向国库缴纳税费。在16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获得土地的过程中，这个措施可以巩固英国土地占有制的封建结构并增加王室的收入。

这个时期，都铎王朝君主政权得到空前强化。它镇压反动贵族的暴乱，发展商业，给予商人以许多优惠，支持最早的殖民主义侵略、航海、贩卖奴隶和海盗行为，颁布了限制流浪汉和乞丐并逼迫其劳动的一些残暴法令，疯狂镇压国内人民反对圈地的起义。这不仅符合整个封建主阶级的利益，也赢得了新兴资产阶级和接近资产阶级的新贵族的支持。因为最初他们的力量并不强大，需要依靠强大的君主的力量，在对外和对内政策上解决许多最重要的问题。因此，都铎王

朝的政策是矛盾的，在试图维护封建制度的同时，又成了资产阶级的保护伞。16 世纪英国君主政体的这种矛盾政策中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都铎王朝竭力利用这种形态来维护封建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利益。

2. 英国的宗教改革

英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表面原因是教皇迟迟不批准英王亨利八世（公元 1509 ~ 1547 年）的离婚请求，实际是因为空前强化的王权不能容忍罗马教廷对英国政治的干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要求夺取教会的土地和财富，自主意识日益强烈的广大阶层的人民也不能容忍英国国内的宗教事务由远在罗马的教廷决定。1634 年，亨利通过了一个“至尊法令”，宣布英国国教自立，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元首，拥有任命教会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改宗教法庭为国王法庭，由国王的官吏审判教徒，镇压异端；没有国王的许可，教会无权召集宗教会议，不得制定新教规；现行教规须由国王任命的“三十二人委员会”审查通过，所有与国家法令相抵触的条文都要废除。从 1536 年到 1539 年这短短的几年里，亨利八世封闭了 500 多所寺院，没收其全部财产，另有 90 个神学院和 110 个教会医院的领地也被没收。国王把没收的土地和财产的大部分赏赐给宠臣，还有一部分

以低价卖给投机商和有购买能力的人。这些新的土地所有者，大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

宗教改革要求英国人对新教会完全服从，如果否认新教的基本原则就要作为国事犯处死刑。在爱德华在位期间，英国国教更加脱离天主教的束缚，而吸收了新教的一些内容。英国的宗教改革进行得很不彻底，它只不过否定了罗马教皇作为教会最高首脑的权威，国王成为教会最高领袖，是上帝的代理人。英国教会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

1554年，以防止西班牙入侵英国为名，肯特贵族威阿特领导人民发动起义。威阿特在肯特组织了一支农民军后向伦敦进军，但由于起义军中的贵族和富裕农民担心人民运动继续发展会威胁到自身利益，起义军内部发生分裂，因而这次起义被镇压了。

玛利亚死后，亨利八世第二个妻子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重新恢复了宗教改革方案，由国会制定并通过了《三十九条信条》，规定英国国教的教义，以《圣经》为信仰的惟一准则，否认教皇对教会的最高权力。

宗教改革后，英国教会改称英国国教会。它成为国教，地位处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在“三十九条”里，承认了新教的信仰可以免罪和把圣经作为信仰的惟一源泉的教义以及天主教关于教会拯救力量的教义。王室把修道院土地转给世

俗所有主后，他们获得了以前归寺院的征收什一税的权力。这样，获得什一税的世俗人阶层在英国出现了。

3.16 世纪的苏格兰

在 16 世纪，英格兰的近邻苏格兰还是独立的王国，但其国内并未统一，分裂成北部山区苏格兰和南部平原苏格兰。进入 16 世纪，北部地区还以农业生产为主，城市很少，商品生产发展缓慢。南部平原地区发展较快，居民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与北部相比，商品生产发展较快，有很多城市与英国、荷兰和法国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出口皮革、毛皮、肉、动物油、奶油、鲑鱼肉、羊毛和毛织品，并与经济较发达的英格兰联系密切。

16 世纪，苏格兰王权由斯徒亚特王朝把持，而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迟缓且不平衡，苏格兰的中央集权还没有完成。南苏格兰的大封建主和北部的部族酋长仍保持着独立状态，城市资产阶级刚刚开始萌芽。

在 16 世纪，苏格兰经济落后，国内四分五裂，逐渐成为英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竞相觊觎的对象，无辜的苏格兰在这些国家的争夺中丧失了独立。英国在争夺苏格兰的斗争中特别积极。16 世纪上半叶，法军打败英军并将其赶出了苏格兰。苏格兰因此陷入法兰西王国统治之下。

这个时期，苏格兰在加尔文主义的指引下，争取教会改

革的运动如燎原之火。当国内反天主教的人民运动开始的时候，加尔文教徒和法国人展开了军事斗争。

在市民以及大部分封建主当中，加尔文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他们企图通过宗教改革夺取教会的所有财富，利用新教会制度长老会来巩固自己在复杂斗争中的地位。

神学教授约翰·浩克斯是苏格兰宗教改革的思想家和领袖，他是英国国教会的牧师。1560年，苏格兰的来特要塞被英国舰队围攻，最后苏格兰加尔文教徒获得胜利，在爱丁堡与英军签订停战和约，根据协议，法国军队被逐出了苏格兰。由12个贵族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掌握了国家政权，宣布信教自由，玛利亚·斯徒亚特和她的丈夫不得不放弃英格兰王位。

1586年，在英西斗争尖锐的情况下，伊丽莎白与詹姆士结盟，从而巩固了英国在苏格兰的势力，詹姆士以既不支持西班牙也不帮助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为条件。这样，英国才答应承认他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

4. 英国和西班牙的冲突

16世纪，英国对外实行均势政策，防止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大国任何一方过分强大。意大利战争结束后，法国势力被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成为英国惟一的劲敌。16世纪下半期，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迅速，迫切

需要扩大对外贸易，寻求更多的海外市场，侵占殖民地。但是，西班牙掌握海上霸权，垄断了和美洲殖民地的商品贸易，控制了欧洲和美洲的海上通行，阻碍了英国的对外扩张。另外，英西之间在宗教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因此，英国与西班牙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不可调和。西班牙在美洲拥有富饶的殖民地，1581年合并了葡萄牙及其在亚洲的所有殖民地。西班牙属地尼德兰爆发革命后，英国给尼德兰以援助，以削弱西班牙实力。

海盗法朗西斯·德雷克因为掠夺美洲原属西班牙的殖民地而“功成名就”。1578年，他率领一支不大的舰队通过麦哲伦海峡，然后横渡太平洋，到了摩鹿加群岛，绕道好望角，于1580年，满载他的掠夺成果回到英国。这是继麦哲伦以后进行的第一次环球航行。西班牙驻伦敦大使要求伊丽莎白对因德雷克掠夺所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但没有得到答复。女王亲自登上了普利茅斯德雷克的舰队，封德雷克为骑士，而德雷克掠夺来的一颗钻石也镶嵌在了她的王冠上。

1583年，圣约翰港和与它接壤的纽芬兰岛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领地。随后，女王的宠臣海盗沃特·瑞雷探查了北美洲东海岸一部分，把它命名为弗吉尼亚，并在那里建立了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

这样一来，在国家的支持下，英国的商人和大贸易公司开始和西班牙积极斗争，用各种海盗式的办法，走上了建立

英国殖民帝国的道路。

英吉利王国和自己的竞争者西班牙，当时不仅在世界贸易上发生冲突，而且在欧洲政策方面也有冲突，因为欧洲的天主教势力是西班牙政策的工具，所以英国就支持反对天主教势力的人。

伊丽莎白支持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并帮助起义的尼德兰人，西班牙则通过派遣外交大使和间谍，扶持英国的天主教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组织力量企图颠覆伊丽莎白的统治。

1569年，英格兰北部各郡爆发了由伯爵诺森伯兰、韦斯特摩兰和其他一些反对伊丽莎白王权的封建贵族领导的武装暴动。英国大多数郡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及广大阶层认识到，如果叛乱者胜利，国家的王权将会受到严重削弱，这样，封建的天主教反动势力会更加猖狂，而西班牙便会趁机而入，于是，他们帮助伊丽莎白对抗北部的暴乱。北部的暴乱也没有得到其它各郡的农民的支持。伊丽莎白抓住时机，派遣了大批陆海军去攻击叛乱的封建主部队，迫使叛乱者退回北方。在这个时候，北部各郡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不顾暴乱中宗教口号的蛊惑而展开了反封建主义的斗争。

镇压了北部暴乱后，虽然全国的天主教徒遭到了严厉惩治，但西班牙间谍仍组织天主教徒进行拥立玛利亚为王的阴谋活动，其中以巴宾影响最大。

1586年9月，英格兰的阴谋分子被捕，被特别法庭以

叛国罪处以死刑，这得到了伦敦各阶层的赞同。1587 年，玛利亚被处死。

玛利亚·斯徒亚特被处死是欧洲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一次重创，教皇西克斯特五世颁下特别诏书，号召天主教徒同英格兰作战。

对于英国来说，同西班牙的战争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意义。为了反击陆战队和保卫伦敦，英国建立了陆军和由 200 艘军舰和运输舰组成的舰队。舰队的大部分是由英国各城市商人和海盗的私有船只组成的，这支舰队由德雷克指挥。

豪金斯、瑞雷和其他一些大海盗和航海家当时都参加了大舰队的战斗，荷兰舰队也对英国人给予帮助。

西班牙的舰队被击溃，“无敌舰队”的溃灭，沉重打击了西班牙，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惟一的海上劲敌被击败后，英国成为海上的主人，准备到美洲拓展殖民地。

英国专制政府战胜叛乱的贵族及支持它的国际天主教反动势力，这使英国的政权得到巩固，并摆脱了陷于外国人统治的危险。

5. 征服爱尔兰和 16 世纪的英俄关系

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12 世纪在英国，已开始对它进行侵略。

政治经济落后的爱尔兰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在 16 世纪，

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就对它虎视眈眈，因为它是英国同西班牙进行争夺海上霸权斗争的重要据点。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要求征服整个爱尔兰，使它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王权的强化，使得侵略爱尔兰成为可能。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首先加强了自己对派尔区域的控制。1541年，亨利八世给自己加上爱尔兰国王的称号，要求爱尔兰的封建主宣誓效忠，并开始接受他们氏族的土地，又把这些土地作为自己的恩赐重新分给他们。为了征服爱尔兰和夺取爱尔兰过去修道院土地租户的土地，英国在爱尔兰进行了宗教改革和没收修道院土地的运动，这越发加深了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敌视和斗争。

英格兰人掠夺和征服爱尔兰的重要途径是，大规模没收爱尔兰人的土地，再转给英格兰移民。16世纪，爱尔兰由许多独立的酋长领地组成，王权名不副实，各酋长之间互相倾轧，使得都铎王朝征服爱尔兰有机可乘。

第一次大规模地没收土地是在玛利亚·都铎王朝。都铎王朝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加剧了爱尔兰人为争取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英格兰侵略者压迫的斗争。16世纪下半叶，反对英格兰统治的大规模起义接连爆发。起义者的领袖组成了“北方联盟”，控制了一部分武装力量，拥有经过训练的16000人的军队。在布拉克沃特河，这支军队挫败了英军。英格兰人处境危险。

詹姆士一世·斯徒亚特继位后，没收了乌尔斯特六个郡的土地。他把这些土地分给英格兰的移民，要求他们按照英格兰方式经营并让英格兰人住在这些土地上。因此，很多爱尔兰人被赶出了乌尔斯特。

大量土地被没收，消灭了爱尔兰土地氏族制的残余，从而建立起英格兰地主大封建土地占有制。在暴力强制下，爱尔兰人失去了土地，被迫向英格兰贵族交纳苛刻的地租，沦为小佃户。对英国地主而言，这比根据恩赐的条件把佃户从英格兰运到这里来要更经济些。对爱尔兰进行的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和财富搜刮，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

就这样，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英国征服了整个爱尔兰。

1524年，俄罗斯使节沿着去西班牙查理五世王朝的途径，第一次对英国进行访问。1552年，威罗比-钱斯勒探险队开始寻找通往中国东北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探险队的一只船途经白海到了霍尔莫戈雷。1553年，钱斯勒到达莫斯科，俄英两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由于俄罗斯并不能通过波罗的海和西欧进行贸易，因此，通过白海航路与英国建立贸易关系，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大。伊凡雷帝对俄英贸易发展予以保护，在俄罗斯境内的英国驻莫斯科公司的商人可以自由出入、转移，对他们的贸易免征税费，并赠送住宅供他们在莫斯科居住。在1560年到1570年

期间，莫斯科的贸易活动一度兴盛。英国向俄罗斯出口呢绒、服饰品、武器、硫黄、硝石、铅，而俄罗斯商人则把亚麻、大麻、动物油和皮毛卖给英国人。莫斯科的公司垄断性地为英国舰队供应当时公认为最好的绳索。

英国商人和贵族、莫斯科公司的成员都想把俄罗斯市场控制在自己手中，并通过俄罗斯沿伏尔加河航路同伊朗、印度和中亚细亚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俄罗斯对抗土耳其威胁的斗争，没有得到英国的支持，不仅如此，英国还想和土耳其苏丹结成同盟，以利于自己对西班牙的斗争。

16 世纪末，盛传英国将为土耳其的反对哈布斯堡和教皇的势力提供财力及人力的援助，俄罗斯对此传言深感不安。为了澄清事实，1578 年，伊丽莎白给俄国沙皇写信，声明英国人在土耳其的活动只是限于贸易方面。虽然如此，1600 年，俄罗斯还是派了一个使团到伦敦，企图改变英国与土耳其的关系，然而，他们失败了。

6.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

都铎王朝统治的初期，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专制王权的支持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但到了 16 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的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时，专制政权不仅不是他们的保障，而且已成为前进的障碍。伊丽莎白的晚期，资产阶级开始控制和反对王权。在

16 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顺利地发展，这些阶级当中形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反对派，在他们当中开始很快地传播加尔文教。女王的宗教政策，也不能令资产阶级满意。他们要求按照加尔文教的精神，彻底改革英国的国教，将天主教残余势力清除出去，以摆脱王权的控制，因此，他们被称为“清教徒”。

商品专卖权问题最为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权关系的恶化。伊丽莎白女王常将获利丰厚的商品专卖权作为给宫廷大臣和亲信的赏赐，这使得商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在伦敦市民的支持下，国会又一次提出抗议，猛烈抨击专卖权制度。由于形势所迫，女王只好宣布停止对专卖权的出售，以平息国会内外的不满。

16 世纪，在英国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民族资产阶级。贸易关系的发展和地位的提高，使得伦敦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融合各地方言的基础上，统一的全英语言逐渐形成。16 世纪，都铎王朝的统一的国家和英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英国境内同时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封建国家的专制政权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英国在都铎王朝时期完成统一，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市场，建立了英国人共同的经济生活，这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点。

16 世纪，是英国民族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取得了相当成

就，这些文化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但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是不可能在封建制度统治时期完成的。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才得以完成。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化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哲学和美学最先在意大利产生。与意大利相比，这个时期英国文化的特点更为显著。英国社会矛盾极为尖锐，资本原始积累导致自由农民陷入悲惨的境地，中世纪制度受金钱势力冲击被迅速摧毁。人民性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优点，它孕育出 16 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这样伟大的艺术成就。

1. 人文主义的发展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14 世纪是英国文艺复兴的早期阶段，乔夫来·乔叟和威廉·伦兰德是这个时期文学最杰出的代表。15 世纪，英国人文主义的发展长期受到封建内讧的阻碍。16 世纪初，人文主义文学的创作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人文主义思想持续影响着英国。都铎王朝实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摧毁了修道院，取消了经院教育制度。

英国人文主义者格罗辛、李内克和约翰曾在意大利潜心研究语言学，以方便研究宗教和伦理学，自然科学和美学则

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约翰·科列特热衷于演讲圣徒保写的书信，而科列特则热烈拥护人文主义教育制度，反对学校的体罚制度和繁琐的经院哲学。在科列特的不懈努力下，英国政府才兴办了世俗的文法学校。

牛津大学为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尽管这些思想往往包含神学成分。在这一点上，英国和德国比较相似，德国人文主义的权威人士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在牛津大学极受欢迎，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者。

莫尔目睹了圈地运动导致农村瓦解和农民流离失所这一过程，对农民的悲惨处境给予了极大的同情。1516年，莫尔出版了令他名垂青史的《乌托邦》，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时政的批评，尤其抨击了使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的圈地运动，批判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过程，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第二部分是讲述他在海外一个叫乌托邦的国度里的见闻，那里人尽所能，按需分配，一切产品属于国家，自由公民享有一切权力。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共产主义设想，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这只是空想。但是，《乌托邦》这部作品的意义是重大的。

在托马斯·莫尔描写的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中，我们能够看到中世纪的影子。由于历史的局限，托马斯·莫尔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方法。

在莫尔的乌托邦里，劳动是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那里

取缔了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没有剥削，这体现了他思想的独创性。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英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亨利八世时，托马斯·莫尔被授权参与国家活动。在一段时期内，亨利八世政策的制定似乎受到了莫尔关于各国建立和平关系、缩减国家开支等思想的影响。由于莫尔的政治思想和国王的政策不同，君臣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莫尔对英国的宗教改革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引起了国王的极度不满。对国王俯首听命的法官对他判以极残酷的死刑，亨利八世则“仁慈”地对莫尔实行了斩首。

2. 艺术成就

艺术和文学在英国文艺复兴时代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阶段的英国艺术具有民族性和现实主义特征。这个时期，中世纪各种制度的伟大变革、14到16世纪的群众运动和英国的世界贸易以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都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历史经验，这在艺术中都有所表现。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各种艺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16世纪，以都铎式为主的建筑还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影响。

艾尼戈·琼斯（公元1573～1651年）出生在这个时代的末期。艾尼戈·琼斯的建筑以英国民族建筑为基础，吸收借

鉴了意大利的建筑风格。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音乐取得了丰硕成果，音乐表现有亲和力，精巧优雅，其室内情歌和教会合唱在欧洲影响很大。绘画方面，在造型艺术上，形式比较单一，只有肖像，其成就无法与意大利和德国相媲美。

①诗歌、散文与戏剧

16 世纪，英国文学空前发达，出现了各种流派。剑桥大学学生约翰·斯克尔顿（公元 1160 ~ 1529 年）是人间快乐的歌手。16 世纪后期，诗歌得到继续发展。代表诗人有托马斯·魏阿特（公元 1503 ~ 1542 年）、塞里伯爵（公元 1517 ~ 1547 年）、菲力普·锡特尼（公元 1554 ~ 1586 年）和他们中最有天才的列斯特伯爵的秘书爱德蒙·斯宾塞（公元 1552 ~ 1599 年）。罗伯特·格林的《奈德·布拉翁的生与死》、托马斯·奈什的《杰克·伍尔顿的生平》等骗子小说较为接近现实，特别是在织工作家托马斯·德龙埃（公元 1543 ~ 1600 年）的长篇小说《纽伯尔的杰克》、《高尚的手艺》和《雷登的托马斯》，生动幽默地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手工业者的生活习惯。

这些普通人自豪地捍卫着劳动的高尚性。在格林的喜剧里，他用英勇的笔调来描述农民，这在英国文学史中尚属首次。英国文艺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戏剧。这阶段的戏剧创作之所以繁荣，一大原因是剧院和演艺业的昌盛，戏剧成了 16 世纪特种“议会”召开的场所。进入 70 年代，伦敦的剧

院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其中，以“天鹅”、“红牛”、“地球”等最为有名，规模也较大。

吸引观众的绝不是复杂而丰富多彩的舞台装饰。群众之所以到剧院，是为了倾听生动的戏剧语言，因为那些剧作反映了当时一些迫切的社会问题，在传奇人物或历史人物的身上能够找到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影子，而生活中存在的冲突也与剧作家假想出的冲突相吻合。

14 至 15 世纪，完全世俗地描写现实内容的戏剧取代了中世纪的宗教神秘剧、神迹剧和一些劝诫性的戏剧。英国剧院为了能够继续生存只有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一方面抗议国家的严格检查，一方面又要消除清教徒的敌视。

②莎士比亚与英国戏剧

莎士比亚（公元 1564 ~ 1616 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人。他在二十多年的艺术生涯里，共创作了 37 部戏剧、两首长诗和 154 首十四行体诗。莎士比亚的剧作分为喜剧、悲剧和历史剧三大类，最主要的作品有《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斯》等。他的每个剧本都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英国的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文主义思想。他的历史剧以古喻今，说明加强王权统治的重要性，支持开明君主的统治，表达了人文主义的政治理念。

莎士比亚和那些在中世纪创造出大教堂和市政厅的无名匠师一样，是人民的儿子。在他创作的 154 首十四行诗里，

很少露出个人生活的细节，而在他的 37 个剧本里，每一个角色都直接传达着他的思想和情绪，他们的语言完全符合他们的地位、性格以及所处的环境，作者的观点只能从剧本的发展中找到。莎士比亚所采用的戏剧体裁和方法是他忠实于英国民间戏剧的传统和自己前辈剧作家成就的表现。民间诗歌不重视外表逼真，而注重艺术形象的宏伟、悲剧演员与喜剧性的结合，莎士比亚完全保留了这些特点。在编年史的剧本改编方面，他继承了格林和马洛的手法，在问题和英雄悲剧方面他继承了基德和马洛的传统，在愉快的喜剧方面他继承了格林、洛奇和海乌德的遗产。对于民间游艺场的幕间剧的手法及其破坏礼仪和趣味准则的喜剧丑角，落士比亚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把艺术标准渗透到英国戏剧表演中，他的作品反映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深刻哲学伦理问题。

在《亨利六世》、《查理三世》、《查理二世》、《约翰王》、《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等历史剧中，莎士比亚不仅通过一系列难忘的场面再现了历史事实，而且表现了广大的英国人民群众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和评价。

莎士比亚发挥了他超人的想像力以及霍尔和霍林德作品中所没有的令人惊叹的洞察力，创造了中世纪从失土国王约翰到都铎王朝第一代——亨利七世的英国发展的辉煌图景。莎士比亚戏剧的特点是生动地再现了“历史气氛”，并对政治斗争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其剧本总是形象鲜明地表明

了人民对历史事件的态度。

莎士比亚的《年代记》深刻地反映了英国的历史。他创作的历史剧不仅有《年代记》，还有古罗马历史剧《尤里乌斯·凯撒》、《科里奥兰努斯》、《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这些历史剧与莎士比亚在其创作第二期，即 1601 ~ 1608 年创作的悲剧，性质相差无几。莎士比亚的诗化历史主义直到 18 ~ 19 世纪才得到应有的评价和理解。

在他最伟大的悲剧《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雅典的泰门》中，莎士比亚展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希望和现实之间的鸿沟。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都以金钱的腐蚀力和在自私自利思想影响下个人道德水平的堕落为题材，他笔下的以货币关系为特征的新世界的秩序与封建世界旧秩序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

伊丽莎白后期的戏剧创作以约翰·弗莱契、约翰·韦伯斯特和麦森哲尔为代表，这些剧作家都保留了一定的进步性，他们对摆脱道德准则的人必定会遭灭亡的思想十分重视。当时，本·琼生在伦敦戏剧界可以和莎士比亚分庭抗礼，名噪一时。在悲剧创作方面，他受罗马悲剧的影响，反对人民戏剧的“非正规性”，创作了“学者的”、“正规的”悲剧，如《塞雅努斯的败亡》、《卡·蒂林纳的阴谋》，近似于当时人文主义的历史编纂文学。本·琼生的重要贡献是喜剧，在《福尔蓬奈》、《巴索洛谬集市》等作品中，他用人文主义传统的

优秀精神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恶习，嘲笑了腐朽淫糜的贵族。

从政治角度来讲，晚期的英国戏剧带有封建的反动的性质。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力的削弱和戏剧与大众的要求逐渐脱离，导致英国的戏剧开始衰落。

3. 哲学

文艺复兴时代后期的英国，哲学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当时，英国已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这时期在哲学领域成就最大的当数弗兰西斯·培根，他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奠基人。在他的影响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都注意到与实践相结合，目的是在世界上建立“以人为本的王国”，同自然作斗争。如果人们顺从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需要服务，自然是能够被征服的。因此，只有不断地发展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在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100年之后，培根在其著作《新大西洋岛》中也描述了未来世界的理想王国，但与莫尔的乌托邦有极大的差别。在莫尔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刚刚开始，他捍卫人民的利益但对资本主义发展持怀疑态度。培根认识到积累国家财富和巩固英国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他描绘的宏伟蓝图表现了人对自然的征服，但是在他的理想王国中仍然存在着金钱、私有制和阶级的不平等，他的

乌托邦没有社会主义性质。不过，这部作品仍是非常出色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文明能够以从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一面。

培根的作品《论文集》受到蒙台涅的影响，在这本小书里，他阐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培根崇拜共和国，认为实行君主政体是国家发展的必然，他以对问题的道德方面十分冷淡的态度来论证维持政权的方法。但是，培根对专制制度仍有不赞成的地方。他的主要观点是，假如不能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那不管使用的手段多么残酷，国家依然会动荡不安。他要求颁布以保护农民为目的的法令，他认为，要使英国繁荣和强大起来，农民是必要的基础。

培根原先认为政治生活以物质利益为转移，现在，却把保护小农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自由发展这两个互相排斥的原则融合在一起，这就从思想走向了空想。培根对贵族的态度也同样是具有两面性的。

这位英国思想家在认识论和论自然的哲学学说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培根想创作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他的这种理想只是在《新工具》和《论科学的成就和发展》等作品中局部地得到了实现。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方法脱离现实，但却依靠教会权威而长期存在，培根学说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对这种方法的批评。

四、法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封建专制君主制

受长时间的经济衰落以及 1559 ~ 1594 年的国内战争的影响，16 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这个阶段共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即 1500 年至 16 世纪 50 年代末期，是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专制君主制形成。长期对外战争即意大利战争时期。第二阶段，即 16 世纪 60 年代初期至 1594 年，是国内战争、经济衰退、君主专制的危机时期。第三阶段，即 1595 ~ 1648 年，是专制君主制完全胜利、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发展、法兰西参加三十年战争时期。

1.16 世纪前期的经济状况

16 世纪，封建生产方式在法国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但国家已进入原始积累时期。在法国封建社会内部，逐步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出现。它对封建经济制度起着摧毁和破坏的作用，但它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比荷兰及英国都要慢。

16 世纪前期，法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呢绒、纺织、玻璃、印刷和陶瓷等行业中开始出现，在采矿业、火药制造业、铸炮业、印书业和造纸业等部门中几乎都是集中的手工业。

尽管法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些最早发展起来的工业部门中发展十分顺利，但除开呢绒业的所有部门，没有一个

能像 16 世纪法国呢绒生产部门那样，在国家经济中占有特殊地位。

法国生丝产量小，需要进口意大利及东方其它国家的生丝。由于没有大面积的牧场来饲养优质品种的绵羊，呢绒的生产受到了限制。当时，里昂地区一些小储量的铁矿则是法国冶金业惟一的原材料来源。

法国的商业和对外贸易也兴旺发达，地中海沿岸的重要港口马赛同意大利、西班牙、非洲及西亚一带的商业往来极为频繁。开辟新航线以后，新的对外贸易港口在大西洋沿岸兴起，如波尔多、南特、拉罗余尔等沿海城市，它们同加拿大及北美洲联系极为紧密。

法国与地中海东岸和南岸各国的贸易，促进了这一时期法国的经济发展。16 世纪上半叶，在这些国家的贸易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法国。由于法兰西斯一世在土耳其取得特权，包括作为西欧和近东贸易的主要中介城市威尼斯在内的意大利北部各城市，都位列法国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和利凡得的贸易带有中介性质，但它对法国工场手工业的销售市场的扩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法国商人从中获得极大利润，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及里昂、马赛等工业城市的繁荣。

16 世纪，法国在占据商路、扩大国外市场和积累资本方面成绩显著，但与英国、荷兰及西班牙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2. 资本原始积累和法国资产阶级形成时的特点

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实现途径有以下几个：第一，处于

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对小手工业者及广大帮工进一步加强剥削，逐步把他们变为雇工。

15 世纪末开始的“价格革命”，使这种分化进一步加剧。新航路开辟后，贵重金属大量涌入西班牙和葡萄牙，法国通过与西、葡的劳力输出和商业贸易，也吸收了大量金银。16 世纪中叶，法国金银流量与 16 世纪初相比，增长了十多倍。从 15 世纪下半叶到 16 世纪，法国物价约上涨 3~4 倍，而这个时期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却极为缓慢，资产阶级在这种价格运动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第二，通过殖民掠夺获得大量财富，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重要途径。法国于 16 世纪中叶开始殖民活动，17 世纪获得了迅速发展。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殖民地主要有美洲的加拿大、纽芬兰、阿卡地、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河流域、安的列斯群岛和圭亚那；非洲的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波旁岛；印度的昌德纳戈尔、本地治里等。资产阶级、官僚、富商等阶层还建立了为数不少的殖民贸易公司，大量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通过殖民地和殖民公司，大量的财富聚敛到资产阶级手中，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第三，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包税和国债制度。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了，国内的统一市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在这个基础上，从封建市民中分化出了资产阶级。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就产生了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要求。然而，在 16 世纪，这个趋势只是崭露头角。政治经济分散导致的后果是，各地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不一致，资

产阶级处于无权地位。王室在财政上的盘剥，以及僧侣贵族享有的等级特权，所有这些都是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顺利发展。在外国人眼中，新兴资产阶级虽拥有巨额财富，但却有着极不相称的卑微的社会地位。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反对现有制度，而使得资产阶级不得不接近人民群众，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群众的反封建斗争。但 16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由于经济上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他们无法独立为一个阶级来与特权阶层相抗衡，不具备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能力，他们无力承担推翻封建制度的重任。试图在封建制度下营造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良好环境，才是他们的目的。

法国工场手工业生产发展的缓慢和海外贸易发展的软弱，是造成法国整个资产阶级比英国、荷兰等先进国家资产阶级落后的首要原因。法国的城市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没有得到农村资产阶级的支持，这一点也与英国不同。

3. 工人的斗争和土地制度的状况

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手工工场工人的处境极为艰难。当时，工人的劳动强制性极大，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时间又很长，而且只要稍有违规行为就会受到工场主的处罚。受“价格革命”的影响，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下降，这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处境。1539 年至 1541 年，巴黎和里昂多次爆发印刷工人大罢工，武装的工人群众同工场主、官吏和警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548 年，反对收税吏及其代理人的

斗争在以波尔多为中心的西南部城乡爆发。但是，只要土地私有制的主要形式没变，仍旧是封建所有制，农民还是必须交纳封建地租。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贵族在 14 至 15 世纪就已经出让或卖掉了他们的土地。于是，封建私有制的条件性和等级性几乎全部消失，而从属义务和对王室服军役的义务也成为一纸空文。以货币形式缴纳的钱租被固定下来，成为封建地租的主要形式，它不允许有数额上的变动。可事实上，钱租持续下降，特别是在 16 世纪，“价格革命”时更为明显。

早在 15 世纪，贵族就几乎不再亲自经营封建庄园了。他们一般都让农民租种自己的土地，从而获取货币地租，因此，法国大多数农民已成为世袭佃农。法国农民土地被剥夺的过程常常是先因租税过重而破产，后因无力还债而卖掉土地。破产后的农民，有的到城市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有的则被逼无奈，奋起反抗。

贵族出售土地的现象也时有出现。经济状况越来越差，是其出卖土地的原因。城市富豪，例如高利贷者、大商人，他们购买贵族和破产农民的土地，并获得了征收地租的权力。一般来说，他们会把买到的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

利用雇工在公有土地上建立庞大农场的现象已经几乎消失了，带有商业目的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羊业没有多大利润。这些都不利于资本主义农场的建立和广大农业工人阶级的形成。交钱租和短期佃户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 16 至 17 世纪法国原始积累时期农业发展的重要特点。

4. 法国贵族阶层

16 世纪前期，法国大贵族已经没有了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实力，但他们仍享有许多政治经济特权。但是，地方上一些势力强大的大封建主并不甘心听从王命，他们在“佩剑贵族”走向衰落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拥有土地的官僚贵族阶层。这些“长袍人物”是上层官僚，出身资产阶级。这个新兴的贵族阶层，地位上升很快，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乘法国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之际，开始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排挤旧贵族，从而使自己的土地不断扩大。“长袍人物”拥有出售国家官职的权力，而且控制了国会、法院和高级财政机关，作为旧贵族和“佩剑贵族”政治工具的等级制度下的机关和官职逐渐被排挤到次要地位或被取消。

16 世纪中叶之前，世俗和宗教界的贵族几乎占据了国王会议里的所有位置，但到了 16 世纪中叶，“长袍人物”大大加强了对国王会议的影响。“长袍人物”的政治影响之所以能够增强，究其原因有三：其一，他们是巨额财产的拥有者；其二，他们是王室和高官的债主；其三，在 16 世纪第三等级的非特权阶层，特别是从中脱胎的资产阶级对他们极为支持。他们发扬了先驱者——14 ~ 15 世纪的法律家的传统，与封建显贵的分立主义倾向及其违法乱纪和专横行为进行斗争。他们支持比较牢固的国内警察制度和比较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所有贵族是一样的。这样，除了封建显贵，整个贵族都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支柱，而“长袍人物”作为统治阶级中新兴的贵族阶层，人多势

众，事实上成为最强有力的支柱。

16 世纪，法国的贵族没有团结一致，这点很明显地体现在国内战争中。僧侣阶级也没有团结一致，贫困的城乡下层僧侣阶级在物质状况和社会期望方面常常跟城市的下层居民和农民相差无几。

5.16 世纪前期的专制制度

城乡劳动人民反对封建剥削和资本原始积累残酷掠夺的斗争不断高涨。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而国王正好可以左右双方，凌驾于二者之上。于是，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都要求强化君主的权力，前者想借此来保护他们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后者则希望借助强大的王权来抑制贵族和镇压人民。

16 世纪上半叶，法国实行的工业和贸易保护政策有利于法国资产阶级打下稳固的基础，但是，重商主义政策在这时并未得到彻底执行，工场手工业也没有得到数量庞大的补助金。不过，法国商人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在土耳其利文特的贸易垄断特权。国内关税的部分取消和度量衡的接近统一，也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发展。为了使国家有统一的法律，政府对各个地方的审判条例进行了修改，颁布了许多全国性的法令。国家司法和地方行政制度越来越完善，这就使得封建显贵、地方长官以及贵族出身的其他地方官员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中央政权也得到巩固。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资产阶级得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所必要的统一法制。另

外，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一个参考因素。

16 世纪上半叶，等级代表机关严重地阻碍了中央集权加强，因此，王权取消了这个机关。在查理八世的三个继承者——路易十二世（公元 1498 ~ 1515 年在位）、佛兰西斯一世（公元 1515 ~ 1547 年在位）和亨利二世（公元 1549 ~ 1559 年在位）执政时期，三级会议停止召开了，许多地方会议被取消了，依旧存在着的地方会议的权力也受到极大限制。庞大的军队也控制在国王手中。一切行政管理权都集中在国王会议手中，国王身边的少数人负责处理国家大事。然而最高法院，特别是巴黎最高法院却限制国王随意使用权力。最高法院在登记新法令时，有权向国王提出报告，申述这些法令与以往立法的精神相悖或与国家习惯不符。这种权力称为修正权。最高法院对这项权力极为重视，认为它是参加立法的适当形式。但是，如果国王亲自参加会议，最高法院必须登记会议通过的新法令。

6. 意大利战争

意大利经济发达，而政治上却如一盘散沙，因而成为西欧各个强国争夺的对象。为了让本国贵族得到更多土地，为了使本国商人在地中海获得巩固的商业地位，法国统治者从 1494 年开始，发动了长达 65 年的侵略意大利的战争。西班牙和德国从一开始就反对法国对意大利的侵略。16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和德国联合，查理五世雄厚的实力及其侵略野心，使法国的地位受到极大威胁，双方的战争愈演愈烈。

在 30 ~ 40 年代，佛兰西斯一世又和查理五世两次交战。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查理五世的军队深入法国境内，逼近巴黎。然而由于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击，他的军队无法前进。同时，由于国内信奉新教的诸侯反对他，他只得于 1544 年在克列彼城与佛兰西斯签订和约。法国的新王亨利二世又与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者腓力二世进行战争。由于战争耗尽了两国的财力物力，双方于 1559 年 4 月在卡托·堪布来齐缔结和约，意大利战争至此才真正结束。

根据和约的条款，法国得到了英国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加来，西洛林的三个重要城堡——土尔、麦茨、凡尔登及其近郊也归法国所有，但法国必须撤走在萨伏依的军队。法国的侵略阴谋失败了，西班牙人不但在南方，而且在米兰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7. 人民起义

从 16 世纪 20 年代起，在很多的城市里，反对封建制度的贫民抗税起义和人民的宗教运动相互交织，并在 30 ~ 40 年代达到高潮。法国的人民起义风暴空前高涨，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封建秩序这个人民群众主要的灾难根源。

1548 年，国家把盐税这个人们极为憎恨的税目包括了私人，这一措施引发西南部城市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盐税的新征收方法增加了税额，威胁着贫民。在克尔西、吉耶尼、安古瓦、利穆藏、散顿什各城首先爆发运动，后来运动席卷了农村。然而，在国王武装力量的残酷镇压下，轰轰烈烈的反封建运动失败了。

五、法国的国内战争

1. 国内战争的背景

16 世纪下半叶以“宗教战争”为名的长期内战绝非偶然。每一次内战的原因都不简单，各方都把自己的阶级利益隐藏于宗教的名义之下，这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一样。

在法国农村的分化过程中农民越来越贫困，甚至有一些人连生产资料也被剥夺走了。而此时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价格革命”，降低了城乡雇工的实际工资，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

依靠固定的货币地租收入维持生活的一般贵族，也受到了“价格革命”的影响。正成长时期的法国工场手工业也受到“价格革命”的极大影响。16 世纪中叶，法国产的麻布、亚麻布、丝绸、呢绒、玻璃、书籍和金属制品等等，已丧失国外市场了。国内市场前景也不容乐观。其结果是生产停滞倒退，一部分手工业作坊破产，而有的则解雇工人，作坊主和商人已得不到像过去那样的利润。从 1520 年开始，法国南方比北方早 10 年物价上涨。而到了 16 世纪 50 年代，物价进入飞涨时期。此时，欧洲由南美输入大量廉价白银，货币危机由此爆发。此外，在意大利战争的最后几年，税收又空前增加。资产阶级不仅要交纳名目繁多的赋税，还被迫购买公债和支付对富人特征的税。

所有这些因素渐渐导致了国内战争的爆发。人民群众和

资产阶级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中小贵族中的反对情绪也逐渐加深，封建显贵也不满意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体，不甘心要职被他人夺去，不满情绪弥漫于法国社会各阶层。但是，出于自身不同的利益，他们之间又各有矛盾，人民要反对的是整个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则希望得到更好的发财机会。封建显贵希望中央不再进一步集权，而一般贵族不满瓦罗亚王朝的内外政策，这些想法促成了他们与封建显贵的暂时联合。

在 16 世纪国内战争时期，仅仅是一部分贵族反对专制制度，而且这种反对也不持久。这些人包括封建显贵和一部分失去了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普通贵族。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和专制制度在这个时期的冲突是暂时的。

16 世纪下半叶的国内战争根源于这个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反过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例如城市破产、农村和商旅被劫、人口减少等等。不过经济衰退早在内乱开始以前就出现了。

16 世纪初，法国也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最先传入的是路德教，随后是喀尔文教。法国城市市民和农村的贫苦农民都迫切要求宗教改革，许多城市组成了喀尔文教团体，领导人物都是当地的资产阶级人物。宗教改革在南部和西南部表现得最明显。

在北方，喀尔文主义仅仅在一些大城市和一部分贵族中间获得了支持，在北方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天主教。40 年代，特别是 50 年代以后，许多大贵族也加入了喀尔文教。法国新教贵族企图乘意大利战争法国战败、王权衰落之机，仿效

德国新教诸侯，在法国没收教会财产，增加实力与王权相抗衡。这些改奉喀尔文教的法国大贵族被称为“胡格诺贵族”。

2. 战争的进程

1559 ~ 1560 年，国内局势空前紧张，南部更为严重。在南部许多城市里，经常爆发由胡格诺教徒领导的反对国家官吏和中央政权代表的人民起义。最初，资产阶级对这些运动并不反对。资产阶级这时对政府的反对虽然还没有公开化，但它蓄意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向国王施加压力，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降低税收，削弱官吏在城市的权力以壮大自己。风暴也席卷北部城市，但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大多数还支持国王。法国南部贵族的行动很坚决，他们开始从教会手里夺取土地。1560 年，胡格诺派贵族在康德亲王的带领下企图攻占皇宫，但是遭到失败。

起初，战争的双方是胡格诺派和政府，天主教派有时站在政府一边，有时独立行动。双方都寻求外援，英国和德国新教诸侯支持胡格诺派，西班牙支持天主教派，但“支持”的目的都是为了从法国获取利益。1570 年，法国政府和胡格诺派签订《圣日尔曼和约》：新教徒的宗教仪式在全国得到认可，蒙托榜、科涅克、拉罗舍尔和拉夏里特四个要塞归新教徒所有。这使得新教徒在南部和中部的力量大大增强。条约促成了停战。

1572 年 8 月，许多胡格诺贵族参加了胡格诺派领袖、那瓦尔国王亨利的婚礼。太后喀德琳和吉斯公爵密谋一举消灭他们。8 月 24 日凌晨 2 点，对胡格诺教徒进行的大屠杀开

始了，科里尼被杀死，那瓦尔的亨利因答应改奉天主教才得以幸免。巴黎被杀的胡格诺教徒有两千多人，并延及外省。因 8 月 24 日是法国圣巴托罗缪节，因此，这次惨案在历史上被称为“圣巴托罗缪之夜”。

但是，“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后果却大出喀德琳·美奇第的预料，它很快导致了新的战争。整个南部和少数天主教地区，于 1576 年成立了胡格诺联邦，这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机关、财政、军队的城市和贵族共和国。

同时，在北部彼隆纳城成立了北方贵族的天主教联盟，它由介斯家族领导。联盟的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法国北部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加入了这个联盟，但是占支配地位的是力图削弱中央政权和重新恢复地方原有特权的贵族。

南方的脱离使得政府统治的领土损失了大半。

同时，物价不断上涨，农民极端贫困，以致农村的税收大大减少了。政府增加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税务，因为这些城市的财政还有相当的独立性。于是，北部资产阶级对瓦罗亚王朝的忠实和信任度开始下降。

从 70 年代中叶起，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更加强烈。在奥微、诺曼底、多飞内和其他省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其中平民群众战斗最坚决，参加城市运动的还有广大的中等市民阶层——工匠、小行东、律师、小官吏以及大部分神甫。

大规模的城市运动，也使得早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就已经没落的天主教联盟重新焕发了活力。

法国不仅分裂为南北两部分，而且北部也脱离了王权。

政府全部瘫痪，惊慌失措的国王解散了联盟。这导致了1588年5月12和13日的巴黎起义。

联盟中的资产阶级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得到了来自城市平民的最广泛和最直接的援助。一部分农民也参加了联盟，城郊农民也经常支持联盟攻打敌人。没有广大居民阶层的支持，联盟中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是难以想象的。他们进行强制改革，从战斗中夺得了领导地位。在改革当中，群众站在最前列，而贵族和显贵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1585年法王亨利三世（公元1574～1589年）的兄弟安茹公爵去世，亨利三世宣布他的近亲那瓦尔的亨利为王位继承人，这导致了天主教同盟最终和王权决裂。北部各城市纷纷独立，巴黎天主教徒不再效忠国王，全城在“十六人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再次高涨。法国四分五裂，国王政府岌岌可危。1588年5月，国王逃出巴黎。12月，他派人刺杀亨利·吉斯及其弟。1589年4月，亨利三世和胡格诺派领袖那瓦尔的亨利联合进军巴黎。8月，亨利三世遇刺身亡，那瓦尔的亨利继承了王位，称亨利四世（公元1589～1610年）。波旁王朝的统治从此开始（公元1589～1792年）。

1594年3月，亨利四世进入巴黎，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胡格诺战争至此结束。虽然法国在政治上并没有完全恢复统一，但是，王权的胜利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又获得了贵族的支持，使得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国家的发

展。

六、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

1. 国内战争后的经济发展和专制制度的加强

16 世纪国内战争结束后，法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更迅速发展，在政治方面表现为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完善。在 16、17 世纪之交，“价格革命”在法国结束了。经过长时间波动之后，价格稳定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国内战争的结束，对外和平的恢复，又使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资本原始积累得以继续进行。

亨利四世统治初期，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困难。为了重振和巩固王权，亨利四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财政税收上节约开支和降低部分税额，严禁强迫农民以耕畜和农具作税款的替代品；其次，鼓励农业生产；第三，奖励工商业。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得到政府的资助，发展很快，此外政府还发展海外殖民贸易。1604 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和加拿大的商业公司。1608 年，在北美圣罗伦斯河下游建立了魁北克城。这些措施使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政权也得到巩固。

在亨利四世执政时期，官吏们可以世袭官职。“长袍人物”出身的国务大臣，在国王会议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国王会议中仅有一位名叫修利的显贵代表。

亨利四世对三级会议置之不理，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封建贵族中一直存在反对派，他们不断采取措施反对国王，对专制制度构成了威胁。破产贵族掀起的风潮，人民群众对增加赋税的不满，都成为贵族发动政治阴谋的工具。这些活动大部分受马德里的指使，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在 17 世纪上半叶仍是法国最大的威胁。

亨利四世采取谨慎的政策以保持法国的和平，他只是在 1602 年处死了一名为比伦的叛乱分子。在对外政策上，他支持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萨伏依公爵、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德国的新教诸侯。同时，他尽量在形式上保持与西班牙和德国的和平共处。只是到了后来，亨利四世才公开备战，组织强大的欧洲联盟来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这也促成了他的死。1610 年，他被天主教的狂热信徒拉瓦里亚克刺死。

亨利四世的被刺使法国又陷入混乱，混乱持续了 10 年之久。但是各城市表示支持王权，这表明封建专制制度已得到巩固。但是，混乱对法国也起了破坏作用，到 17 世纪 10 年代末，混乱使其国际声望受到影响，这直接表现在法国对外贸易的下降。

2. 黎塞留时期的法国

1610 ~ 1643 年路易十三在位期间，枢机主教黎塞留出任首相，他一上任就进一步加强了法国专制王权。他选拔穿袍贵族担任官吏，设立非常法庭，惩治叛乱贵族。此间，他拆除封建主的堡垒，使贵族遵守法律、效忠国王，禁止他们相互争斗。1625 年，胡格诺贵族在拉罗舍尔举兵叛乱，黎塞

留亲往镇压，废除了胡格诺教徒在《南特敕令》中取得的一切政治和军事特权，仅保存其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信仰自由权利。黎塞留在中央设立各部大臣，由国王直接控制；在各省，为了削弱省长职权，由中央直接任命总督，掌管各省的司法、警察、财政大权。

黎塞留重视经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以此来增殖财富，巩固专制制度。政府对新成立的贸易公司加以保护，鼓励航海和殖民活动。17 世纪上半叶，法国殖民者不仅巩固了在加拿大的地位，还在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的塞内加尔、马尔加什等地开拓了殖民地。

外交方面，黎塞留着重打击德、西两国的哈布斯堡王室的势力，组织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盟，策划对哈布斯堡的战争。在 30 年战争中，法国则煽动其他国家参战，后来自己也卷入其中，为以后法国建立欧洲霸权奠定了基础。

黎塞留的内外政策加剧了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在黎塞留当权期间，人民几次起来反对苛捐杂税。1624 年，克尔西省爆发了农民起义，要求减少赋税。包围加霍城的农民，最后被贵族军队残酷地镇压了。1636 年春，法国西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同时掀起新的“克罗堪”起义。黎塞留迫于形势，只能与起义代表讲和。农民控诉了税吏和包税人的罪行，要求取消若干种间接税。然而谈判和政府的让步，仍没有能够阻止起义的继续发展。直至 1637 年秋，王室军队才扑灭了这次起义。

1639 年，因反对征收新税在诺曼底爆发了大规模的“赤脚者”人民起义。起义的城市平民和农民不满国家的财

政制度，反对地方行政机关。起义军队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由以让·波松诺吉为首的起义司令部领导。起义者曾一度控制了诺曼底。1639 年秋，国王军队把起义镇压下去。

七、16 世纪和 17 世纪前期的法国文化

1. 法国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者

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促进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兴起。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与基督教会的神学及经院哲学相抵触，于是他们打着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号发展自己的思想文化。文艺复兴运动内容广泛，但就性质来说，它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

法国的文艺复兴与意大利和北欧的人文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国文艺复兴是在吸收和继承国内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法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于 15 世纪末，在 16 世纪达到高潮。16 世纪初出现了布戴·戴塔、普尔·皮埃尔等第一代人文主义者，他们主要从事古典作品的研究、考订、整理和编辑工作。在绘画、雕刻以及建筑等艺术领域，法国主要受意大利的影响，但在文学、思想领域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却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吸收和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了法国自己的人文主义文化。人文主义文化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基督教会及巴黎大学的仇视和扼杀，但由于人文主义在某些方面也符合封建君主和地主贵族的利益，因而也得到了某

些国王、公侯的支持和庇护。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便是一位人文主义文化的支持者，1530 年他带头成立了以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为主的法兰西学院，学院成为人文主义学者与巴黎大学抗衡的基地。人文主义文化在同封建基督教文化的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

法国文艺复兴的第一发展阶段诞生了最先进、最大胆的思想家。

在 40 年代以前，先进的社会思想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两派。温和派综合某些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思想，开创人是哲学家、神学家、语言学家和数学家列弗尔·达塔普尔（公元 1455 ~ 1537 年）。他翻译了《圣经》，早在 1512 年提出的若干原理比路德的某些原则还要早。同时，他又有些消极、脱离群众的倾向。佛兰西斯一世的妹妹纳瓦拉的马加丽特（公元 1492 ~ 1549 年）支持这一派的观点，她主张新教徒和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应该受宽容。纳瓦拉的马加丽特在宫中联合了许多思想先进的学者和文学家，并采取行动支持法国文艺复兴的一些杰出代表，例如马罗、戴倍利叶、多勒等人。

人文主义者博丹（公元 1530 ~ 1596）与蒙台涅同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1577 年，博丹发表了《论共和国》一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

博丹对法国当时的党派倾轧和宗教上的新旧教纷争十分不满，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君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博丹倡导欧洲国家主权理论的先驱。博丹认为享有主权是国家的

基本特征，行使主权的制度决定了政府的形式。

然而，博丹并不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他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生活，主张自由贸易。这些理论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观点。

博丹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对法国和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博丹也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他于 1566 年发表的《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西欧第一部比较详备的史学理论著作。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循环论，坚持历史发展的进步性。他指出，历史学是一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特殊学科，同时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些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16 世纪上半叶，比较激进派别的著名代表还有艾登纳·多勒和波纳文杜尔·戴倍利叶。多勒支持社会下层的斗争，并参加过里昂印刷工人的罢工。多勒主张思想自由，他怀疑宗教，这不但使巴黎大学领导的天主教阵营反对他，而且也使新教徒反对他。后来多勒被控为无神论者，在 1546 年作为异教徒被活活烧死。

波纳文杜尔·戴倍利叶著有讽刺对话录《和平的铙钹》和现实主义小说集《新的乐趣》。《和平的铙钹》反对教会和宗教，最后戴倍利叶在当局的迫害下被迫自杀。

拉伯雷也属于这一派别，他是 16 世纪法国文学的卓越代表，著有讽刺小说《巨人传》。如同对待天主教那样，拉伯雷也同样敌视新教。拉伯雷与多勒和戴倍利叶一样，不仅反对天主教，更反对一般的宗教。拉伯雷对人类社会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人们可以科学地认识世界并用它的财富来为人

类造福。拉伯雷重视教育，他指责教会教育的不足，并指出了自己的和谐地、全面地发展人的个性的思想的先进性。拉伯雷是一位具有民主倾向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作品继承了法国民间文学中讽刺和夸张的传统，另外，民间语言和民间传说故事的运用，也赢得了人民的喜爱。拉伯雷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具有很大影响。

2.16 世纪前期的社会思想和艺术

先进文人的创作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主教徒和经院学者先后在巴黎大学和耶稣会的领导下反对他们。佛兰西斯一世最初对新的文化潮流的要求并不苛刻，持调和态度。国王鼓励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不限制新教徒的所作所为，国王甚至还建立了一所新型世俗大学来与神学家所支配的巴黎大学对抗，这一教育机关便是后来的法西兰学院。它以传播人文主义为使命，由杰出的学者吉雍·蒲德领导。在 40 年代初期，国王完全走向反动。采取严厉的思想箝制政策，法国进入了漫长的文化专制时期。

然而反动势力并不能完全扼杀进步思想。40 ~ 50 年代初期，先进社会思想又曾有过短期的高涨。在此期间，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先进思潮。例如，50 年代初期出现的政论作品《论志愿奴隶制》，就坚决抨击专制制度，主张人民有拒绝服从国王的权利。

在法国人文主义文化中，拉伯雷是民主倾向的代表，而七星诗社则代表了贵族倾向。七星诗社由七位人文主义作家

组成，其中以龙沙和杜·贝雷最为著名。在文学表现形式上，他们推崇希腊、罗马诗体文学及意大利十四行诗体，摒弃民间诗歌体裁，反映了他们的贵族倾向。

这一时期是政论文章发展的大好时机，在新兴的“政客”派里出现了有名的法学家、历史家和经济学家让·巴当（公元 1530 ~ 1596 年）。让·巴当的主要著作是《论共和国》。他主张国家主权应由君主一人承担，支持专制制度，倡导国家的统一。

米舍尔·德·蒙台涅（公元 1533 ~ 1592 年）是 16 世纪下半叶在法国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蒙台涅出身于“长袍人物”，曾是最高法院顾问，后任波尔多市长，后来弃官从文。蒙台涅的主要著作是三卷的散文集《随笔集》，共有 107 篇散文。《随笔集》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研究自我而研究人类。与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不同，蒙台涅不承认任何权威，怀疑主义是蒙台涅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16 世纪，法国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和数学获得了很大发展。这个时代，还出现了许多优秀学者，如自然科学家和陶瓷艺术家伯纳尔·巴黎西，名医安布鲁瓦兹·帕勒，语言学家、著名的反天主教评论家和出版家、印刷家亨利·伊登。

具有进步倾向的选型艺术也有了很大发展。弗兰索瓦·克路哀、比埃尔·杜木斯特等人的铅笔画像对人的心理刻画细微，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谷琼和热曼·皮龙是当时著名的雕刻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思想带来的新风格，渐渐取代了建筑术中的传统的哥特式。后来，16 世纪法国的

建筑术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师有彼尔·勒斯科和菲利伯·德洛姆。

这一时期，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发展势头很猛。版画家扎克·卡洛（公元 1592 ~ 1635 年）的创作说明了这一点，他的作品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勒南三兄弟中的路易·勒南是描述农民生活的巨匠。

3.17 世纪的文学和哲学

① 矫饰文学

17 世纪上半叶，法国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化有几个主要派别。社会矛盾加深了各派之间的对立。这个时期，法国贵族的反动集团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堡垒，封建显贵是他们的头目，他们表现出反现实主义的思想倾向。这种文学思想被称为矫饰文学。17 世纪上半叶法国矫揉作风的盛行，体现了封建和天主教反动势力对西欧社会先进集团的攻击。

② 笛卡尔哲学

17 世纪法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些伟大成就与古典主义美学和唯理论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法国唯理论哲学的奠基者和最大代表是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勒奈·笛卡尔（公元 1596 ~ 1650 年）。笛卡尔属于“长袍人物”。为了躲避天主教的迫害，1629 年笛卡尔移居荷兰，后又迁居瑞典、斯德哥尔摩，1650 年死在那里。笛卡尔的主要著作有《指导理智的规则》、《论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和《激情论》。

笛卡尔反对盲目信仰，高举理性主义大旗，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运用理性对以往的各种知识进行怀疑，用“理性”的尺度审查以往的一切知识。他提出的命题是“我思，故我在”。提倡普遍怀疑，这是对基督教及经院哲学的蔑视和反抗，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呼声。笛卡尔用怀疑主义作为武器反

对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以人类理性代替宗教信仰，具有反封建神学的进步意义。

笛卡尔的哲学主要包括“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两大部分。笛卡尔还是一位科学家。在物理学上，他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在数学方面创立了解析几何，在心理学、生理学等领域他同样建树颇丰。笛卡尔的思想在 17 世纪上半叶欧洲科学技术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哲学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既反对封建制度，但又软弱动摇、同封建势力妥协。

笛卡尔唯理论对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者起了显著的影响，而且对法国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在 17 世纪上半叶，就有人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体系进行了批判。伽桑狄是与笛卡尔同时代的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对笛卡尔 沉思 的诘难》和《伊壁鸠鲁哲学体系》等。在哲学方面，伽桑狄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伊壁鸠鲁的原子唯物论，认为原子组成万物，万物是运动的。在认识论上他是个经验主义者，认为知识起源于对外物的感觉，感觉比理性认识可靠。伽桑狄代表了资产阶级中比较激进的阶层的利益，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伽桑狄的唯物主义仍不彻底。

③ 古典主义文学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历来是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对 17 世纪的文学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古典主义的艺术借着尊崇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名义发展自己。这种艺术要求

“模仿自然”，并认为艺术创作应着眼于创作富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作品，歌颂那些能为服从理性和国家义务而不顾自己感情和私利的人们。古典艺术的一个常见题材便是描写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但是，古典主义艺术本身也包含着矛盾，既有发挥人的悟性的特点，又有程式化的危险，使人对艺术规则的理解产生困难。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30、40年代是古典主义的兴起阶段；60、70年代是繁荣阶段；80年代末开始走向衰落。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中涌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喜剧作家莫里哀、悲剧作家高乃依、悲剧作家拉辛、寓言诗人拉·封丹、文学批评家布瓦洛等。

古典主义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文化。古典主义作家歌颂理性，批判基督教神学，反对盲目信仰，是为资产阶级立言。他们的作品大都对封建社会作了批判。人文主义文化强调天才、个性，不限制个人享受，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在文学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不拘一格。而古典主义作家则强调理性，注重形式格律，讲求统一。这些变化反映了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害怕及对和平的向往，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扶植下得到发展。可以说，古典主义文化是人文主义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专制政府也不放过对文化的控制，它竭力把国内的精神生活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为此在1634年设立了法兰西学院，政府企图通过学院来影响文学的发展方向。出于同样想法，1648年又创立了王家绘画雕刻学院。

彼尔·高乃依生于卢昂，曾在卢昂法院任职。后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深深影响了法国的戏剧艺术。是他第一个把悲剧的题材扩展到分析全民性的人。高乃依的悲剧作品具有“惊人的内在热情”（别林斯基语），是这个时代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反映。

17 世纪 30 和 40 年代是高乃依创作的高峰期。高乃依的《西达》的初次上演是法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作品充满着爱国热情。这部作品批判了宗法和等级的“义务”观念，把它和爱国主义情感对立起来。剧中也谴责叛国行为，歌颂英雄事迹。

高乃依在以后的悲剧《贺拉士》和《西娜》中，以罗马史为题材，以悲剧形式描写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从 40 年代下半期起，高乃依的创作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高乃依仍然是当时的先进作家，但是其作品的深刻性比以前明显降低了。

尼古拉·普逊的创作构思和探求的历史是值得一提的。从 1624 年起，普逊住在罗马，研究古罗马文化和意大利绘画。普逊的绘画充满着人文主义的气息，颂扬人类精神的伟大。他绘画的特点是：有概括而高超的形象；选择协调的、内心一致的、经过在逻辑上严密考虑的、有时带有一些理性的构图。

第十七章 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与瑞士

一、德国的农民战争

伟大的农民战争是德国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的最高点。闵采尔是公开斗争的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农民战争爆发在黑林山南部以及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各地，这些地区与瑞士接壤，斗争最为激烈。这里的宗教改革比路德派更激进，它们的要求不仅仅在于改革宗教事务。闵采尔的门徒和拥护者把宗教改革的重点放在城乡的下层人民身上。

1524年8月24日，汉斯·弥勒在士瓦本地区施图林根伯爵领地发动起义，揭开了德国农民战争的序幕。

起义者拒绝向领主缴纳赋税和服劳役，他们共3500人开赴莱茵河北岸的瓦尔茨胡特城，并以此为据点。该城的革命传教士胡布迈尔不仅是闵采尔的学生而且也是战友。起义发展很快，迅速蔓延至今天的巴登北部全境。

伴随着农民起义，在瓦尔茨胡特，广大的市民请回了曾遭驱逐的托马斯·闵采尔的门徒巴尔塔查尔·胡布梅耶尔传教士。肯琴根和其他许多城市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这说明宗教改革和迅速扩大的农民起义之间有直接的联系。

在离多瑙埃申根不远的布勒格山谷地区有一支革命农民

的队伍在活动。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是贫农，即维宁根城的农奴和依附农民。1524 年 11 月，这支队伍的领导者要求维宁根市政当局免除农民的一切苛税和义务，赋予他们使用公社耕地的权利。同时，维宁根市政当局也向农民队伍表明了自己的妥协态度。这样，克列特皋、赫皋和巴尔的农民队伍意见开始出现不一致，有的主张妥协，有的主张继续斗争。这时维宁根市政当局在 1524 年 12 月 13 日突然袭击并打败了布勒格山谷的革命队伍。这就是起义以来的第一次流血冲突。

1525 年 2 月肯普腾、考弗别林及阿利皋等地发生的农民武装起义是上士瓦本农民战争的序幕。

2 月末和 3 月初，在整个上士瓦本的波登湖与多瑙河流域之间的地区，农民队伍不断扩大，起义活动继续发展。

革命者要求消灭所有领主，而温和派则把“上帝的法律”理解为减轻农民的负担和废除农民的农奴身份。温和派的宣传博得了一些较富裕的农民和领导人的支持，而贫农以及城市平民则倾向于闵采尔一边。奉行温和策略的“基督教联盟”的主要领导人答应与上士瓦本联盟进行谈判。

农民阵营力量的不断壮大，农民与城市下层平民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他们加紧行动起来。1525 年 4 月初，上士瓦本联盟军司令乔治·特鲁赫泽斯撕毁停战协定，突然进攻莱普海姆的农民军营。农民军被击败，特鲁赫泽斯又进攻上

士瓦本那些装备不良、彼此分散的农民军队。

特鲁赫泽斯的进攻促进了革命行动新高潮的到来，这种行动蔓延到整个德国中部地区。在波登湖以北的威加顿城附近，特鲁赫泽斯遭到重创。

特鲁赫泽斯运用策略，使农民队伍互相敌对。

1525 年 4 月底，上士瓦本农民的主力被击溃，特鲁赫泽斯转而北上，开始进攻弗兰哥尼亚和屠林吉亚。

在弗兰哥尼亚地区，1525 年 3 月末爆发了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起义。许多中小城市的平民和一部分市民参加了起义。起义军攻占了上百个城堡和修道院，惩治了许多封建主。

但是，由于各队伍成分非常复杂、农民眼界狭隘以及领导者的策略不当，弗兰哥尼亚的局势慢慢变得有利于领主。革命队伍中的市民阶层纷纷动摇，到 1525 年 4 月下旬，他们投向敌人方面。市民阶级的背信弃义使农民队伍人心涣散，最终分裂失败。

屠林吉亚和萨克逊地区的农民战争的领导人是闵采尔及其学生普法伊费尔。起义者包括贫民、工匠、矿工，斗争最为坚决。闵采尔于 1525 年 2 月底来到屠林吉亚，把缪尔豪森城作为据点发动起义。3 月 17 日，缪尔豪森城市贵族被推翻，起义者组织了“永久市政会”，闵采尔是这个革命政权的实际领导者。此城成为德国中部和北部革命斗争的中

心。

闵采尔在缪尔豪森推行他的革命理想，实行社会变革。他提出取消任何契约，土地应一律归农民所有。在这里，财产公有，人人劳动，并废除政府机构。

1525 年 5 月中旬，在屠林吉亚的弗兰肯豪森附近，有炮兵装备的诸侯骑兵与手无寸铁的农民队伍之间进行了会战。

1525 年 5 月 16 日，农民军在一座山岗上遭到包围，由于敌众我寡，农民军 8000 人中牺牲了 5000 人。5 月 27 日凌晨，闵采尔被处以死刑，临死前他说：“忏悔？决不！世界上的一切都应当归公，千年天国定会实现！”在这之前的 5 月 25 日，缪尔豪森城失陷。“永久市政会”的其他成员也被杀害，起义最终失败了。

起义的失败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只有诸侯从中获利。骑士阶层也不再反抗，向诸侯投降。德国市民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也降低了。守旧的市民害怕农民——平民起义，也忙于寻求诸侯的庇护。

查理五世认识到诸侯势力扩大的威胁。16 世纪 40 年代，查理五世开始打击路德派诸侯，这些诸侯与某些城市组织了特别同盟，以反击皇帝。新教徒和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联合起来，最后击败皇帝。1555 年，双方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每个诸侯可以自主决定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

宣扬了教随国定的原则。

1555 年宗教和约使德国出现了天主教和新教两个诸侯集团。天主教包括哈布斯堡皇室全部世袭领地、巴伐利亚、弗兰哥尼亚、莱茵河流域和德国西北部各僧侣诸侯国以及阿尔萨斯。新教包括德国北部各诸侯国、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萨克逊、黑森、不伦瑞克、上普法尔兹和下普法尔兹、符腾堡等。两个集团在宗教关系和政治方针上都不一样，新教诸侯坚决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大国政策。

查理五世迫于压力最终退位。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领地、捷克和匈牙利都投靠了查理的兄弟——斐迪南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也传给了斐迪南一世。西班牙、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地则归查理的儿子——腓力二世所有。

可以看出，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推动了反动政治势力相互之间的斗争，加剧了德国的诸侯割据局面。

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

1.16 世纪前后的政治与经济

16 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在政治上仍然不统一，国界也没有划清，各诸侯集团无意于国家的统一。到 16 世纪初，帝国的实力越来越比不上各邻国。士瓦本联盟和德意志皇帝并没有成功地统治瑞士。帝国和各诸侯的军队在 1499

年被击溃，之后不得不在 1511 年的条约中承认瑞士联邦的独立。当时的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在意大利发动战争，结果不但败于法国，而且也被威尼斯打败了。但从 15 世纪末以后，哈布斯堡王朝统一世界的政治野心获得了罗马教廷的积极支持。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奥地利大公军事力量强大且富有，与当时最大的贸易高利贷商行开始在财政上相互勾结，力求统辖德国各诸侯，查理五世（公元 1519 ~ 1556 年）时代，哈布斯堡王国进入鼎盛时期。1516 年，查理继承了西班牙王位，获得了西班牙在欧洲和海外的全部领土。

16 世纪初，封建生产方式在德国仍占统治地位，但行会手工业继续存在于城市里。

德国的商业，特别是中介性的贸易十分发达。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是连结西欧与东北欧以及东方诸国的中间地带。15 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使德国北部不少城市面向波罗的海、北海。莱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是欧洲著名的中介贸易城市，德国南部的城市纽伦堡同西欧和中欧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设有德国人的商栈。他们的势力也曾到达美洲。16 世纪初，德国还出现了如富格尔家族一样的大银行家，他们不但是德皇和大诸侯的债权人，而且经营提罗尔银矿、匈牙利铜矿，控制中欧的经济，乃至左右德意志的政治。

资本主义因素也渗入德国采矿业。中世纪德国在开采贵金属方面具有优势，就采银而言，德国遥遥领先。以后由于跟美洲贵金属的主要供应者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关系，德国的企业主仍然保持优势。此外，富格家族、维尔杰尔家族、霍赫秦特家族、伊姆霍弗家族、包哈尔顿家族等在捷克、匈牙利以及奥地利等富产矿石的国家都经营采矿业。

德国工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农业的发展。一些农村由于改良了土壤，实行深耕细作，使得农作物品种增多，扩大了耕地面积，从而提高了产量。有些农民，由于从事小商品生产，和市场有密切联系。在一部分农村中，代役地租代替了劳役地租，农民中开始贫富分化。大量无地和少地的破产农民迫于生计，沦为雇佣工人。

16 世纪初，在德国存在着七大选侯、十几个大诸侯、两百多个小诸侯以及上千个帝国骑士。诸侯各有自己的政权、军队、法律、货币，彼此独立，成为德国的“国中之国”。国内关卡林立，从美因兹到科伦不足 200 公里，就有关卡 13 处之多。德国的货币超过了千种。德国长期的混战及分裂反过来又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6 世纪头几十年，德国许多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市民骚动，他们提出的取消所有诸侯、建立一个统一政权的帝国的要求，迎合了市民阶层先进分子的利益，有利于联合反对派的其他阶层。

市民中的大部分手工业者及商人的反对情绪并不十分强烈。他们所反对的是贵族及其对城市事务和财政的独断专行。另一部分市民的企业活动已经与国内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联系，因而有着更激烈更广泛的要求。这一部分市民不但不满贵族的暴行，而且也不满德国政治上的不统一。

封建主中间的中等贵族渐渐分化为两种势力：一部分发展为独立的小诸侯，大部分则降为小贵族——骑士阶层。帝国骑士阶层是帝国军队的主体，他们属下层贵族，由皇室直接掌握，在政治上表现特别积极。骑士阶层和帝国的命运有很大关联。处于采邑从属关系、为诸侯服务的下层贵族人物也充满忧患意识。

德国的天主教会在国家中地位特殊。教会除本身的宗教特权外，高级僧侣就是大封建主，在德国的七大选侯中有几位大主教。全德国 $1/3$ 的土地归教会所有。教会除征收贡赋、强制农奴执行各种封建义务之外，还征收什一税、彼得钱，出卖圣职，出售圣物、赎罪券，通过各种方式剥削人民。政治分裂和皇权软弱使教会在德国有机可乘，发展壮大。

天主教会的做法损害了世俗封建主的利益。人民日益不满于教会对国家政治的参与以及对世俗生活的鄙视。15～16世纪，走上中央集权道路的国家开始反对教会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在这些国家里，天主教会不得不限制教皇代理人、税

捐征收人的免罪符出售等对人民的压榨、剥削活动。社会经济的变动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为宗教改革运动提供基础，但这种运动却最早发生在德国，而且联合了最广大的市民阶层。

2. 宗教改革运动

德国市民的反对情绪在思想方面表现为人文主义运动。人文主义最早发源于意大利，德国人文主义者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求助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按自己的方式解释这种文化，并把它看作基督教的根源。

德国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兴趣不在数学、医学、法学上，而在宗教、哲学和道德等各种政治和宗教反对派最关注的问题上。

16 世纪初，在德国语言界享有最大威信的是驰名于西欧各国的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公元 1466 ~ 1536 年），他生于荷兰，曾在荷兰、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地居住过，但在德国住的时间最长。从 1513 年起，他开始定居于巴塞尔城。

伊拉斯姆斯把希腊文字的《圣经》和各位“教父”的作品翻译成了拉丁文。他在译文特别是注释中极力从人文主义的立场阐释原文。伊拉斯姆斯的讽刺作品《愚人颂》、《家庭谈话》等极受欢迎，这些作品涉及当时最受关注的宗教、哲学、政治和社会问题。伊拉斯姆斯讽刺的对象主要包括天主教僧侣阶级、经院“科学”和神学家。伊拉斯姆斯对天主教

会的仪式、封建思想体系和中世纪的整套观点的嘲笑，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捍卫。

诚然，人文主义者的宣传仍具有一定的狭隘性，但人文主义者的活动毕竟为宗教改革作了很多准备工作。

宗教改革以前，全国性的政治混乱为讽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除了胡登和伊拉斯姆斯之外，讽刺作家还有塞巴斯蒂安·布兰特和托马斯·穆尔纳，他们都抨击同时代人的“不智”。

国家的命运使这些讽刺作家们深感不安，他们号召用理性来批判一切。许多人描写了人民生活的痛苦，他们不仅发出号召，而且也反映了读者的心声。社会热潮也促进了民间文学的发展，16世纪初，民间文学已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提尔·欧伦什皮格尔的民间作品是这时的杰出产物，其风格有的温柔而亲切，有的愤怒而严厉。甚至人文主义学者有时也从人民的生活中搜集创作题材。灵巧的平民、快乐的书生和活泼的丑角占据了作品的主要题材。

德国宗教改革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汉斯·萨克斯（公元1494～1576年）在少年时代就开始研究公会诗歌的“高尚艺术”。他在纽伦堡成立公会诗歌学校，并马上成为这个歌会的代表人物。1523年，萨克斯在他的寓言诗《维滕堡之莺》中表示热烈拥护马丁·路德。后来他又作了许多的寓言、诗歌、滑稽剧以及剧本。萨克斯深知普通劳动人民的

口味，作品风格很朴素。萨克斯的作品也涉及到生活中的黑暗方面。行会手工业的衰落以及金钱势力，使他感到不安。

德国文学到 16 世纪末取得了新的发展。这时出现了关于浮士德博士和永久流浪的犹太人阿哈斯维尔的民间著作，这些民间作品来源于“各族民间诗歌最深刻的”故事。关于浮士德的神话非常受欢迎，这一神话表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勇敢叛逆精神。

16 世纪德国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像奥格斯堡、纽伦堡或斯特拉斯堡等城市发展很快，已成为书业印刷的中心，艺术手工业、建筑业、雕塑和绘图在这里也很发达。

日常生活、风景画和肖像是艺术创作的主要对象。甚至艺术家在处理传统的宗教题材时，也都尽量避免用公式化的中世纪艺术创作手法，使自己的作品更贴近生活。1525 年人民起义失败后，封建反动势力又卷土重来，德国的现实主义艺术开始走下坡路。写生画和水粉画中矫揉造作之风渐长，以前的表达力没有了。只有在风景画中，现实主义的传统仍得到了保留。十六世纪下半叶，德国艺术界中可与杜勒或霍尔拜因相比拟的现实主义画家已经没有了。

德国的宗教改革始于马丁·路德的改革活动。马丁·路德（公元 1483 ~ 1546 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501 年进入爱尔福特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接触到人文主义思想

并深受其影响。1505 年辍学去当修道士。1512 年，路德获神学博士学位，维登堡大学聘他做神学教授，并让他担任维登堡修道院副院长。对《圣经》的细致研究使他发现天主教会的神学理论及制度并不是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于是他提出了“信仰耶稣即可得救”的观点。具体说就是：（一）只要个人虔信上帝，灵魂就可以得救，“圣礼”并不是非要不可的，更不需要教士的监督和干预；（二）《圣经》是信仰的惟一依据。路德的观点实际上否定了教皇的权威以及天主教神学的基本观念。

1520 年 8~10 月间，路德相继发表了三篇文章：《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论基督徒的自由》和《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后两篇文章提出改革宗教教义和仪式：（一）“信仰耶稣即可得救”，得救来自于内心的信仰，任何其他行为都是不必要的。这样，教皇、教会、教徒、教士便都是多余的。（二）简化宗教仪式，只保留洗礼和圣餐礼。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中，路德反对罗马教廷在德意志的胡作非为，提出建立脱离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教会的主张；不向罗马教廷上供；教士由自己委任，所有教士职位全部脱离教皇；世俗的事情由世俗当局处理。这都是为了使德意志民族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彻底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

罗马教皇宣布路德的学说为“异端”，并于 1520 年 6 月

发布敕令开除路德的教籍，允许路德在两个月内撤回《论纲》。但路德毫不让步，于同年 12 月 10 日，当众烧毁了敕令。在由德皇查理五世主持的沃姆斯帝国议会上，路德宣布：“坚决不改变自己的主张，死而无悔！”会后，路德得到了萨克森选候的保护，在瓦特堡翻译《圣经》。不久，德文《圣经》问世，它推动了德文的发展，也为人民群众直接引用《圣经》进行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德国掀起的广大社会运动，使罗马教皇及天主教高级僧侣没有机会迫害路德。在此运动的庇护下，路德最初对罗马教廷采取了强硬立场。路德在 1520 年同罗马教皇的论战中，甚至引用捷克泰波派学说的观点，要求人们用武器攻击“红衣主教、教皇和罗马罪恶城市的一切狐群狗党”，“血债血还”。同年，路德又公开烧毁了罗马教皇开除他教籍的诏书。路德不屈不挠地反对教皇，因而成为全民运动的领袖，这一运动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德国统一的必然阶段。

但是，针对罗马教皇的斗争的时间很短，路德的学说和活动获得社会各个阶层拥护的时间也得短。早在 1520 ~ 1521 年，参加宗教改革的社会各派别当中，意见已出现不一致。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三个阵营：反动派阵营，市民改良派阵营，农民平民派阵营。

第一个阵营主要由想维持封建制度的皇帝、高级教士、一部分高级贵族和富有的城市贵族组成。

第二个阵营，主要由反对派中的有产阶层组成，如低级贵族、市民阶级以及前面描述过的那一部分高级贵族或诸侯。这些人要求摆脱罗马，取消教会。

第三个阵营由被剥削的群众也就是农民和平民组成，他们是宗教改革中最坚决的力量。他们要求彻底改变甚至消灭现存剥削制度。

路德在 1523 年发表的论文《论世俗当局以及人们对世俗当局应服从到什么程度》中公开了自己的立场。他支持现存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并逐渐蜕变成诸侯的代言人和奴仆。被剥削的农民和平民群众对路德的这种转变感到失望，也就不再追随地。于是托马斯·闵采尔便又成了宗教改革的领袖。

闵采尔于 15 世纪 90 年代生于哈茨的什托尔堡城。他受过高等教育，深受希腊罗马文学和人文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是闵采尔生性活泼，人文主义运动的狭隘性以及德国人文主义者那种抽象的静观倾向都未能影响他。更没有人文主义者对人民群众的蔑视和冷淡态度，闵采尔选择了神甫事业，这使他与人民群众可以经常来往。他自由地研究《圣经》，并用反教会的精神来加以解释。1513 年，闵采尔在哈雷成立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的秘密同盟，其实际目的是反对整个罗马教会。

闵采尔的哲学思想核心是泛神论。他强调信仰来源于

“人的理性”。他不赞成蒙昧主义和盲目信仰，认为《圣经》并非惟一的启示。他主张理性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都有的”，从自己的理性中领悟启示便能“人人升入天堂”。闵采尔甚至提出：即使是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基督和我们一样也曾是人，不同的是，基督是先知和师表。

闵采尔的政治纲领是主张在地上立即建立“千年天国”，闵采尔认为现实的世界由教会和封建主统治，充满罪恶。上帝的选民——农民和工人，应该用“大震荡”、“大打击”的暴力手段把那些不敬上帝的贵族赶下台来。

此外，闵采尔认为：人民贫困、受压迫的根源是财产私有制。他主张“同劳同酬，完全平等”，“政权应交给普通人民”。

为了贯彻他的原则和观点，闵采尔以被压迫群众为主体组织了一种名叫“基督教同盟”的秘密团体。

为免遭逮捕，托马斯·闵采尔在1524年8月离开了阿尔斯特德。途中经过图林根的革命中心——帝国自由市米尔豪森。

闵采尔游历到南德意志、亚尔萨斯和瑞士。由于被追捕的“再浸礼派”遍布全德意志，他的教义得以广泛传播。农民和平民都把他作为自己革命要求的公认代言人。无论他走到哪儿，老百姓都积极响应他的宣传。

1525年3月17日，米尔豪林城的手工业工人和平民通

过起义把城市贵族赶下了台。一个由城市居民选举的所谓“永久政府”接管了本城的统治。于此同时，在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在奥地利和亚尔萨斯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城市居民中的被压迫民众也参加了起义，甚至有些下级贵族也参加了起义。

闵采尔到处散播的革命火种，在思想和组织上为农民起义作了准备，推动了伟大的农民战争的爆发。

三、瑞士的宗教改革及其影响

1. 卡尔文的改革

瑞士虽然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它是独立的，是由 13 个州结成的一个松散的联邦，每州实行自治，瑞士曾被认为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家。16 世纪初，巴塞尔成为瑞士人文主义的中心。

瑞士的宗教改革与乌利希·茨温利、纪尧姆·法雷尔和让·加尔文三位改革家紧密相连。茨温利是瑞士法语区的改革派领袖，他主要在伯尔尼一带活动，日内瓦则是卡尔文的主要活动中心。

茨温利于 1498 ~ 1500 年间在伯尔尼受人文主义者亨利希·沃尔夫林的影响，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古典文学，1502 ~ 1506 年，他在巴塞尔大学期间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1522

年，茨温利走上了宗教改革的道路。茨温利确信只有《圣经》命令的，或在其中有真凭实据的，才是有约束力的，或允许实行的。

同年8月，苏黎世市长规定，只许宣讲纯洁的上帝之道，宗教改革正式开始了。茨温利提倡由政府主持进行群众性教育运动，凡政府提倡的改革都要听取他的意见。

与此同时，瑞士其余地区也开始了宗教改革。1528年，茨温利抓住一次公用辩论会的机会使瑞士最大的州伯尔尼也加入改革。伯尔尼加入宗教改革阵营，改变了整个瑞士的宗教改革形势。1528~1530年间，伯尔尼、圣加伦、比乐、米尔豪森、巴塞尔、沙夫豪森和施特拉斯堡等州也相继加入了基督教城市联盟。信奉天主教的几个保守州，正式组成“基督教同盟”，并于1529年与奥地利结盟以对抗新教联盟。两个有组织联合体的出现，破坏了瑞士的统一，加剧了新旧教之间的对立并引发了战争。茨温利本人也死于战乱。

1532年10月，宗教改革家纪尧姆·法雷尔对此开始在日内瓦宣传宗教改革，发展新教势力。后来，日内瓦市议会利用投票的方式接受了新教，1536年8月7日，伯尔尼承认日内瓦独立。日内瓦对新教的接受主要是为了政治自由。它的宗教机构必须重新组织。法雷尔对此感到力不从心，便于1536年7月请其法国朋友让·卡尔文留下，帮助其开展工作。

卡尔文出身良好，年轻时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熟悉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他是在巴黎读书时在宗教改革的影响后，从事宗教改革活动的。由于法国政府的迫害，卡尔文于 1535 年逃往瑞士巴塞尔，并于 1536 年发表其主要神学著作《基督教原理》，这部作品系统阐发了马丁·路德新教的神学思想，主张“信仰得救”，希望建立“廉价教会”。他强烈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认为人的生死富贵，并不能因靠斋戒、忏悔、赦罪等善行而改变，而是早已由上帝的意旨所“预定”，在现实中成功的便是选民，否则便是弃民。1537 年，卡尔文出版《信仰条文与训导》，提倡严谨的新教道德，并想用它来指导人的生活，但立即即遭到反对，导致卡尔文派和反卡尔文派之间的派系斗争。1538 年 3 月，反卡尔文派得胜，卡尔文被撤职，日内瓦部分市民在街头大骂卡尔文，扬言要把他扔入河内。法雷尔与卡尔文不得不逃离日内瓦。法雷尔到了纳哈特尔，指导该地的宗教改革运动，毕其余生。卡尔文到了施特拉斯堡，担任法国流亡教会的牧师。由于掌握该城宗教大权的马丁·布塞尔是个路德派，在此他可以比较自由地宣扬自己的主张，他用法文为流亡教会的会员制订了一套新教礼拜仪式。后来，这套仪式演变成管理教区的教义。

就在他滞留施特拉斯堡期间，日内瓦的政治革命派再度掌权，他们邀请卡尔文重返日内瓦。回到日内瓦后，卡尔文

重新编订了《教会宪章》，并着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并得到教会采纳。教会确立了卡尔文的教义的地方，许多人被指为异端，被流放或处决，卡尔文本人也迫害异端。他想把日内瓦建成完美的基督教社会的典范，他的一系列举措吸引了大批难民来到日内瓦。但卡尔文教的严厉，使一些人不满，1555年5月16日晚，卡尔文的反对派发起一场小规模暴乱，日内瓦政府平息了暴乱，把反对派领袖定为叛徒，加以处决或流放，使日内瓦完全归卡尔文派掌握。面对当时萨伏依公爵的威胁，卡尔文于1558年1月促成日内瓦和伯尔尼结成“永久同盟”，为日内瓦消除了威胁。日内瓦成了“新教的罗马”。卡尔文死时，被称为“惟一的国际性的宗教改革家”。

2. 宗教改革前后瑞士的政治、经济状况

1291年瑞芝、乌利和温特瓦尔登三州不堪奥地利大公的压迫结成联邦，反抗奥地利的统治。邻近各地区受到鼓舞，也参加了战斗。三州的联邦联合其它的州，日益强大。琉森、苏黎世、楚格和葛拉路斯、伯尔尼、佛里堡和佐洛士恩、巴塞尔和沙夫豪森、亚本塞尔在1332~1513年间先后并入联邦。

瑞士人以密集的步兵集团作战，采用这个战术，士气大振，不仅击败了封建军队的围攻，还有能力大举反攻。

在 1477 年的南锡会战中，瑞士人与洛林公爵勒内的军队联手击败了勃艮第公爵查理军队。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勃艮第公国的灭亡。1499 年，他们又战胜了士瓦本同盟中的德国诸侯和皇帝的军队。在这次会战以后，瑞士联邦已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1511 年的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这种独立，并通过 1648 年《威斯特法里亚和约》在国际上获得了公认。

瑞士人不仅捍卫了自己的联邦领地，而且还派军侵略了奥地利、米兰和其他邻近公国和诸侯国。瑞士人利用这些地方居民对封建制度和诸侯的不满，发动他们进行战争，把北方的阿尔卑和都尔卑、南方的溪诺、西方的伏特等变为了自己的领地，它们没有自治权。

瑞士联邦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总体上来说，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古老的、也就是所谓森林农业州，包括瑞芝、乌利、温特瓦尔登、琉森和楚格；第二类的经济比较发达，包括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等州。

各森林州经济发展有以下特点：封建关系弱化，公社制度自由农民阶层在这里并不存在。

在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大部分依附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封建关系仅残存于不大的教会领地以及福格特区。福格特区所不同的仅仅是以集体领主身份代替了封建领主剥削农奴劳动。当然，各州上层统治人物依然剥削福格特区的农奴

并从中获利。

畜牧业是森林州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高山草甸有利于牛羊的生长。畜牧业的产品如毛皮、皮革、奶油、干酪行销各州，并出口到意大利和德国。辽阔的牧场和森林都是公用的。耕地较少使得森林州所需粮食的大部分依靠从德国进口。

城市州的情况则不一样。像伯尔尼、苏黎世、巴塞尔等这样的城市，都是当时的商业、手工业和信贷（高利贷）中心。这种情况的出现得利于它们处在从意大利途经阿尔卑斯山隘到法国和德国的商路交叉点上。但是，它们仍然是封建城市，依然存在着行会团体。

苏黎世州是当时最发达的城市州。虽然苏黎世大多数手工业都以行会的形式组织生产，但从 15 世纪末起，呢绒、丝织品和皮革的生产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的生产方式。

同时，封建因素在苏黎世的经济生活中还有很大比重。行会千方百计阻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除了自由农民以外，还有一部分残余的封建依附农民。

1525 年，巴塞尔的行会帮工和城市平民发动起义。在一次夜间集会上，各行会的帮工拟定了纲领：与各福格特区的起义农民一起战斗，破坏天主教神甫的住所和修道院，以暴力推翻市政局。但是，参加密谋的人很快被逮捕，城里开

始残酷迫害起义者。同时，政府对于作为匠师的同业公会的行会，态度却温和得多。

巴塞尔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运动与德国的农民战争关系密切。大量巴塞尔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参加了德国农民部队。

各州当局对骚乱的反应不一。天主教的森林州反对态度很坚决。它们设置阻截队，防止瑞士农民和德国农民的会合。同时，这些州也努力缓和农民与诸侯间的矛盾。实际上这种调停为德国诸侯赢得了时间，以集结兵力来击溃农民。

各城市州不得不迂回作战。一方面，各城市促进了宗教改革运动在本市的农村区、天主教各州以及共管的福格特区里的传播，想以打击贵族和修道院的方法给予依附它们的农民更多的权利，这一切都促进了农民的反封建运动；但另一方面，这些州自己也剥削各福格特区并且通过城市对租税进行垄断，由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城市不会放弃自己的这些特权。因此，城市依靠农民上层分子对农民运动进行分裂、拖延，坐待德国局势的扭转。各城市州也和森林州一样，在德国诸侯与起义农民之间进行调停，不让自己卷入战争之中。

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引发了各州当局对瑞士农民运动的镇压。天主教各州镇压了各福格特区的起义，天主教在那里得到了恢复。对农民所作的让步又被收回，不过对农民的限制毕竟有些放宽，农民的农奴依附地位、小什一税、教会司法权被取消了，租税得以降低，部分地恢复了渔猎自由。

但是，沉重的封建苛捐杂税、劳役、破坏性的城市税和垄断权仍旧是农民不得不承受的。广大的土地仍掌握在农村公社的上层分子手里。各城市州当局故态复萌，又开始迫害再洗礼派、农民平民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人以及德国农民起义者。

农民平民运动的失败，使萨文黎宗教改革大为受挫，并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它的地方局限性。

宗教改革最明显的结果是打破了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局面。整个西欧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牧师，而是相互分裂、彼此对立。日耳曼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属路德派；在英国是新教；在苏格兰、荷兰和瑞士卡尔文派占优势。如今只剩下意大利、奥地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日耳曼南部、波兰和爱尔兰效忠教皇了，但即使在这些国家里，新教也有一定势力。

这种分裂状态引发了教派斗争，直至引发一系列宗教战争。施马尔卡登战争、胡格诺战争乃至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都与此有关。由宗教战争所散播的猜疑和仇恨的浓雾弥漫了整个西欧。对宗教的偏执甚至超过了十字军时代。除天主教的暴行之外，新教德意志对再洗礼派的残暴迫害以及卡尔文派对天主教徒的极端仇视也十分恐怖。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为此付出了生命。迈克尔·塞维图斯是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因拒绝接受“三位一体”和“预定说”，于

1533 年初被卡尔文派绑在火刑柱上焚死。1600 年，布鲁诺被烧死。宗教改革后的 16 世纪，西欧也加紧迫害巫术。路德本人就认为以后要处置女巫。1545 年，在卡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有 34 个妇女因被指控为女巫而被烧死或肢解。16 世纪后期的受难者估计超过了 3 万人，德意志的某些城市一年之内就处死了 900 人，甚至把一个村庄的妇女全部杀死。尽管有这种偏执和残酷，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宗教改革却促进了宗教宽容的发展。

四、反宗教改革势力的活动

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和扩大，给天主教会予以沉重的打击。16 世纪中叶，路德教在德国中部、北部，在北欧和东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卡尔文教在瑞士、尼德兰、英、法以及德国西南边境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被广泛接受。这时，天主教的势力虽然下降了，但封建制度在欧洲各国仍占主导地位，天主教仍然拥有强大的势力。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在新教纷纷成立和宗教改革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力挽狂澜，开展了一系列反宗教改革的活动，即在内整顿和改革天主教自身，在外反对宗教改革、阻挠新教的活动。

西班牙贵族伊格那提·德·罗耀拉（公元 1491 ~ 1556 年）是耶稣会的创立者。它从 1534 年 8 月就已开始活动，但耶

稣会直到 1540 年 9 月才得到教皇的正式批准。此后，它始终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耶稣会纪律严格，其成员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首脑。为了巩固天主教会的统治，他们信奉“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耶稣会士不穿僧衣，不住寺院，和俗人一样正常生活。他们开办学堂、医院，出入宫廷，结交显贵，甚至担任高级官职，从而反对新教，耶稣会士还把活动扩展到美洲、非洲和亚洲。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工厂、地产的经营者，从事贸易活动，并以此为借口进行殖民扩张。西欧早期殖民扩张的各支侵略队伍中，耶稣会士占有很大比重。当然，还有一些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远涉重洋到外地传播科学和文化，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如在中国明朝末年，传播天文学、数学等的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便属于耶稣会成员。

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也担心天主教会的改革，可能最终导致宗教改革思想的泛滥。罗马教廷的改革并不涉及天主教会的基本教义和组织原则。教会当局规定必须严格遵守宗教仪式的规则以及法旨。他们大力培植各大学的神学系和各教会学校，在罗马建立了中央宗教裁判所，以惩罚任何叛教行为。宗教裁判所的拷讯室往往人满为患，他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刑讯以迫使他们就范，还制定了“禁书目录”。

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的压制，只是 16 世纪中叶欧洲封建天主教反对进步势力战斗的一个小部分。在新旧势力的斗

争中，天主教会完全支持封建制度。它不仅在理论上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而且还在实践中利用自己的宗教裁判法庭来消灭反封建的人。

天主教的顽抗曾一时得逞。在封建势力强大、专制统治稳固的国家，如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意大利等国，天主教的势力死灰复燃。在封建制度的逐渐解体和资本主义逐步发展的情况下，欧洲各国反罗马教廷、反天主教会的斗争在 16 世纪下半叶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了。